2022 JUL

如水 flowHK

6 世界與香港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世界與香港

ISBN 978-626-96400-0-3
9 786269 640003 >



Vol.6
2022 JUL

如水 FlowHK

推廣民主抑或顏色革命？自主議程何處尋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前行政總監
Carl Gershman

如

flow HK

水

世界與香港

文章目錄

封面人物

A1 推廣民主抑或顏色革命？自主議程何處尋：訪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前行政總監 Carl Gershman — 作者 | Alex

B1 以人民為視野：訪問蒙兆達 — 作者 | 式、六月

以____作為世界觀

A13 我們是否必然要以國家為世界觀？ — 作者 | 式

A21 無名之地的意義：以帝國作為世界觀 — 作者 | 木子雨

A27 以架空歷史作為世界觀 — 作者 | Fiona C.

A35 如果以同理心作為世界觀 戲劇作為歷史的框架 — 作者 | 水蒸球

A41 以科技作爲世界觀 — 作者 | 破曉

從烏克蘭看世界

A49 柔弱或剛強？烏克蘭婦女在反抗政治中的挑戰與定型 — 作者 | 夏浦

A55 鬥雞與生存危機：2022 俄烏戰爭的前世今生 — 作者 | Sisyphus

A71 俄烏戰爭的離散與分裂 — 作者 | 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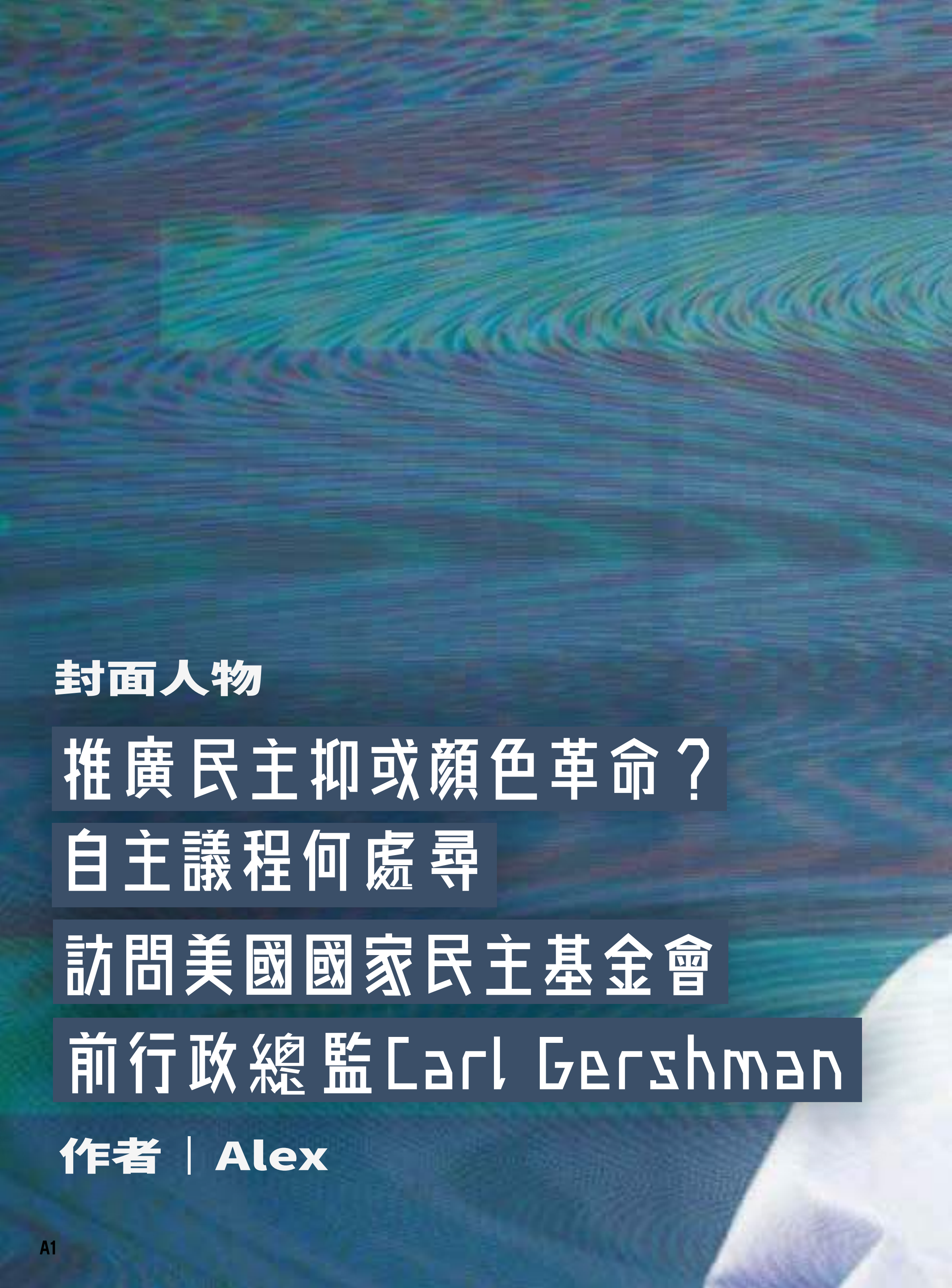
A77 還記得那些支持香港的烏克蘭人嗎？ — 作者 | 六月

A83 烏俄戰爭與自由國際秩序 — 作者 | 畢迪

從世界看回香港

B11 從象牙塔的民主化理論看香港實況 — 作者 | 鍾燊豪

B21 四個香港節——活在真實中 — 作者 | 夏浦



封面人物

推廣民主抑或顏色革命？自主議程何處尋

訪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前行政總監Carl Gershman

作者｜Alex



A2

推廣民主抑或顏色革命？自主議程何處尋訪問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前行政總監 Carl Gershman

作者 / Alex

前言 [1]

2022 年 5 月 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其網站發表萬字文章「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羅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 NED）「反中亂港」的罪狀和其在全球的惡行足跡，在其公開網站資料查找共計撥款過千萬美元予「五獨」組織。

中國共產黨指控外國勢力干預自國內政，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發表萬字宣言，又可能代表其對外文宣將繼續以外敵犯險為理由，對內肅清異見組織，對外持續妖魔化反對陣營。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到底是何方神聖？本刊特意訪問基金會的前行政總監 Carl Gershman，請其分享他眼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前世今生、效用、目標，對民主理念的看法和烏俄戰爭對世界的啟示。2020 年 8 月，Carl Gershman 被中共宣布反制裁，以抗衡美國財政部制裁推行《香港國安法》的十一名中港政府官員。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成立於 1983 年，而 Gershman 由 1984 年至 2021 年皆為該會的行政總監，領導基金會的發展和運作，其政見和看法多少反映了美國戰後世代的政治精英觀點，尤其是七十年代冒起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支持者，支持全球自由市場和以推廣民主、人權掛帥的美國外交政策，領導全球秩序。隨著 2008 年金融海嘯發生、茶黨突起和 2016 年特朗普當選，此等趨勢普遍被視為新保守主義勢力在美國趨弱的象徵。但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方針，至今仍對美國外交政策留有影響力，不能輕視。

1. 除了前言、後記和內文注明的學術文獻，內文的所有分析觀點皆為 Carl Gershman 的看法，並非訪問者立場。
2. *The Democracy Makers: Human Ri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Order.* 200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arl Gershman的成長背境與政治時空

Carl Gershman 1943 年在美國出生，成長於紐約市一個猶太家庭，先後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和哈佛大學進修教育碩士。對 Gershman 而言，他擁抱的價值在於「民主」、「人權」、「自由」和「人的尊嚴」，作為其行事的方針。

Gershman 表示，自己在年少時接觸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其後遇到民權運動其中一名幕後黑人領袖 Bayard Rustin，並與其在美國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 USA）共事。

根據歐洲學者 Nicolas Guilhot 的研究[2]，份屬右傾的美國社會民主黨本屬於二戰後的左翼陣營，隨著冷戰熱熾，左翼陣營亦因蘇聯史太林的極權統治而一分為二，分為撐共的左翼陣營和反對史太林的左翼份子。Guilhot 指稱，美國國務院的社會主義者，與歐洲跨越大西洋赴美走難的異議份子結合，合流成為新的政治力量和思想淵源，在國際政治事務上評擊史太林的獨裁統治，形成民主政治對疊極權國家的分析框架，摒棄純粹資本主義陣營決戰共產主義陣營的論述方式。根據 Guilhot 的看法，Gershman 進入美國社會民主黨的時空，亦是美國反史太林左翼陣營被指「向右轉」的時刻。當中不少中堅份子成為其後主宰美國政治外交路線的「新保守主義」支持者，與「新左翼」成為影響美國近代政治發展的思想陣營之一。

Gershman 在回溯自己從事 NED 的過程中，亦見證了這一政治軌跡的轉向。

Gershman 先在美國社會民主黨擔任行政總監一職，後在列根總統任內的美國駐聯合國部門工作，隸屬另一名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Jean Kirkpatrick 旗下，從事聯合國大會轄下第三委員會的事務，專責就人權議題工作。

Gershman 憶述在聯合國工作期間，他經常要和蘇聯陣營的國家代表唇槍舌劍。有一次 Gershman 在評論蘇聯時，提及古巴、阿富汗和中歐，卻被白俄羅斯代表打斷，指稱其發言和議程無關。Gershman 反駁道他的發言有關自決權利，而蘇聯為世界唯一尚存的帝國。Gershman 的言論促成各國代表互相辯論。1983 年，當 Gershman 再提及自決議程時，發言提到 1933 年為史太林有份導致的烏克蘭大饑荒五十周年，造成四百萬人死亡。其時，烏克蘭代表即場起身否認事件從未發生。

Gershman 指自己的行事作風，令到自己在 1984 年被挑選成為 NED 的首任行政總監。1982 年，列根承繼前任美國總統卡特的路線，將人權事務放在美國外交政策的修辭方針之中，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指稱其政府將成立

推動民主的機構，務求推廣民主、人權，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議程核心之一。

NED：一個由美國國會撥款、充滿爭議的資助機構

Gershman 指 NED 的意念源於德國的政治基金會，協助西班牙及葡萄牙作民主轉型。但是，NED 的創立與運作，不止受中共提防批評，連美國國會當初亦充滿分歧，議員對於 NED 的設立細節充斥不同看法。Gershman 憶述，不少聲音質疑 NED 領取國會撥款，但卻屬私人機構；亦有國會議員擔心 NED 將會被中情局（CIA）控制。

據 Søndergaard 翻查檔案，最終的國會方案將本身 NED 議案中必然撥款於民主、共和兩黨屬下機構的條款抽起，禁止 NED 推行自己的計劃項目，要求 NED 每年向國會提交報告，再將 NED 置於《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之下[3]，方予以 NED 成立。

Gershman 表示自己也曾有氣餒的時候，但認為國會授權資源 NED 去支援異議人士、民主鬥士，本身就是一件奇蹟。Gershman 自己經常會提醒同事，他們不能將 NED 的成立視為理所當然。而他自己亦會落力推動歐洲民主基金會和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創立，以見證更多跨國努力。

Samuel Huntington 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於 Gershman 而言，NED 的角色屬於民主化浪潮的一部份。在 Guilhot 的分析中，NED 的成立，踫上社會運動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趨勢，經由 NED 網絡推動民主專業（expertise），尤其是政治學者的議政論政之角色，去發揮影響力。

Gershman 在訪談中多次引用的政治學者 Samuel Huntington 所撰的專著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sation* 便屬其一。Huntington 為 NED 學術期刊網絡中一位在學術界頗有聲望的政治學家。Gershman 引用 Huntington 對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分析，認為民主化的源頭始於美國，經歷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有不同的民主化浪潮，而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始於葡萄牙、西班牙、拉丁美洲、菲律賓、南韓、非洲，以證明民主並非西方價值，而屬全球價值，一個革命意念。NED 的角色則是推動這個浪潮的一個機構。

3. The contested origins of US democracy promotion: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its congressional critics. 2022.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9):187–205.

「1990 年代是歷史的休假 (the vacation from history)」

然而，Gershman 提及 1989 年柏林圍牆被推倒後，美國國會亦冒起質疑 NED 存在意義的聲音，質疑既然世界已有民主化浪潮，又何需 NED 幫忙推動民主議程？面對一國之內的內部爭議，Gershman 認為差異遠不如民主與極權之大。Gershman 認為民主黨、共和黨、工會、商界，皆支持民主體制，不分黨派。Gershman 認為冷戰期間，美國人明白一國有制度之爭，但亦有抗共的全球戰役；但後冷戰時代，則產生了很多困惑，直到烏克蘭事件再喚醒更多民眾，去共同守衛民主，抵抗極權。

據 Gershman 回顧，911 事件發生前，NED 的財政預算每年皆被質疑，直至 911 事件發生後，國會才提出美國需要在穆斯林世界推廣民主。自 2001 年至 2020 年之間，NED 的財政預算以十倍計增長；2005 年開始，世界亦步進 NED 另一位學術界盟友、民主理論學者 Larry Diamond 所指的民主退潮階段。2005 年後的 16 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指世界的政治及公民自由連續收窄，並在 2020 和 2021 年惡化至另一低點。Gershman 認為世界現在正身處一個低谷，中國和俄羅斯相繼變強、更野蠻和自信，形成非自由（illiberal）的民粹自由主義，不但使人對自由、民主的理念體制失去信心，更會覺得威權政體比較能將事情辦妥。烏克蘭的爭端亦與此趨勢有關。

對於有論者批評一九九零年代是失落的年代，Gershman 同意 90 年代的西方社會確實存在一種自滿的情懷，甚至有一種洋洋自得的感覺，以為民主制度一定會橫掃全球，成為唯一制度。Gershman 認為，民主退潮總會發生，就如同在一戰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三十年代崛起，然後爆發二次世界大戰。而二次大戰後，印度、哥斯達黎加、非洲等國家相繼經歷解殖浪潮，但是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少國家相繼再落入軍人執政，落入民主退潮之中。

然後，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於 Gershman 而言，很多歷史力量在發生作用，影響民主浪潮，而 NED 和不少政策只能發揮相應效力。他們將中國帶入國際經濟制度，支持其進入世貿，亦以為俄羅斯將在葉利欽的帶領下進行民主轉型，唯歷史的希望未能成真，又如何能對前人苛求更多？

當問及 90 年代東歐、北約和俄羅斯的協議時，Gershman 回看當初，指稱或許各種和平協議，包括和平夥伴關係計劃（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及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皆未能保護烏克蘭，或許是一種失誤。

Gershman 指俄羅斯總統普京早於 2007 年便表態指蘇聯的解體，於世界地緣政治而言是一種災難，而他們必須捲土重來，重建俄羅斯帝國。俄羅斯

的進逼，如同今天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一樣。對 Gershman 來說，箇中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回應當下的挑戰？」Gershman 不認同一切種種皆是必然，反而，「民主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包括反民主國家的冒起；相對而言，民主制度是一個極難建立的制度，需要社會陣營間的妥協、政治制度中對權力的制衡、積極的公民參與、自由的選舉等等，去抗衡不斷想累積權力的政治領袖。

到底民主制度能否存活下去？Gershman 認為，民主制度自有其脆弱的地方，例如難以決策，但自由的文化、積極的公民參與，將會吸引全球民眾。Gershman 表示，有理論指稱民主國家不會互相開戰，以保障民主和平，更反照普京和習近平的權力毫無節制，獨裁者在能夠壓制人民、濫用權力的情況下，最終將對鄰國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Gershman 引用前蘇聯異議份子 Andrei Sakharov 的看法，指國際和平需要人權，而缺乏人權將不能達致世界和平，如同今天烏克蘭在發生的災難。

從烏克蘭的災難思考極權政體、戰爭意義及地緣政治之變動

在 Gershman 眼中，假設烏克蘭能存活下來，成功抵抗俄羅斯的侵略，將給予世界新的動能，因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明在烏國的戰役是為普世價值而戰。如果烏克蘭能成功守護其獨立、民主、自由，其國土也將極盡破壞，需要被修復。戰後的重建工作將極為重要，即使此並非 NED 的主要工作，美國、歐洲、全世界也應該有一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去重建烏克蘭。

Gershman 相信，對美國人而言，烏俄的事態深具教育意義。Gershman 認為 NED 的任務是連繫美國人和前方的民主抗爭。而不少美國人其實對在香港或烏克蘭發生的事情甚表震驚。對 Gershman 來說，前捷克總統哈維爾的憂慮與其極為貼近。Gershman 認知中的哈維爾相當擔憂西方社會不能明白極權主義，而對極權主義只知皮毛的社會，將會變得自滿、缺乏批判，只會放眼在個人追求。於 Gershman 而言，911 事件是一個警醒時刻；烏克蘭是另一個警醒時刻，去喚醒美國、歐洲和台灣。

Gershman 認為，對於俄羅斯而言，一個擁抱民主政體的烏克蘭對俄羅斯是生與死的問題。他引用前國家安全顧問兼 NED 的董事會成員 Zbigniew Brzezinski 看法，指俄羅斯帝國視烏克蘭為其領土的一部分，缺乏烏克蘭的俄羅斯將無法成為一個帝國。2014 年，普京侵犯克里米亞和頓巴斯，亦源於要回應烏克蘭的親歐盟示威運動 ，阻止烏國親歐盟的轉向和人民對前總統亞努科維奇獨裁制度的反抗。俄羅斯的表現，表明獨裁者和威權體制會

壓制渴望得到自由的人民。而現在的烏俄衝突，因為俄國的擁核國身份而令衝突充滿危機。英國情報機構的首長談及普京近乎錯判所有情勢，包括烏克蘭人的反抗和俄軍以為自己會受歡迎。

Gershman 觀察，當普京再次入侵烏克蘭之際，每個人都想成為北約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想確保自身安全。2014 年前的烏克蘭是一個極度分化的國度，分為俄語和烏語者、東部和西部，但普京的入侵卻團結了烏克蘭，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民族，相信是普京此料未及的地方。而普京的思想極不能切合現代世界，因為他的思考是以帝國為模式，是一種控制人民的思維，而未能確認二十一世紀的現狀，和人民渴求自由的期盼。中國也在發生類似的事情，對坐擁各自領土的獨立族群如維吾爾族和圖博族人的壓迫，或會逼使更多反抗。

Gershman 認為，在過去，侵略者戰敗通常伴隨政權的倒台，如同七十年代的阿富汗或二戰後的日本進行自由化的改革。戰敗的俄國，亦將有相應的成本。俄國以為西方國家不會反應，但德國便歷經了政治轉變。德國首先喝停了北溪 2 號天然氣管道。而西方國家的聯合經濟制裁將削減俄羅斯經濟。Gershman 表示難言普京會否宣布和接納被擊敗，但顯言普京並不能宣布勝利。世界事務正處於極度前景未明的一刻，而烏俄的戰役將在未來影響歐洲和亞洲。

對 Gershman 而言，雖然獨裁者承諾穩定和經濟增長，以帶來積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但他們毫無政治合法性可言。例如中國，假設他們陷入經濟危機，人民可能會要求改變。隨著更多受教育的中國人出現，天安門革命可能會重臨中國。而一個高教育水平，卻在國際上備受孤立的中國和俄羅斯結盟，自有其爭議和脆弱的地方。當普京因入侵俄羅斯而惹來一堆麻煩，而中國卻因對澳洲、瑞士、美國逞強而面臨孤立，未來將充滿無盡變數。

Gershman 眼中的顏色革命、民主制度及國際系統

NED 經常被指控策動「顏色革命」，近者有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指「反中團體」的資金都來自美國國會轄下機構，即 NED 及其子機構。對於此類觀略，Gershman 認為外界必須承認人民確實存在，有其意志；若非在地人民存有反抗意志，則 NED 也無法煽動其出現。

Gershman 舉例指如 2004 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便是源於烏克蘭人認為其選舉被親俄派亞努科維奇偷走。然而，革命後的烏克蘭未能完全處理貪污

的問題，當 2010 年亞努科維奇回朝時 ，貪腐問題更嚴重，並疏離了數百萬計烏克蘭人。歐盟一度嘗試將亞努科維奇執政下的烏克蘭拉近歐盟，而亞努科維奇本身也有此意欲以此改善烏國的經濟，並藉此和普京領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拉遠距離。但是，臨近 2013 年 11 月的維爾紐斯峰會，亞努科維奇扭轉心意，拒絕和歐盟簽署任何協議，導致國內發生示威抗議，開啟了烏克蘭革命。Gershman 認為，烏克蘭人民正是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其政治動能既非北約亦非西方，遑論 NED。

對於李卓人被《文匯》、《大公報》指控受 NED 的資助，Gershman 認為中共經常都指責西方干預，他引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Alexander Solzhenitsyn 的說法回應，指 Solzhenitsyn 在 1970 的一場講座中反問蘇聯反對自己得獎的理由是什麼，竟然是就人權發聲被視作是外國干預。Solzhenitsyn 認為在一個窄小的世界中，世上早已再沒有內部事務。在 Gershman 眼中，如今東西方都會互相影響，正如烏克蘭的處境亦是全球事務。中國就香港和台灣的政策亦會影響全球系統。Gershman 相信中方在密切留意烏俄衝突，亦希望中共會重新思考他們對台灣的部署。

Gershman 表示，對 NED 而言，民主並非只是選舉，亦包括政治權利、法治及所有的相關機構和法則，包括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並非裙帶資本主義、寡頭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Gershman 同意冷戰後的俄國轉型製造了由前共產黨成員組成的寡頭勢力，進行竊盜統治（kleptocratic system），壟斷經濟。當前俄國的反對勢力 Alexei Navalny正是在反抗由竊盜操縱的制度，劫取數百億美元，並利用國際金融系統洗黑錢，漂白自身的名聲，輔以西方法律體制和顧問公司上下其手，扮作民主姿態，再捐款予大學和其他機構，這是擺明的貪腐制度。這群大亨所持有的遊艇和在倫敦的豪宅，皆是例證。西方社會必須將他們從整個西方經濟中切除出來，並支持 Navalny 等異議份子。烏克蘭亦在面對同等的情況，2004 年的橙色革命後，烏國繼續面對貪污問題；亞努科維奇貪污了四十億元烏克蘭貨幣格里夫納；2014 年的烏克蘭革命後，波洛申科打貪未如期望，便換了澤連斯基上任。

而在 Gershman 眼中，中國想兩者兼得，既要獨裁，亦要市場經濟的得益，並加以控制經濟。Gershman 認為當中國想要透過由政府控制市場機構，貪污便會出現；中國自身也知道此事，而西方不想資助習近平推動如此充滿內在矛盾的制度。Gershman 強調，民主必須有成功的市場經濟，受法治規管，擁有自由的媒體、積極的公民社會。因此，NED 旗下的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旨在推動私人企業的範疇，而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則面向工會，推動支持自由貿易的勞工團體。

問及 NED 與國際秩序，Gershman 表示 NED 屬非政府機構，並不會介入

政府政策，只對他方作有限的民主支援。Gershman 承認，NED 並無全盤的政治答案去回答所有政治問題。NED 可以支援公民社會、個別團體，但有關「主權」、「自決權」的課題，皆交由國際系統的其他政治單位去處理當中的關係。NED 的立場是在國際法的框架下運作，支援人權工作，配合《國際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勞工公約》等國際法條款。

Gershman明言，國家政府應去保持國際秩序，維繫和平和安全；而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將賦予人民機會去爭取自己的權利。NED 無法維繫國際秩序、阻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 NED 可以支援當地的公民組織，以抗爭貪污。Gershman 認為 NED 的策略將因時制宜，隨著當地的需要而改變；NED 與政府有異，不負責國家關係，卻在隙縫間推動人民的權利，包括政治空間、經濟自由、媒體自由等等。

國際政治中的金援撥款：
政治效能、自主性、離散族群的未來

中共及俄羅斯視 NED 為外部勢力亡我之心不死，Gershman 有自己一套看法，學術研究又如何看待呢？學者 Sarah Bush[4] 在 2015 年出版的研究，則對美國外交體系，如 NED、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外交援助推動民主進程持批判意見。

其中，Bush 認為在金主與僱傭的撥款機構與申請機構關係，受制於撥款評估機制在地參與（assess to the state），逼使撥款方變得保守，只批核可以有短期效應的在地公民賦權計劃，甚至變相在地機構要與所在地政府機關合作；而申請撥款方，為求取得撥款，在計劃書中只撰寫撥款方傾向的項目。為求留在服務國提供服務，以令其機構可以繼續運作，參與者也不願意提出和大幅衝擊政權或被視為推動顏色革命的服務計劃書，令到美國國會的資金及撥款評估機制未能真正在地有效推動政權下放權力，或賦權該國公民。

換言之，NED 等機構的效用，並不如極權國家般聲稱有圖謀大力推動顏色革命。筆者翻查 NED 網頁上的公開資料，也未見大量香港團體申請 NED 的款項，一來自然是以往港人的策略並不想和美國國會的相關機構有太多金錢往來，成為中共口舌攻擊的藉口；二來則是香港戰後的經濟發展，政黨贏取議席所得的公共財源撥款、公民社會團體尚可申請政府的資源、個別財團及慈善團體的撥款、專業人士和中小企成員撐起的政治團體在街頭的籌款能力，足以令整個民主運動維持某種政治能量和財政資源網絡，無需只依賴中共眼中的 NED 撥款。

4. Bush, Sarah. 2015. *The Taming of Democracy Assistance Why Democracy Promotion Does Not Confront Dicta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然而，《國安法》下的香港公民社會，是否仍能維持資源充足之景？香港在地及海外政治團體，恐怕都需要面臨眾籌能力下跌的情況，開拓另類資源網絡，包括海外眾籌、個別捐獻、美國國會等的機構撥款。當中，學者 Chen Yu-Wen 認為維吾爾族在海外的政治網絡，也得力於 NED 等機構的撥款而發展圖強[5]。不過，維吾爾族團體在向此類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申請款項時，也受制於撥款機構的政治框架，變相令到申請團體要調節自身的政治主張和變革手法。Chen 認為主張疆獨和武裝革命的維吾爾族都因為政見與溫和派西方撥款機構相差太遠，結果無法取得資源，終作解散。反之，即使心底渴求獨立，但口號和手法比較溫和的維吾爾族團體則因此較易取得西方國家認同，促使其機構能持續取得西方社會的資源。

由是之故，海外港人社會也會面對類近的挑戰：如何取得足夠資源，發展海外港人政治力量？是否申請海外政府機構的撥款？若是，如何維持自主性？又如何在取得西方民主政府認同和推動自己社群的政治主張之間，在海外港人公民社會之間尋得共識？共識，又是否可能達到？抑或將屬於不同政治路線的爭奪與比併？這都將是海外港人發展離散族群的自主或自決運動中，無法迴避的課題。

後記：

NED 多年來的策略，是否與時並進、有其效用，甚至如何置美國國家利益於其外交布局之間、他人利益之先，學術研究已有不少討論。而 Gershman 所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路線，在二戰及後冷戰國際社會秩序被挑戰的時空，能否在兩黨甚至美國思潮中革新，推動美國繼續扮演世界霸主的地位，主導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亦是未知之數。當《文匯》、《大公》、外交部之流無限放大 NED 所能代表的影響力，海外離散群體，如何能夠恰當評估美國政府及國會轄下機構的真正角色和用處，並且自主自決港人族群的未來？在《國安法》操縱香港命脈的當下，繼續認真思考各家各派如何理解和回應當今國際秩序、公民權利、資源網絡、離散社群的位置、自決權利多者交融相織的前景，將構成新一波的全球地緣政治景觀，主宰未來的國際和平、國家安全、環境經貿、人權政策等議題。願此文作為一個起點，促進更多海外港人社群就著有關課題的抉擇作思考和討論。

5.Chen, Yu-wen, 2012. *The Uyghur Lobby: Global Networks, Coalitio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Routledge.



Source : 作者提供



以＿＿＿作為世界觀

我們是否必然要以國家為世界觀？

作者｜式



我們是否必然要以國家為世界觀？

作者 / 式

前言

香港人所熟知的國際舞台是一個由大國主導的舞台。舞台的一方是中俄等極權國及其附庸國，而另一方則是由美國所主導的自由國家。這個舞台固然沒有非國家的組織或民族的位置，也沒有國際組織或法律的位置。每一個國家都是由其國家利益所主導，而香港人等沒有國家的民族就只能向大國進行倡議工作，嘗試說服大國領袖抗中救港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但這真的是我們未來惟一一個戰場嗎？國際法是否僅僅是一堆廢紙，不值我們一顧？國際舞台是否一直以來都是由國家所壟斷？到底香港人如何才可以在這舞台上保留一席位置？

這些問題對我們思考海外倡議之路長遠而言如何走下去尤為重要，但要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對這個舞台的歷史有所認識。這篇文章將抽取三個歷史的小段落出來，充當大家學習國際法史這看似枯燥的題目的引子。這三個段落，分別位於中世紀晚期、18 到 19 世紀、以及 20 世紀。中世紀的歐洲舞台上的不是國家，而是以羅馬帝國皇帝和教廷教宗為首的封建與宗教領袖。到底國家是如何站上這個國際舞台之上的？18 到 19 世紀可謂西方國家殖民主義高峰，他們是如何排除非西方國家於舞台之外的？自 20 世紀中葉，所有國際人權文件中都會把民族自決列為人權，但若然這是一個由國家所壟斷的舞台，民族又為何在這舞台上能佔一席位？這對香港人這個被打壓以及愈趨流散的民族，又有什麼啟示？

受文章篇幅所限，我無法把這段歷史的各種細節一一梳理道來，只能抽出其中一些不同角色之間有趣的辯論或角力，呈現出來的歷史或多或少會有點片面。再者，我在這篇文章只會集中討論國際法中的一個面向，但其實國際法還有很多值得深入討論的地方。縱使如此，我希望能以這三段歷史，指出這個舞台的構成其實一直在變化，而這些變化一方面固然是不同角色角力的成果，但另一方面當時的國際法也影響了誰能站在這個舞台之上並且他們能以什麼身份、理由、以及資源進行角力。香港人不必默默接受現今國際遊戲的規則，而是可以成為改變這些規則的其中一員，讓香港民族以後在這舞台上有更充裕的生存空間。但正因這篇文章只能抽取歷史的一些小插曲出來，有意更深入了解國際法歷史的讀者，可以從文末的參考及推薦書目入手，充實自己的知識庫。

西伐利亞和約：帝國衰落，萬國崛起

中學歷史教科書一般會有以下的歷史論述：中世紀的歐洲是由神聖羅馬帝國（以下簡稱帝國）以及教廷共同統治的時代，人民一般相信君權神授，但新教與天主教的分裂造成了慘烈的三十年戰爭，最後各國在 1648 年簽訂了《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立了現今的主權國家體系。這種論述有很多問題，而其中一大問題就是它無視了中世紀歐洲根本沒有現代的主權國家概念，亦因此無法回答以下這個問題：到底主權國家的概念從何而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便要檢視中世紀晚期的知識分子之間的論爭。

我們現在對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的認知，可說是分為主權與國家的部分，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兩個概念都並不存在。當時歐洲的政治與宗教領袖由一個龐大而複雜的關係網所連結起來，而這個網絡亦定義了他們彼此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理論上，教廷的教宗與帝國的皇帝位於整個權力架構的頂端，而在他們之下則是國王、主教以及各個階層的貴族。然而，各階層之間的權力與義務定義往往極為模糊，上位者經常干涉下位者的內政，而下位者亦動輒無視甚或反抗上位者的命令，政治與宗教領袖之間亦往往互不相讓。更甚者，不同領主的領地經常有所重疊，而這些領地之中或之間又穿插著不少像威尼斯一樣的獨立城市。領地與權力之爭引發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與衝突，當時以法學家（glossators）為首的知識分子決定轉向羅馬帝國初期的法律，以求為當時的亂局找出路。

羅馬法可以被分為三部分：每個政體自己的法律稱為民法（jus civile），所有政體都共享的法律稱為萬民法（jus gentium），而由神或自然定律所頒布的法律則稱為自然法（jus naturale）。支持皇帝治權的法學家，往往會以民法為其論點基礎，指因為民法是適用於羅馬的法律，故此也適用於帝國治下的歐洲。根據民法，羅馬曾是一個共和國，主權本來在於羅馬人民手上。然而，羅馬人民決定把主權轉移給皇帝，這便成為皇帝統治權的憲政基礎。支持教廷的法學家則接納了這套語言，但指皇帝亦已把主權轉移到教宗手上，故主權現歸於教宗。

皇帝與教宗以外的政治領袖自然不想接納這套說法，但他們卻無法在民法中找到自己統治權的論點。他們旗下的法學家索性指現在的神聖羅馬帝國根本不是舊有的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民法自然也是過時的，真正管轄當今歐洲的是萬民法，畢竟萬民法是適用於所有民族的。萬民法其中一個關心的問題是羅馬應該如何看待及處置其他政體。根據萬民法，每一個獨立的民族（populus liber）都有權去建立以及解散自己的政治體系。何謂一個獨立的民族？根據法典，當一個民族並不用臣服於其他民族的權力之下，這個民族便是獨立的。這些法學家以此為基礎，指出因為他們的政體有不臣服的意志及能力，他們亦因此有自治而不受皇帝或教宗干涉的憲政基礎。

法學上的角力與軍事上的角力可說是同步的。隨著帝國與教廷地位下滑，知識分子亦開始討論到國家主權的問題。Jean Bodin 在 1576 年寫成《國家六論》，並在其中定義了何謂主權 :「主權是一個國家的絕對且永遠的權力」。對 Bodin 而言，如果一個領袖的統治權只是暫時性的，又或這個領袖還要聽命於其他人，他就不能真的說得上擁有這個國家的主權。所謂主權國，就是不用聽命於國家以外或以上的權力的國家。Bodin 的理論可說是把整場討論的軸心從「民族的獨立」轉移到「國家的主權」。

隨著 17 世紀的三十年戰爭結束，各國簽訂《西發里亞和約》，帝國與教廷便可說是正式退場而主權國家真真正正的登上了舞台。當然，這時國家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而主權在 17 世紀仍是一個受爭論的概念。《和約》從來沒有明言國家是主權的載體，但在圍繞《和約》的外交政治上，處處體現出歐洲國家的自主以及國家之間是平等的理念，而國家以外的帝國及教廷，基本上已經毫無重要性。這些討論顯示了萬民法與主權理論對她們的影響，而在此後萬民法也被視為各國交流的法則，而這亦成為了國際法的前身。

18 與 19 世紀 : 什麼是國家？

在 1786 年，英國國會對前印度總督 Warren Hastings 展開了為期七年的彈劾聆訊，指控其在印度嚴重失職，殘害印度人民，有損東印度公司利益，並令英國皇室蒙羞。在聆訊中擔任主要提控的下議院議員為著名政治理論家及哲學家 Edmund Burke。Hastings 的律師指基於萬民法，由於印度內部根本無法治可言，英國無法期待印度遵守萬民法並尊重雙方的條約，故英國亦不用以法待之。Burke 則指印度社會明顯有其一套法治體制，在萬民法下英國應視印度為平等的主權國，Hastings 及其旗下官員不僅多次侵犯印度主權，更多次違背其與印度簽訂的條約，是公然違犯萬民法。這場聆訊對英國朝野以至歐洲諸國的份量在於其帶出的問題。隨著各國在世界各地設立殖民地並與歐洲以外的國家簽訂政經外交條約，到底萬民法的規則適不適用於這些國家或民族？另一種問法是，誰有資格成為這個國際體系的一員？而這牽涉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 何謂國家？

隨著歐洲各國與世界各國建立各種貿易與外交關係，為政者與知識分子均不甘沿用《法典》中過時的萬民法，萬民法被發展成一套完整且與時並進的學科，而象徵著這個發展的經典，就是 Emer de Vattel 在 1758 年發表的《萬國律例（Le Droit des Gens）》。在這本書中，Vattel 指出萬民法的基礎在於不論各國國力為何，我們都應視每一個國家為國際舞台上平等的主權國，但這只適用於「文明的（civilized）」國家。對 Vattel 而言，一個文明的國家是不會動輒以暴力對待國家內外的人民，而所有文明的國家都應受到萬民法的保障。《萬國律例》成為了經典，文明國家也成為了擠身國際體系的新的標準，但「何謂文明國家」這個問題，卻引發了新一輪的辯論。

回到英國國會對 Hastings 的聆訊，其實雙方都援引了 Vattel 支持自己的觀點，關鍵則成為印度是否有法治體系的文明國家。雖然最後 Hastings 從這場聆訊中全身而退，可說是打了一場勝仗，這場辯論並沒有因此而蓋棺定論。在半個世紀後，同樣的辯論再度被帶上了英國國會。在鴉片戰爭前夕，被派遣作欽差大臣的林則徐借病密會美國宣教士 Peter Parker，並托他取得了 Vattel《萬國律例》數個篇章的翻譯。其後林則徐以《萬國律例》為據，向英國指出清朝作為主權國有權取締違禁品，故此其銷煙之舉並無侵犯英國產權，不能成為英國開戰之由。英美當時有不少人民均認同林則徐的觀點，而當英國國會辯論到底應否向清朝宣戰時，反戰議員亦指在主權國內應遵從當國的法律，故此英國並無向清朝開戰的大義。主戰者卻指萬民法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國家之間更好處理其貿易與外交關係，但清朝實施鎖關政策，根本無意與他國貿易或交流，故此也無需以萬民法對待清朝。最後，英國國會在 1840 年以 9 票之差，決議向清朝開戰，也同時決定了清朝被擠出了國際舞台。

18 到 19 世紀這段期間的種種紛爭，可說是決定了萬民法發展成現今國際法的過渡期歷史。事實上，「國際法」一詞，亦是因為英國哲學家 Jeremy Bentham 不滿「萬民法」一詞意義含糊，才該以這詞代之。有趣的是，Bentham 的個人想法轉變，亦象徵著歐洲國際法在這個時代的變化。年輕的 Bentham 認為真正的世界和平需要世上每一個國家都承認對方的主權。然而，當時的歐洲諸國根本不是國家，而是擁有龐大殖民領地且無視非西方國家主權的帝國。故此，Bentham 認為世界和平的先決條件為歐洲各國必須解放其殖民地，而他亦身體力行，鼓勵埃及與阿爾及利亞等北非諸國尋求獨立。Bentham 年老後卻改變了想法，反指只有文明國家才受國際法所管轄並保護，而只有基督教國家才算得上文明的國家。對那時的他而言，世界和平所需的，僅僅是各國不要干涉對方的殖民地而已。

雖然西方一度有過非西方國家應否被接納入國際體系的辯論，而這場辯論中也不乏認真看待國際法的人，但最後他們還是決定把非西方國家排除在外。但正正因他們並不單純是要合理化他們的殖民地，仍是希望認真對待國際法，所以亦因此確立了這個舞台的遊戲規則：能站上來的，就只有「文明」國家而已。

20 世紀：民族再度站上舞台

兩場世界大戰後，隨著各國成立聯合國並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國際體系亦終於延伸到大部分國家。但這時國際法卻又發生了另外一場大變。在 1966 年由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第一編第一條，列明「所有民族（people）均享有自決權」。國際法是如何由承認國家的主權走到承認民族的自決權？

或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在現代第一個大力提倡民族自決權的大國領袖是列寧。在推翻帝俄前夕，革命分子面臨一個問題：到底新的俄羅斯應如何看待受帝俄統治並壓迫的不同民族？而對於支持共產主義的革命分子，他們亦必須去問：到底承認民族身分與他們的階級分析有沒有衝突之處？列寧認為沒有。他在 1914 年撰文提倡每一個國族（nation，在這裡譯為國族，以別於 state 或 people）都應該享有自決的權利，決定自己要否立國並選擇自己政府的政經模式。對列寧而言，不是所有國族主義都是有害的。他反對大俄羅斯主義，卻支持小國自決獨立，在一戰後，推動蘇俄跟愛沙尼亞及格魯吉亞等國簽訂和約，承認他們的主權國身份。在列寧的思想影響下，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也開始採用自決的語言，而毛澤東亦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在 1920 年宣稱把湖南建設為湖南共和國，並指中國惟一可行的出路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有感不能讓共產陣營壟斷自決的語言，如是也在其發言中支持國族自決，亦把自決的大原則放了在其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之內。

雖則如此，國族自決並沒有在一戰後成為國際共識。在共產陣營內，不少領袖與知識分子都認為國族自決原則往往只會容許該國的資本家掌權。著名女共產主義者 Rosa Luxemburg 因其反戰思想被德國政權囚禁時，便在獄中撰文分析當世界經濟架構仍是由帝國及資本家所壟斷時，國家都只能受制於他們，根本無自決權可言。蘇聯在兩次大戰期間以打倒資本階級為由，再度入侵並吞併愛沙尼亞及格魯吉亞等國；中共奪權後也沒有容許任何國族自決。自決原則在西方陣營同樣面對極大的阻力。不僅是美國國會無法接受國族自決，西方諸國也無意放棄其殖民地，Wilson 自己的親信更指這個理念根本是一個自殺式炸彈。最後，自決並沒有成為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認可的原則。與此同時，隨著歐洲的國族主義演變為極端的民粹主義，不少進步的知識分子與從政者開始改以民族（people）自決取代國族自決。但到底何謂一個民族？曾一度在港大任教的國際人權律師 Hurst Hannum 指在兩次大戰期間民族一詞至少有五種不同的用法，既可指流散的民族，也可指被殖民者統治的民族，亦可指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

在二戰後，蘇聯再度在新成立的聯合國中提起民族自決這個原則。蘇聯的目標非常明確：在聯合國大會一國一票這個體制下，若能推動討厭其西方宗主國的民族獨立成國，蘇聯則能擴張其在聯合國的勢力。故此，在當時蘇聯的提案中，民族只包括海外殖民地而不包括蘇聯通過陸路所擴張的地域。西方大國為了政治正確，不想反對民族自決的原則，於是便決定提出反建議，在沒有定義民族的前提之下，指民族應包括所有民族而不單單是殖民地的民族。蘇聯對此提案不置可否，但蘇聯其他的第三世界國家「盟友」卻覺得這個提案沒有問題，於是這個提案就由大多數的成員國所通過，成為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聯合國憲章》的一部分。民族自決就此成為了新的國際共識，但成為共識的代價，是「民族」一詞並沒有被定義，而是任由不同的陣營各自表述。

而這並不是惟一一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這個新的共識與「維持國家領土完整」這另一大國際法原則有著根本的衝突。容許民族自決，理論上就要容許民族脫離其身處的國家並宣佈獨立。然而，1970 年由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一方面指「一個民族自由決定建立自主獨立國家，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或合拼，或採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屬該民族實施自決權之方式」，另一方面卻又指這原則「不得解釋為授權或鼓勵」任何有損現有「自主獨立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統一」的行為。在這宣言中，國家的領土完整被視為先於民族的自決權，換言之，雖然民族的自決權被獲得肯定，但除非該民族得到其所身處的國家的同意，他們根本無法去實施他們的自決權。香港正正是這政治現實下，甚至喪失其殖民地身分的犧牲者。

但這是否代表民族自決這個原則只是形同虛設？我們當然無法指望憑著民族自決的旗號讓中共容許香港或西藏獨立。縱使如此，正因民族自決既是國際共識亦是有大量國際法理論與政治理論支持的概念，自決權亦成為不少民族抗爭的口號，亦是香港眾志的成立宗旨。這個共識亦為民族提供了一個站上國際舞台的機遇。民族雖非國家，但卻有權成為國家，亦因此成為了國際體系中的潛在成員。

結論：何去何從？

國際法既是政治角力下的產物，亦是不同知識分子跨越時空激辯之下的成果。現在的國際體系依然是以國家為本，但國際法卻提供了讓民族發聲的平台。隨著香港人 2019 年抗爭的光環減弱，我們需要留在這個舞台上的理據。以民族為軸的概念，提供了我們留在這個舞台的理據。當然，其他國家可能會因為中國的壓力而不敢幫助香港人。在現階段，民族這個軸心最大的價值或許在於讓香港人能更有力連結其他受壓迫的民族。正如《如水》第四期指出，奶茶聯盟面對的問題是不同的民族難以找到長期合作的基礎，亦難以向外人解釋為何他們是一個聯盟。民族自決既讓這些民族有了控訴中國的理論基礎，亦讓這些民族有共同的正面願景。但這亦意味著我們不能亦不用安於跟隨現有的遊戲規則。我們需要在國際體系中為沒有國家的民族爭取更多空間，這既代表我們需要參與國際體系中的種種角力，亦代表我們需要參與現在國際法與國際理論的辯論。當然，在這一切之前，香港社群必須有自覺地更好認識整個體系的歷史，並討論我們想如何介入這國際舞台。共勉之。

參考與推薦書目
Cassese, Antonio. 1995.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 Legal Apprais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sch, Jörg. 2015.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The Domestication of an Illu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Daniel. 2016.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arly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tts, Jennifer. 2018. *Bound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hilpott, Daniel. 2001. *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無名之地的意義：以帝國作為世界觀

作者｜木子雨



無名之地的意義：以帝國作為世界觀

作者 / 木子雨

旅居柏林的文化工作者，生活就是透過無間的翻譯與重寫尋找回家的路。

這個時勢，在西方民主世界談帝國世界觀，鐵定會被身上掛着烏克蘭國旗的人圍毆，死無全屍亦沒人可憐。尤其在我身處的德國，基於其近代黑歷史，任何有關帝國或國族主義的論述，在這裡都是零容忍的。（曾經有一名德國友人在我的書架赫然發現禁忌之 *Mein Kampf*，他震驚的反應讓我懷疑他以為自己結交了一個新納粹主義者並正考慮要否奪門而出。他說讓別人看見會很麻煩，我為了讓他安心就把它藏到 Hannah Arendt 和 Susan Sontag 後面了。也許我放一本《毛語錄》他的反應還沒有這麼大。）

但也正因為帝國主義帶來這麼多的恐懼與懷疑，才更加值得被討論。特別是九七回歸前，有百多年的時間，香港也曾屬一個帝國。九七年前出生的我們，意識裡總有一點帝國的影子。很多人提起「事頭婆」都仍語帶懷緬，也不用說前些年常在街頭出現的港英旗。對於我們的殖民歷史竟然顯得愛多於恨，有說法是亞洲一向缺少關於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意識與討論，因此即使現在流行說解殖，那也是進步派西方知識份子所發起的東西，很多前殖民地的住民其實都不知道甚麼是解殖、解殖要解決的是甚麼。不少近年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首次面對種族歧視和種族議題，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懂種族主義為何，被種族歧視了也不自覺。英國殖民治下久了，二等公民意識已然內化，對已沒落的大英帝國（實際何時終結，則眾說紛紜；一種說法是印度獨立，另一說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抱有無限遐想，BNO 當英國護照，同時又極不願意成為另一新興帝國的二等公民，這就是香港人對帝國的悖論。

早前威尼斯雙年展開幕，一向搶在前面高呼政治正確的當代藝術界年度大事件中自然少不了以藝術解殖的作品。毫不意外地，今屆金獅獎的國家館及主題展類別分別落在代表英國館的首位黑人女性藝術家 Sonia Boyce 以及同為黑人女性藝術家的 Simone Leigh（同時為今屆美國館代表）手上，二人的作品均涉及種族、性別及殖民歷史議題。獲特別提名的有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法國館，亦是首次由阿爾及利亞裔女性藝術家 Zineb Sedira 代表出展，以懷舊電影重構殖民記憶；主題展特別提名有因紐特（對，也是女性）藝術家 Shuvinai Ashoona，質樸的繪畫被喻為「對殖民主義暴力的控訴，提出透過聆聽原住民智慧，脫離我們此刻面對的困境」。相類議題的作品充斥整個威尼斯雙年展。這樣說可能會被罵政治不正確，但老實說不停看了這麼多解殖藝術我都已經開始有點過剩的麻木感，然而不認不認還需認的是：帝國遺產俯拾即是。

不止學術界及藝術界，第二代印裔英國作家 Sathnam Sanghera 在其暢銷著作 *Empireland: How Imperialism Has Shaped Modern Britain* 透

過大量史料文獻，鏗鏘有力的述說了大英帝國意識如何持續影響現今英國人以至整個世界。Sanghera 常引用的其中一位是剛於 2020 年逝世的著名英國作家 Jan Morris，其大英帝國三部曲 *Pax Britannica Trilogy* 以及其他帝國歷史著作，深刻影響了近代英國知識份子及政治家（Sanghera 引述一位英國文學評論家稱他們這一代精英在學時必修 *Pax Britannica Trilogy*，是為他們對大英帝國情結之啟蒙）；雖然遊歷閱歷甚廣的 Jan Morris 對帝國歷史不無批判，其流麗帶傷感的筆觸卻引發了一種對昔日帝國光輝浪漫懷舊之情，因此亦有人將他歸類為帝國主義者。而我之所以認識 Jan Morris 本身也是一種帝國遺產：作為大英帝國在殖民地建立的第一所大學的英文系本科生，莎士比亞、狄更斯之後，很自然的便讀到了 Jan Morris。只是當時我接觸的並非其帝國歷史著作，而是其更著名的旅遊文學。除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威尼斯遊記（以前遊威尼斯時也曾帶着），Jan Morris 更曾多次到訪香港，結合第一手珍貴史料及 30 年間的親身見聞，寫成被喻為當代最經典、詳盡的一部香港發展史 *Hong Kong : Epilogue to an Empire*。正是他在此書中如是說：香港是大英帝國最驚心動魄的終曲。

這又回到了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極盡精神消耗的威尼斯雙年展之行過後，我乘火車，越過當年海明威參與一次大戰的北意戰場（甚至很可能是他晚年的小說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裡退役軍官所走的同一條路線），兩小時後，湛藍得令人憂愁的亞得里亞海在右邊出現，我來到了鄰近斯洛文尼亞邊陲的意大利東北部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所有聽說我要來這個地方的人都顯得一頭霧水：那裡有些甚麼？而我這個前英國文學本科生總是帶點尷尬的解釋說：那是 James Joyce 寫 Ulysses 的地方，今年是 Ulysses 出版一百週年紀念。彷彿在這個解殖的年代，我們不可能再明目張膽的追崇帝國文學。同時我的背包裡還有一本 Jan Morris 的封筆之作 *Trieste and the Meaning of Nowhere*。

原本我也只是想要了解多一點這鮮有人知的城市的歷史，沒想到才看了幾章，香港的名字已經出現幾次。作者指香港可能是最接近的里雅斯特的類比：香港是大英帝國遠東意圖的宣言，的里雅斯特為奧匈帝國亦具同樣的象徵意義。跟香港開埠發蹟的故事幾乎同出一轍，哈布斯堡王朝下的奧匈帝國於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二百年間，將中世紀漁村的里雅斯特改造成一個現代化國際港口，是帝國主要港口及海事力量宣言，擁有自由港的特權。自由貿易帶來資本也帶來人才與文化，不少著名文人及藝術家曾在盡是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歌劇院維也納風咖啡館的的里雅斯特留下註腳。多元種族語言宗教共融、開明且國際化的的里雅斯特曾被視為帝國理想的彰顯。正如香港也是大英帝國的奇蹟。

然而 Jan Morris 說，的里雅斯特是一個悲傷之地。她的湛藍海灣異常的寧靜，海鷗寂靜無聲的滑過頭頂，生怕驚動路上沉鬱的年老住民的樣子，跟威

尼斯搶吃旅客手中食物的凶悍白鳥彷如兩個物種。本來的里雅斯特就是帝國的產物，為帝國而存在。當奧匈帝國於一戰後瓦解，的里雅斯特被納入意大利版圖，失去帝國的的里雅斯特同時亦喪失了存在意義，曾經的繁華港風光不再。這自然又讓人聯想到香港的命運：在新帝國治下失去自由及自主固然可怕可恨，但也許更讓我們恐懼的是失去前帝國的東方明珠將不再閃耀，淪為大灣區內界線面目均模糊的無名之地，在世界歷史上的任務終結，不再為人記起。難以言諭的鄉愁，因為家鄉已然失落於歷史之中。

一個地方的興衰總是跟帝國／大國的意志尤關；身不由己的人民好像就只能接受不停的被重新定義自身國籍邊界身份與歸屬。走在彷如停留在帝國時光、未受戰火及現代化摧殘的的里雅斯特大街上，相比熱情開放的意大利人，的里雅斯特人異常沉默寡言，一縷縷飄浮在帝國遺址上的幽靈。我好像也感受到了 Jan Morris 形容的這城的哀傷，失去身份與歸屬的在地的鄉愁，就如同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然而來到書的終章，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一線生機：時空一跳來到廿一世紀，新一代的的里雅斯特嘗試重新為自己建立新的意義，一邊廂不斷尋求書寫記念其複雜難言的歷史，另一邊廂亦發展各種新事業，更於 2006 年獲選意大利最宜居城市。

旅遊業是一個自然的選擇，寬廣光潔的大街明顯曾被徹底悉心重新規劃成行人專區，大小廣場一再浮現，博物館美術館趕上現今規格，很多都免費入場且附英文解說，比很多意大利旅遊城市還走前一步。文化歷史的旅遊業資本潛力旋即被發掘，包括其帝國歷史。馬西米連諾一世參考德國新天鵝堡（也是德國民族主義的一個彰顯）所建的 Castello di Miramare 為的里雅斯特主要景點，受奧匈帝國影響的本地食品成為一件事（像港式奶茶的概念，但差太遠），老維也納風咖啡館晉升為「歷史咖啡館」供人朝聖。Caffè San Marco 除了讓人打卡亦延續了其作為文人聚集點的傳統，一半店面為書店，一邊廂我喝着盛在玻璃杯中的 Capo in B（的里雅斯特的 Cappuccino），那邊廂書店一角就有新書發佈會進行中。在的里雅斯特三天我最喜歡的是沿着市內的文化歷史觀光徑走，在大運河畔跟正舉步前往咖啡館的 James Joyce 銅像一同眺望海港外夕陽無限好，想像盛夏之際海邊充斥了國際沙灘排球賽或音樂節訪客的模樣。另一個比較新穎的面貌是科技中心，的里雅斯特市內外散佈了大大小小有國際連結的科研機構。無論何種行業都必以的里雅斯特的國際性面貌所串連，建立成一種的里雅斯特模式——的里雅斯特前市長、著名意大利咖啡品牌 Illy 的後人 Riccardo Illy 如是說。（忽然想起步行街的 Illy 店櫥窗內放了一系列跟艾未未 crossover 的咖啡杯套裝。那也是一種面向國際的與時並進？）

以 Jan Morris 的話說：的里雅斯特就像是服食了偉哥並重振雄風。也許是 Riccardo Illy 的開明領導，讓的里雅斯特從昔日光輝舊夢醒來，重新出發。也許是新歐洲給予的里雅斯特回歸的機會。也許是全球化的活力擴張使然。

也許是——而我也覺得這是最重要——的里雅斯特發現的里雅斯特最好就是做回自己，一個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歷史的城市，否定單一的國族。擁抱多元才是出路；意義不能只得一個，就是服務一個國家。沒有帝國加持但秉持帝國時期的多元文化主義，在現今種族宗教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前提下實踐，讓各種各樣的人和平共存又互相歸屬。當新舊帝國均不可能成為我們的救贖，連結香港人的除了我們消逝中的共同歷史，還更需要我們在現世中重新為自己建立新的身分與意義，即使香港將再度回歸為一片無名之地。就像從來沒有屬土、甚至沒有固定名字的羅姆人（吉卜賽人），在今屆的威尼斯雙年展也能找到他們的位置，訴說他們的流浪者之歌。

撰於 2022 年 5 月 9 日柏林



以______作為世界觀

以架空歷史作為世界觀

作者｜Fiona C.



以架空歷史作為世界觀

作者 / Fiona C

因為想減少與人類對話所以走去英國公園餵雀時深感人禽或本無別的自由身記者。

人是一種自然會思考 What if（假如）的動物，特別適用於作錯決定和開始後悔之時，無法理解為何目前如是，於是猜想所謂平行時空的另一個可能結果。恐怕人生是沒有 Take Two 的，歷史卻有推翻的可能……甚至改寫、反事實。

俄烏開火，各方媒體紛紛分析普京的崛起、回溯蘇聯時期的烏克蘭歷史、側寫普京腦中打算如何改寫西方定義下的世界秩序，令部分人一覺覺醒，自二戰後仍會出現為侵略而訴諸戰爭的大獨裁者，好像不是突然一天建成的羅馬。當 2014 年俄羅斯吞併（俄式用語：奪回）克里米亞，早有學者、時事評論家指出，普京的意圖最終是收復烏克蘭。以 8 年時間應驗一個預言來得有點早。

俄羅斯果真入侵烏克蘭，不但震驚各位西方世界的領袖，餘震更波及因為 Maiden 革命油然而生命運共同體的感覺，而關注烏克蘭的香港人。西方主流媒體中，俄羅斯以對立於西方世界而存在的姿態從未消失——行寡頭政治、無普選的選舉制度、當權者改憲永續權力，顯得與西方普世價值背道而馳。於是，單方面對俄羅斯的解讀，很容易落入「就是很獨裁、很不自由的國家吧」；俄羅斯更是與中國自上世紀 20 年代，自共產國際對外宣傳，就開始千絲萬縷的歷史瓜葛：沒有蘇維埃政權就沒有當今的中共。香港對俄羅斯的印象，難免摻雜香港對中共的各種解讀和立場。若單純歸類中共、俄羅斯在光譜的一端，西方國家在另一端，恐怕就會錯過理解俄羅斯打這民族主義的牌擴張版圖，其實歸根究柢，就是其建構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手段：「架空歷史」以取得統治的正當性。

「架空歷史」的威力在於定型過去被記住的方法。誰掌舵了這種方法，就塑造了現代話語權，箇中存在根本的主觀性，即可理解是一個統治者（及依附其的政權）的意志。在現今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主流認知俄烏交戰，是俄羅斯捍衛民族團結之舉，烏克蘭獨立意識是西方扶搖下的產物；普京借打民族主義的牌，以合理化向烏克蘭開戰乃是一項「軍事任務」。要使普京版本的俄羅斯民族成立，先須空白過去一個世紀的蘇聯統治及其遺跡。透過架空歷史，俄羅斯民族歷史被架空至回到十月革命以前，回到俄羅斯以帝國立足世界的起始點，重新展開俄羅斯民族的編年史。

5 月 9 日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日」，莫斯科紅場出現一排排坦克車，乍看之下影像重疊地看，把紅場置換成烏克蘭東邊任何一個城市都不失違和感。那一磚磚坦克車駛進的，更是普京一個憑架空歷史而建構出的現代俄羅斯。

「架空歷史」作為一種想像世界的方法

架空歷史實際如何操作起來？架空歷史的根本問題不旨在發問 What if，它以回到一個歷史轉捩點、爆發點開始回應現狀，在叩問的更是「What could have been」。即使明知這一切不過憑空想像。對普羅大眾而言，基於對目前狀況的不滿，架空歷史的想像可以單純出於「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是那樣就好了」，以獲得某程度解脫；但對當權者來說，架空歷史達到的政治目標，直如建構歷史話語權：因當前的歷史不利建立其統治正當性，不利民族統一的歷史進程，於是提出一個假設性想像，並逐漸從文化引介、從學者、從媒體一環扣一環地加強敘述。架空歷史不但是推翻過去，更是透過空白過去，以服務目前的政治需要。

架空歷史最先以科幻小說文類進入視野。1945 年二戰結束後，在美國土壤上最盛行的幾個主題，其中包括 What if 納粹德軍戰勝了蘇聯。英語世界學者對它作為一個文學介入歷史的概念進行文學類型的研究，卻是近年 1990 年代才冒頭。它不局限於科幻小說的分支，出現「烏有史（Uchronia）」這文類。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歐梵解釋，Uchronia 是應 Utopia（烏托邦）而生，「烏托邦側重虛擬的理想世界，烏有史則發展正史以外的另類」。美國作家 Brian Aldiss 認為，架空歷史類型的小說是有距離地看歷史，以此創造容納得下幻想（Fantasy）的當下。

在美國的語境，歷史何時被架空，關連美國與蘇聯的關係。奇妙在蘇聯的語境重述一次仍然合用。當蘇共實行的絕對系統要借用歷史解釋源起，並必須是在歷史決定論下的詮釋，把歷史說成命定，即鄂蘭指「陳述一切歷史事件是依靠與命運相連的第一因」，架空歷史則同樣被用作加固民族主義和建構世界秩序的手法。以下嘗試分別略述美蘇如何透過架空歷史，各活一種想像。

研究美國架空歷史小說的學者指出，1940 年初出現 What if 納粹德軍戰勝了蘇聯的想像，是為了向美國大眾宣傳美國參戰抵抗希特拉的必要性，於是小說家主要著墨在納粹德軍的暴行，虛構由納粹統治美國大小城鎮的災難局面。至 1950 和 1960 年代，這主題仍然盛行，出現「反烏托邦」的元素，以加強納粹有多反人性和可怖，從而鞏固現實中美國戰勝納粹的「史實」、美國參戰的歷史正當性。

但踏入 1970 年代，納粹的形象在架空小說中開始轉型。一方面戰爭勝利者的光環不宜久戴，加上越戰和拉鋸近 20 的美蘇冷戰，美國社會開始有輿論提出，納粹德軍「Could have been」勝出二戰，擊敗蘇聯、取得莫斯科，世界秩序就不致落入冷戰，歐洲的統一也由另一名比希特拉務實的納粹領袖，引領向更好的方向。曾經駭人的納粹勝出二戰這結果不再令人震驚——當目前比想像會發生的結果還糟糕。歷史學者 Gavriel Rosenfeld 認為，美國人對納粹的觀感是隨著美國戰後的財力和國力波動。

另一邊廂，在俄羅斯語境下，架空歷史的操作由執政的當權者決定，以順應其時的意識形態宣傳需要。歷史在大眾認知中分成官方的和可交替的（Alternative）。部分大眾認知的歷史即使明顯推翻官方說法，如 1950 年代被斯大林流放的政治犯，從古拉格中回來，寫下個人回憶並由暗中活躍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發行，但對俄羅斯人而言，歷史好像一個定期變換的餐牌——於是可以選擇相信、不相信甚麼，但無論如何，那些你沒有選擇吃的食物，餐廳還是會供應的。

這餐牌亦非一成不變。官方的歷史，論調和定義都會有規律地隨領袖更替而改變。有別於美國架空歷史的發展，俄羅斯版本的架空歷史，並非最常見於小說，而是以公眾論述的形象出現在政治、媒體、學術圈。1988 年、蘇聯倒台前數年，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為經歷過斯大林流放的政治家 Nikolai Bukharin 平反時，重提Bukharin提出過的設想：若斯大林沒有在蘇聯官僚內上位，1928 年至 1940 年那場農業集體化（導致烏克蘭數以百萬計人死於饑荒）大可避免，蘇聯幹部之間的風氣亦不致互相猜忌。時值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將蘇聯向世界開放，外國媒體限制放寬，資訊漸變流通，Bukharin 對蘇聯的想像正正回應，若果架空斯大林統治這部分，他理想的蘇聯就會是 1980 年末的開放蘇聯。

至蘇聯真的倒台後，同年出現的架空歷史論述，好像剪輯舊式電影膠卷般，大刀闊斧剪走整段蘇聯時期。數學家 Ivan D. Kovalchenko 發表研究 1906 年至 1917 年的 Stolypin 土地改革，指這次土地改革的確加劇地主和小農經濟，但他認為無論如何，布爾什維克執政的蘇共，不可能在不侵犯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得以廢除土地擁有制。由此，他邀請俄羅斯大眾想像，如果十月革命沒有發生，現代俄羅斯如何回歸第一步，由農村開始社會主義創世紀。

這股「真空蘇聯」的想像熱潮繼而出現在俄羅斯小說，有小說家構想若一戰時，沙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沒有參戰，布爾什維克革命又或不會發生。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就會由該時該刻，繼續以一個帝國、俄羅斯民族身份，走向現代化。

由此看來，以架空歷史作為工具想像過去世界，並非單屬個別政治體制、行極權與否的國家專利。架空歷史的威力在於，它能夠以天馬行空的想像與現實語境對話，尤其當社會面對一個困頓的現實。

架空歷史重回歷史現場

循此理解下去，俄羅斯社會的主旋律始終圍繞著俄羅斯作為一個帝國是自然和命定的。俄羅斯大眾、蘇聯過渡下來的知識分子，透過想像歷史 What if，將因蘇聯瓦解後而無可安放、獲得解釋的個人遭遇，置放在開放改寫空間的架空歷史內。大眾甚至自然傾向認為和存疑，一定由背後強大力量操縱，以圖重置世界秩序，否則無以解釋蘇聯的失敗。亦因如此，俄羅斯宣傳機器塑造西方是阻止俄羅斯民族統一的敵人，尤獲大眾接受。

蘇俄政體研究（Kremlinology）的分析多年來吃力地嘗試辨清，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克里姆林宮這猶如雞與蛋的次序關係：究竟是民族主義為俄羅斯社會定調，再被克里姆林宮挪用、改裝；抑或克里姆林宮定調了俄羅斯民族是甚麼，因而改裝民族主義的定義、內涵等，而變成當代俄羅斯社會。架空歷史則精妙地重新設置歷史場境，無視歷史重擔、責任、教訓，有如一個新造的人——或在普京的構想中——復興以帝國統治為中心的俄羅斯民族。

今年 2 月 22 日，俄羅斯進攻烏克蘭的前兩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宮的演說，將烏克蘭定義為「俄羅斯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強調的歷史必然性，既對歷史決定論作了扭曲的演繹，也顯然空白了烏克蘭獨立了逾 30 年、這段順時序的歷史。由是，若問如何以架空歷史理解現在世界？2 月 24 日俄烏戰爭展開，至走筆之時今日烏克蘭進入第 77 日戰爭，這血肉橫飛的現實就足夠回答了。

仍有可以想像的未來嗎？

歷史轉捩點與架空歷史出現的關節點既同生又共生。透過理解架空歷史的構成和工具用途，我們得以解答為何現代國家為了迎合政權的政治議程、重整現代世界秩序、為目前政權確立正當性而問 What if，並藉此淡化過去。

但人問 What if ，可能真的沒有這麼複雜，不過是人對現實的看法不斷改變，或者當預見無明無措的未來，構想這不理想的目前，不會與未來有關，或未來可以脫離目前。

香港也出現過架空歷史小說，為思考歷史轉折提供線索。香港作家陳冠中 2015 年寫下的烏有史小說《建豐二年》，故事其中一名主角東蓀在 1949 年國共內戰後選擇逃到香港，其往後 30 年的人生，都在思考「假如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命題。對，陳冠中的小說背景，就是國民黨勝出內戰，共產黨從沒有管治現代中國。

主角東蓀說：「不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執政，都不是歷史的必然」，但當一個執政黨上台，他又問：「人們已失去能力設想，如果共產黨管治中國會比現在更好或更壞？」

只是我們未活到下一個歷史轉捩點，從未來另一個爆發點，再架空目前的種種歷史去問，「如果共產黨繼續統治中國當如何？」

純粹一飽想像的自由。留待不容改寫的歷史到時回答，更好或更壞的問題。

參考資料

陳冠中：《建豐二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Glasser, S. (2014, March 13). Putin on the Couch. POLITICO. Retrieved May 10, 2022,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3/putin-on-the-couch-104647/

Laruelle, M. (2020). Russian Nationalism: Imaginaries, Doctrines, and Political Battlefields. London: Routledge.

Rosenfeld, G. (2002). Why Do We Ask "What If?" Reflections on the Function of Alternat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1(4), 90–103.

Schneider-Mayerson, M. (2009). What Almost Was: The Poli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Alternate History Novel. American Studies, 50(3/4), 63–83.



Source : Simon Zhu on Unsplash



以＿＿＿作為世界觀

如果以同理心作為世界觀 戲劇作為歷史的框架

作者｜水蒸球



如果以同理心作為世界觀
戲劇作為歷史的框架

作者 / 水蒸球

沒有成功變成水蒸汽，唯有先做一個水蒸球。

（1）

有這樣的一個片段：某年夏天，我們家到越南旅行，是那種，現代知識分子嗤之以鼻的鴨仔團旅行。一行四十多人大都是中產家庭，在酷熱中被趕下車、看景點、趕上車，如此這般很多次後，到達聞名中外的湄公河。我們跳上小船，也顧不得周圍的景色，只覺得能歇一歇真好。

下船的時候，船夫問我們要小費，爸爸二話不說就給了。同團的團友都沒有給，還大聲說船夫貪心。

「船夫貪心！」小不點我也跟著說。

「這不叫貪心呢！撐船很辛苦，而且他們生活環境也不很好。」爸爸說。

「你工作也辛苦，可是你沒有小費。」

「嗯，撐船收入不固定，小費是可觀的補貼。而且越南尚在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比我們低，辛苦工作也賺不了很多錢。船夫不過想要一杯雪糕價錢的小費，我們就不要吝嗇喇。」

小不點我當時收貨了，暗暗覺得爸爸真善良。

當然，今天看來，這段教訓盲點甚多。首先，爸爸對越南的看法全憑印象，毫無考證，充其量是富有地區對貧困地區的一種浪漫想像。而且我們跟船夫全程沒有交流，憑甚麼假設他是劏房戶而不是隱形富豪？再者，我們對同團團友一無所知。胡亂批評別人吝嗇，真是莽撞。

我有這種覺悟，是很多年後的事了。

（2）

在我小時候，中產是小確幸的代名詞。「行有餘力、必以助人」、「多多益善，少少無拘」都是中產樂意實踐的座右銘，一切都溫柔而美好。然而，在九十年代及千禧年後，中產卻成了「溫室」、「離地」、「無所作為」的象徵。八十年代他們受惠於知識型經濟起飛，讀書脫貧，秉承「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做人宗旨，很少思考制度不公義。但對九十年代後的年輕人來說，中產本身就

是不公義的象徵。制度失衡令年輕人失去上流機會，全球化凸顯了富裕和貧窮地區的差異。我們口口聲聲要有教養，卻把日常消費的污染全部讓發展中國家埋單。這些體會，顛覆了我對善良的理解。

香港中產如我們可趁假期去旅行，越南船夫的孩子卻想必沒有這個機會；我的教育教我理解不公平，三餐不繼的孩子卻只能直接體驗不公平的現實。我就算沒有贏在香港的起跑線，也肯定跑贏窮困地區的孩子幾條街。用這種視角來看，爸爸給的小費，微不足道。

結論是，我存在所造成的不公平，遠比我窮一生之力能夠平反的多。那麼，我還是直接蒸發消失好了，我想。

大學畢業後整整十年，我選擇的交際、工作和行動，都出於對這種罪咎感的補償。可是，我自虐到無力，還是找不到一種讓世界變平等變美好的方法。

在精神極度繃緊的邊緣，我跟一位讀心理學的朋友傾訴。她聽後直接反白眼：「天啊，你想蒸發是因為你和你爸都只拿了善良試卷七十分？變態！」

我反覆思考她的話。實情是，我並不是反對中產想要行善的心（intention），而是他們胡亂稱善的莽撞，現代術語稱為「膠」。爸爸和我受制於生活經驗，無法也沒有嘗試真正了解別人的處境。如此，一切的善良都變成偽善 ——一種裝飾自己不求甚解、懶於求變的偽善。

我要修練的不是蒸發，而是同理心。

（3）
同理心一詞，起源自西方，英文是「em（感人）」「pathy（所感）」。我喜歡這個概念，因為它和「多元」和「向善」基本上是雙生的。有需要感人所感，也就是承認人所感不同。承認和嘗試理解這種不同，就是「多元」的基礎；面對多元不嘗試消滅和打壓，本身就是一種善。

感人所感需要長時間觀察、溝通、換位思考。最難的地方是，我們有時連換位的基本語言和概念也沒有。

最近我幫忙辦一個歷史相關的課程，課堂資料中有個倒轉的香港地圖。我本能地把它修正了，回傳給老師。

老師笑我不學無術。

原來，這張圖想解釋的是 19 世紀漁民的世界觀。當時，漁民從南中國海南

下到香港，對他們來說，香港島是最北，新界沿岸是最南。除了東南西北跟我們相反，漁民對島嶼和陸地邊界概念也跟我們不同。他們以海為家，海才是主人，島和邊界不過是配角，充其量作導航用。我以一個陸上人的認知去演一個海上人的角色，像香港大台的肥皂劇，演出注定非常膠。

人類學者 David Graeber 最後一本大著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嘗試重塑人類歷史，開首數章集中談歐洲人與殖民地原居民的互動。Davd Graeber 痛恨不公平，著作為弱者發聲不斷。然而，他在這本書中強調，「現代人研究原居民，一般都帶著自己的agenda。要麼把他們當成原始智慧的典範，推翻歐洲帝國論述；要麼視作比歐洲次一等的文明，以淡化殖民者的惡行。可是，如果我們要真正從歷史中明白甚麼，也許得把找到的文獻重看一次，嘗試重塑當時的情形，這才真正對我們理解人類的過去與現在有幫助吧。」也就是，認真地搜集資料，以角色換位的方式把對象的生活在腦袋中活一次，是為同理，也是理解歷史和周遭事物的良方。

以文首片段為例，如果我有足夠資料，把爸爸和船夫的角色在腦中各扮演一次，他們對我而言，就不會單是階級的投射。他們的互動要怎樣才符合我對善良的理解，肯定也不受限於階級框架。當然，資料搜集無法當場做，唯有靠日常多讀多問，臨場不過是一種本能發揮，像即興劇，既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學習，也是一種次次新鮮的經驗。

別忘了，每場即興劇都不止一人在演，對手們都按著他們的步伐在日常生活中修煉同理心。到底遇上豬對手還是神隊友，絕對影響臨場效果。如此，善良的模樣就沒有定式；我們只能各自修行，讓每場即興來得更精彩。

這樣相對於蒸發好玩多了，也謙虛多了。畢竟，我到底是哪來的自信，覺得只要我個人變好，就能一下子解決整個階級的不平等？

（4）

最近，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新聞所見，滿目蒼夷。

朋友咬牙切齒，認為北約必須冒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出兵救烏克蘭。我沒有搭嘴，他認為我冷血。

「冤枉啊！」我說。「我只是覺得自己連搭嘴的基本知識也沒有啊！」說北約不應出兵，烏克蘭人民應該自生自滅嗎？這是冷血。事實上，我看新聞上的慘況看得失眠連連。可是，說北約應該出兵，冒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牽連各國的危機嗎？老實說，我連北約和烏克蘭的關係也一知半解。第三次世界大戰意味甚麼？是核戰嗎？是更多人口流離失所嗎？我全都不知道。在這件事上，

我無知得無法判斷。而且，無論我怎樣回應，也對現實完全沒有影響。簡單來說，這不是我有份演的一場戲。

在高度全球化、平權情緒高度敏感的今天，資訊排山倒海。我們彷彿對每種不幸與不平等都要迅速取態、歸邊、反應。然而，即使我們在同一個歷史時空，戲也分很多場，不是每場你都有份演，不是每場也有你與對手即場互動的空位。我只能本著同理心，認真惡補我所不認識的背景資料。

俄烏戰爭，我做了基本的人道捐款後，便拜託研究東歐政治的朋友傳來一系列書目，嘗試理解俄羅斯與東歐這個板塊的歷史。這些朋友中懂俄文的人不少，替我分析東歐和俄國媒體的報道。因著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限制與差異，這些文獻所表達的觀點與資訊，與我能夠讀懂的西方媒體不盡相同。此外，雖然這些東歐學者全都大力反戰，可是他們對西方政權的熱心同樣冷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從未脫離冷戰的思考模式，對當代俄羅斯和東歐不求甚解，只求排擠。在這場戰爭以前，東歐和俄羅斯的藝術家、運動員、專業人士都經常單純因為國籍，被排擠在各大國際項目外，國民深深不忿。這樣，普京打著讓俄羅斯抬頭的旗號，當然吸引啊！他的獨大，西方有份造成吧。你看，戰爭一開始，西方多個藝術機構就宣布杯葛俄羅斯藝術家，其中不少冒著被處死的危險勇敢發聲反戰。在極權底下反極權的人，根本沒有得到國際支持。那些以為西方代表正義的人，還是清醒一點吧。」他們說。

我聽著，心裡一陣厭惡 。我多麼希望他們印證普京就是壞人，我大力加入打怪獸就好了。然而，這是同理心嗎？不是。是我所定義的善良嗎？不是。尤其是在一些我沒有戲份的戲裡面，我更加覺得自己的逼切性不是下判斷，而是盡量理解，等我在一場有戲份的戲裡面，不至交出無知的白卷。

（5）

以同理心作為世界觀，歷史這場戲不會有戲劇性的即時改變，可是它裡面的演員，都能從濫竽充數的臨記，慢慢變成功力深厚的老戲骨：分別不在於戲演多了，變虛偽了，而是因為時時刻刻嘗試角色互換，歷練幾何級增加，戲也自然更成熟了。

我想，他們演出來的劇，也許會貼近善良多一點。

以____作為世界觀

以科技作為世界觀

作者｜破曉



以科技作爲世界觀

作者 / 破曉

夢想係搞一個新聞台，但而家因為要確保自己第時可以隨時隨地食到茶記嘢食而拖延中。

“ When Moses approached the camp and saw the calf and the dancing, his anger burned and he threw the tablets out of his hands, breaking them to piece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 —— *Exodus* 32:19

《出埃及記》相傳，摩西看見有人膜拜偶像，一怒之下將刻有上帝十誡的兩塊平板摔碎。12 年前，當喬布斯準備發佈 iPad 時，他引述此事，指自此以來人們從未對平板感到如此興奮。世界的焦點早已由狂熱的宗教轉移到冷酷的科技。

「人皆生而欲知」—— 亞里士多德

「世界觀」在三千多年間歷經鉅變，這詞最確切的翻譯源自德文“Weltanschauung”，意思並不侷限於對世界的概念，更重要是指對世界的一種態度，包括如何看待世界、自然與人類的本質。由於心理學定義的態度反映個人對其他事物的意願優次，世界觀可理解成個體適應世界時，就自身認知、情感和行爲而建立的一些原則。

無獨有偶，「科技」一詞亦由德文中的“ Technik ”翻譯而成，廣義沿襲亞里士多德概念，反映一切由人類實現以達成自身目的技術工藝，但狹義則代表工業革命後應用科學而發明的技術。「科技」的定義暗示人類對待世界的態度在近代出現了重要轉變。古代或現代科技都對世界觀產生深遠影響。歐洲史前時代包括石器、青銅器及鐵器時代即以當時人類使用的工具作爲分類。北美演化進程中的蒙昧、野蠻和文明階段同樣以用火、農業與文字系統等技術作分野。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 賁卦彖辭》

文明的開端標誌著人類探索身份之謎的起源。我們抬頭望向天空，渴望尋求自身在世界的位置，解答社會秩序的起始。古典時代文明的世界觀由天文學開始逐漸成形。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宇宙論的概述以形而上學想像出天球模型。當中地球爲靜止的宇宙中心，與月球之間存在四種基本元素，而月球、太陽和其他星體則圍繞地球以完美的圓周均速運行。

如果將數字系統都視爲科技，畢達哥拉斯追求運用數學解釋萬物現象則爲

當時科技影響世界觀的重要例子。亞里士多德也認同天體是完美而恰如其分，進而建立對人類美德和政治學的論述。例如土屬性的石頭從手中放下，自然墜落泥土，管治城邦的人自然須具備美德。根據論述，他推崇的共和政制（Polity）只限擁有美德的公民參與，現今被視爲普世價值的民主（Democracy）在當時按劃分卻是敗壞的政制。

古希臘學者托勒密沿用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以當時而言相當複雜的理論和計算出版著作《天文學大成（*Almagest*）》，從此統治歐洲以至伊斯蘭的世界觀超過 1,500 年。

亞里士多德之後，部分神學家將地心說用作鞏固教會地位和合理化當時的社會秩序。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的奧古斯丁認同上帝從虛無中創造世界，故此萬物依附上帝，理性和哲學因而臣服於信仰之下。他又強調《聖經》經文內容不應單從字面理解而忽略當時背景，變相令《聖經》中有關大地永不動搖的描述，在日後減少受到質疑。

奧古斯丁之死開啓了歐洲中世紀時代，他的世界觀持續影響後世。至十三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重新將亞里士多德哲學融入基督教教義，並引述托勒密觀點爲其辯護，例如指出天球最外層是天堂，而天球所包圍的地球是最爲物質化和粗糙的宇宙中心。如斯描述對世界觀的影響亦可反映在但丁的著作《神曲》之中。

受制於科技進展，托勒密體系一直被視爲符合個體認知而且經充分論證的情況下，新學說和觀察乏善可陳，衝破宗教枷鎖的政治制度亦難成氣候。

久違的突破點在黑死病疫情席捲歐洲後出現，文藝復興下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人類邁進了知識普及化的大衆傳播時代。儘管在古希臘時期已有日心說討論，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利用前人的準確計算和觀察數據，成功解決托勒密體系中因應行星逆行等難題而出現的不完美設計，得以寫成著作《天體運行論》並流傳後世。

教會最初並不關注此書，直至伽利略使用望遠鏡觀察天空後支持哥白尼理論，科學革命已一發不可收拾。此後丹麥天文學家第谷（Tycho Brahe）雖然創造了一個所有星體圍繞太陽，而太陽圍繞地球的折衷系統，但反而是他收集的天文數據讓開普勒發現行星三定律，啓發牛頓證明全宇宙都適用的萬有引力。

以觀察驗證假設的科學流程配合技術進步，徹底推翻過千年來的世界觀。天空並非完美無缺，地球和人類也不是宇宙中心、而天與地亦非運行一套二元規則。亞里士多德的世界觀崩潰，引伸的政治學亦被質疑。

在追求理性的啟蒙時代，神權墮落，由洛克（Locke）和盧梭（Rousseau）等哲學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原則終被接納。在海上，儘管航位推測法未被處於萌芽之際的天文航行所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造船術進步，使人類步入大航海時代並發現新大陸，亦導致國際貿易大行其道。而美洲農作物進口，加上羊毛出口需求大增，令英國農業出現農業革命和圈地運動，農民遷居城市後，亦引發工業革命。科技令世界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

若此刻時間靜止，我們可歸納科技的用途是解決人類的問題和需求，只要科技成功達成這點，創新的結果將是線性且正面的。即使人類的善惡可決定使用科技的後果，根深蒂固的科技思維始終會引領人類找到解決方案，使我們的時代脫離過往歷史的束縛。以上正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所持的科技世界觀。

「1961 年 10 月 30 日，蘇聯在新地島試爆沙皇氫彈，威力是二次大戰所有爆炸總量的十倍。」

由兩次大戰到冷戰，人類科技到達巔峰，卻帶來前所未有的破壞力。科技爆炸性創新，成爲人們在相互毀滅保證陰霾下生活的藥引。學者於是提出「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推翻以往看法，不再將科技理解成價值中立，而是蘊含權力慾望和效率追求。

科技不是爲了協助人類達成目的，反而是其邏輯反過來決定人類社會走向，可能帶來危險，且影響放諸四海皆準。後來理論分別發展成硬決定論和軟決定論，前者更偏向命定論，深信科技出現所產生的後果是必然的。舉例說明，工業革命後需要龐大市場外銷大量產品，使英國海軍擴張至當時科技落後的中國，但珠江水深太淺、舟山不便航行，水深港闊而得天獨厚的香港殖民地命運由此決定。後者同樣承認科技的主導地位，只是傾向塑造社會的過程中仍有抉擇和改變的機會，對科技的決定性稍作讓步。

「互聯網是首項由人類發明但不理解的事物，是史上最大型的無政府實驗」── Google 前行政總裁施密特

互聯網的出現使「科技決定論」遇到不少挑戰。工具主義觀點無法從電纜和電腦等硬件預視到互聯網的誕生，「科技決定論」則無法預言人類與互聯網互動對社會造成的後果。有見及此，學者再提出「科技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理解社會塑造科技的過程。

人類有能力利用、改進和適應科技，由文化和政治經濟力量主導選擇的科技則反映社會的規範和期許。科技與國際關係的互動亦隨時代轉變。工業時代普遍認爲最能夠解決人類問題的科技終將面世，而國家在現實主義中

是自利自助，世界因而奉行汰弱留強原則，科技實力則是衡量權力以至世界秩序的指標。核彈的威懾效應改變了戰略思維，互聯網則使國際關係行爲體不再侷限於國家，而戰爭實力變得非對稱。

踏入資訊時代，科技一度被視爲擁有自主價值、能影響社會的外力，即使是國家的行爲也由科技所主導，但不同國家和用戶塑造的科技發展，重新讓人構思出一個由社會建構科技的世界觀。

科技終結由宗教主導的社會秩序，衝擊由國家壟斷的國際秩序，人類如何使用科技則可能定義世界秩序。最近，我們見證科技帶動的全球化和軍事化如何讓疫症和戰爭的影響重演，不過同時亦利用科技反擊。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面世，以及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的出現，使疫情受控。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以守舊思維推演各國反應，偏沒有預料過科技可影響戰局。在俄國，電子支付系統遭到凍結、官方媒體在社交平台被封鎖、軍事設施的衛星影像被公開。在烏克蘭，SpaceX 開放了星鏈系統維持網絡連繫，政府在炮火中將加密貨幣合法化用以加速戰爭物資購置。政府應對難題越顯得束手無策，創新科技的解決方案尤顯重要。擁有相同信念的個體在災難當前走在一起，能否運用科技打破國家主權的框架而重獲自由？

“God isn't compatible with machinery and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universal happiness. You must make your choice. Our civilization has chosen machinery and medicine and happiness.”—— *Brave New World*, Aldous Huxley

落筆之際筆者碰巧走進了一間教堂坐下，前方的耶穌受難像默默俯視著二人，而他們卻正在低頭滑動屏幕。科技取代宗教，是否只代表我們的自由被另一種現象所剝奪？你也許聽說過摩爾定律和科技奇異點理論，預計科技以倍數甚至指數式增長後，人類會碰上世界觀遭顛覆的一日。人工智能、量子電腦和腦機接口技術在過去十年迅速發展，使我們感覺離這天越來越近。

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預言一個利用科技追求極致享樂和福特主義的國度，最終科技變成另一種宗教令人失去自由。這是科技世界觀的第一個結局。

“On January 24th, Apple Computer will introduce Macintosh. And you’ll see why 1984 won’t be like 1984.”—— Apple Computer’s 1984 advert

另一結局似曾相識。奧威爾的《1984》中極權用電幕監控民衆和控制思想，分別是自由消失是由政權而非人們所要求，這令人聯想起監控資本主義。兩

部著作中的科技都被政府所操控，縱然世界觀有所不同，他們一致悲觀地認爲科技發展的結局是人類喪失了發展科技的初心。

也許兩位作者各自預言了科技在不同國家的發展，卻至少印證了人類反思科技的能力。我們最終在《1984》預告的年份迎接一則宣稱預言落空的蘋果廣告。喬布斯在發佈第二代 iPad 的時候以只有科技而沒有人文是不夠作爲結語，他在同年與世長辭。

在世界觀和科技一詞的發源地，德國哲學家海德格認爲科技的本質是「解蔽」，因追求真理是人類的命運，過程中我們獲得自由和科技帶來的危機，能夠意識到有機會解救世界的，仍是人類。



Source : Andrea De Santis on Unsplash



從烏克蘭看世界

柔弱或剛強？烏克蘭婦女在反抗政治中的挑戰與定型

作者｜夏浦



柔弱或剛強？
烏克蘭婦女在反抗政治中的挑戰與定型

作者 / 夏浦

俄烏戰爭於2022年2月24日爆發，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HCHR) 於6月2日更新的平民傷亡估計數字顯示，此場戰爭已經有合共逾9,000名平民傷亡。3月中一名烏克蘭孕婦連同其剖腹生的嬰孩不幸於俄羅斯空襲位於Mariupol的婦科醫院中喪生，有關事件遭BBC、Sky News及ABC News 大肆報道，並引起公眾關注。聯合國亦發表分析報告，密切關注此場戰爭事態發展對烏克蘭婦女的影響。大部分的國際媒體、組織及各國領袖將此事的討論重點集中「戰爭為婦女帶來恐懼及威脅」的論述。部分烏克蘭婦女樂意接受外界把她們塑造為戰爭及政治糾紛的受害者角色，並視呈現戰爭傷害女性、一眾老弱婦孺跨越國境，逃離戰火的畫面有助提升公眾關注俄烏戰爭的發展及增加國際組織對烏克蘭難民援助的策略。筆者並非意指有關做法及分析錯誤，反想提出當中單一呈現婦女於戰爭及政治鬥爭變得無力的內容並未全面揭示婦女參與戰爭的情況。當中只會加深大眾認為女性柔弱、應負責照顧家庭及易成為戰爭受害者等刻板印象，並且忽略男性在戰爭遭受同樣傷害的情況。同時，以男性為主要領導者的國際政治組織及政府機構所制定的政策方向均會受該政治領袖自身對性別角色及性別定型的理解有所影響。本文將會借俄烏戰爭探討女性參與抗爭的情況帶出性別角色流動對看似由男性主導的戰爭、政治等領域的啟示。

「性別」一詞經常出現於日常生活中，一般大眾的認知把性別分成男和女。人們從出生起，便基於身體結構的異同被賦予一個性別（sex），透過教養建構他們的社會性別（gender）。此二元性別框架容讓男女性呈現各自的性別角色。所謂性別角色指社會定義男女性的行為模式標準，規範他們的言行舉止：打扮、對待事情的態度及性格表現等。當中涉及大眾較為經常聽到的「性別定型」，將男女的性格、行為及功能角色分類，簡化成剛陽陰柔，男強女弱，並以刻板印象帶到社會各個領域及視之為理解事情的根據。

早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聲明，下令禁止全國年滿18－60歲合乎服役條件的男性出境，以便隨時入伍，協助軍隊作戰，保衛國家。烏克蘭婦女出境則未受限制。有關安排的分別背後隱含澤連斯基對男／女國民同遭戰火摧殘下的性別角色的理解：男性的作戰能力較女性高、前者受到傷害的機會較後者少等等，故對兩性國民採取不同政策的態度。大量烏克蘭婦女自戰爭爆發起，扶老攜幼逃往鄰近國家避開戰火，照顧幼童、年長及殘障家庭成員的畫面遭到傳媒廣泛報道。決定留守家園或未能成功逃離戰火的婦女則成為俄軍性侵及攻擊的目標。曾任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官方攝影師的Mikhail Palinchak在其社交媒體上載了一幅一男三女陳屍於首都基輔外 20 公里高速公路旁的照片，雖有毛毯遮蓋屍體，但當中的婦女身體赤裸。網民紛紛於

有關帖子留言表達對受害者慘痛經歷感到心痛及傷心。另有婦女向人權組織親證遭俄軍輪姦、在兒童面前性侵、持槍襲擊等情況。烏克蘭婦運人士 Maria Dmytrieva 指出有 11 名婦女曾表示她們在 Kherson 被俄軍強姦。據聯合國三月底的報道，逾 230 萬烏克蘭難民有 54% 係婦女，並預計有關數字將持續上升。相對烏克蘭婦女遭性侵及襲擊的報道，媒體對於聯合國早前接獲數十宗烏克蘭男性及男童同樣遭到俄軍性侵的報道篇幅較少，英文媒體中暫時只見聯合國網頁及英國 *The Guardian* 刊登。

大眾不論性別均有機會成為戰爭及政治衝突中的受害者，婦女於戰爭中亦不只得一種角色及參與模式，性別角色係可基於社會需求而流動多變。在俄烏戰爭、以及大大小小不同的社會運動及革命中均可以見到女性於前線抗爭及保衛家園的身影，而且情況越見普遍。事實上，有部分婦女主動決定留守家園參與前線抗爭，試圖向世人宣告：於戰場上奮勇殺敵，保護烏克蘭國土並非男性的專利。烏克蘭政府亦早於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起大規模招募女性加入軍隊，並從 2017 年開始容讓女性參與各種戰鬥任務，不再局限於後勤支援角色。儘管當時有著各種限制，女兵仍主動擔任突擊部隊、狙擊手及軍醫等工作，甚至以平民志願者身份冒險將補給物資送往前線。隨局勢緊張升級，當地政府要求全國 18－60 歲身體健全的婦女登記參與徵兵，準備全民動員作戰。現時女兵的比例約佔烏克蘭軍隊 15%，即約三萬人參與俄烏戰爭。除正式軍隊外，烏克蘭婦女亦分別組織及加入自衛軍隊，有經驗者則負責訓練初加入的志願軍，教導她們製作汽油彈、使用步槍及其他武器，荷槍實彈於不同城市的街頭裡負責防巡邏的工作和清除市面上一些懷疑係俄軍用作辨識導彈攻擊目標的標誌。部分則選擇接受急救訓練，於隊中擔任救護員，照顧受傷的士兵。另有些因缺乏足夠經驗而安排在安全區域協助自衛軍隊準備各樣作戰及救援物資。由此可見，女性對於保衛國土的決心絕不遜於男性，實體戰場不乏女性的參與。

資訊科技的發展亦令戰爭不再單單局限於地面、空中及海上等實體戰爭，網戰亦成為一個重要的戰場。此等戰場的身體條件對女性限制較少，她們除協助於網上發表逾 30 種語言的作戰消息外，更有婦女利用自己對資訊科技及網絡的知識技術封鎖及干擾俄羅斯的傳播系統，播放親烏克蘭及烏軍佔上風的片段。她們更在社交媒體上利用 hashtag，例如 #standwithukraine、#prayforukraine、#stoprussia 等呼籲公眾捐獻予烏克蘭軍隊及相關志願組織，籌集更多的資金動員及支持戰爭。她們的參與正好反映女性在戰爭不一定只有受害者、照顧者及逃難者的角色。相反，她們願意並勝任各個戰場上的角色，而婦女不一定只會展現特定的氣質。有關的性別角色及氣質可以隨時間及空間的不同而流動轉變，以符合社會需求。

香港過去的社會運動雖同樣不乏婦女的參與，但大部分有關性別及婦女參與的討論甚少引起主流的關注。香港婦女於社會運動呈現不同的性別角色與氣質，例如於示威者與警方對峙期間，衝上前試圖勸籲警方不要以武力傷害示

威者；於衝突現場出現，並直接參與；又或係於後勤擔任各種支援及資源調配等工作。在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的 #ProtestToo 集會中亦有男性示威者表示曾遭警方性暴力，反映不論示威者及士兵的性別，同樣有機會成為政治衝突中的受害者。傳媒及各國政治領袖討論的焦點不應只集中婦女於戰火中的受害者形象，強調女性代表陰柔的氣質，並把陰柔氣質與軟弱及無力反抗扯上關係。它們兩者並不互相等屬，陰柔氣質的呈現可以理解為個人擔任軍隊中的照顧及支援角色。烏克蘭婦女加入軍隊或組成自衛軍，主動參與前線戰事及社區巡邏等工作，她們亦早已了解並有心理準備承受其中的風險。其實婦女並非大眾想像般的柔弱，她們與男性一樣，可於戰爭及政治領域中表現自己，只係缺乏政治機會。至於機會何時出現，也許只可以靜候，又或係主動製造。當然機會到來前，只好裝備自己，正如烏克蘭從事資訊科技行業的婦女於是次戰爭中發現原來自己的技能也有用武之地。



Source : Polina Rytova on Unsplash



從烏克蘭看世界

鬥雞與生存危機：2022俄烏戰爭的前世今生

作者｜Sisyphus



鬥雞與生存危機：2022 俄烏戰爭的前世今生
Games of Chicken and Existential Risks: A Hot War in Europe – The Former and the Next Lives of the On-Going Russo-Ukrainian War 2022

By Sisyphus (Nom de Plume)

The red flags had been right in front of our noses – history and the recent records of Russi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portended the looming risks of war and another nuclear crisis. This game of chicken may be more dangerous than before, happening in an era with mature nuclear missile technologies right under the wrong hands.[1]

The 2022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is one of the largest conventional wars in Europe after WWII.[2] The Cold Peace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1991-2022), as identified by some scholars, is by now broken.[3] By definition, a Cold Peace is in contrast to the Cold War, when there are "constant covert conflicts" that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erupt into overt (nuclear) warfare."[4] A well-known Cold War example would be the 1962 Cuban Missile Crisis. Yet the world is facing a problem arguably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hen Cuba played a bigger role than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proactively negotiating a deal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transport missiles covertly to the tiny island next to the United States.[5] In contrast, we now have Putin holding the

1.The writing of this article commenced in mid-April. Amid the writing process, Putin warned the world of his latest missile "Satan II" on 21 Apr 2022. See, Nick Allen, Jamie Johnson, and James Kilner, "Vladimir Putin Tests 'Satan II' – a Nuclear Missile with a Dozen Warheads That Can Hit 'Anywhere in World,'" *The Telegraph*, April 20, 2022, https://www.telegraph.co.uk/world-news/2022/04/20/vladimir-putin-tests-satan-ii-nuclear-missile-dozen-warheads/.

2.Detsch, Jack. "Pentagon Rolls Out Defense Strategy Amid War in Europe," *Foreign Policy*, March 2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8/pentagon-defense-strategy-russia-ukraine-war/.

3. Engle, Eric. "A New Cold War? Cold Peace, Russia, Ukraine, and NATO."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59, no. 1 (2014): 97-174.

4.Ibid, 99.

5.As a remark, bo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full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in Cuba during 1962, whereas Castro and his inner circle were those who had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Ye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d struck a deal regarding the withdrawal of nuclear weapons in Turkey, for the Soviet Union to withdraw nuclear weapons from Cuba. As a note, the two superpowers did not involve Cuba in the negotiation, which was arguably the major benefitting party in playing up this conflict as I perceive, in comparison to the two superpowers. See, Fursenko, A. A., and Naftali, Timothy J. *One Hell of a Gamble :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1st Norton Pbk ed. New York: Norton, 1998, Chapter 1.

world hostage with his "special [nuclear] alert," while Russia stages a full-scale direct invasion of Ukraine, which has been se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ghtful territory of the Russian Empire.[6] If we are to frame and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through the lens and vocabularies of the World System Theory of the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krainian territories are not at the periphery but a lot more proximate to Russia.[7] Is this new? Ironically, there has been an abundance of post-WWII regional wars that pitted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Korean War (1950-53), the Vietnam War (1955-75), and the Soviet-Afghan War (1979-89), and such a risk has always existed. So in a nutshell, were these regional and proxy wars also potential nuclear threats? Yes, and humanity has been walking on the edges of the existential risk of survival. Yet even in this period of the so-called Cold Peace (1991-2022),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s a USSR succession state, with the freshly independent post-Soviet states, were unstabl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how the risk of a full-scale war has been repeatedly foreshadowed by recurring conflicts and small-scale wars in the region around and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cluding the Transnistria War (1990-2),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2008),[8] Crimean Crisis in Ukraine (2014). The risk of war had always existed. When we look at the war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Putin staged after his ascension to power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red flags. As the lyrics of the Billy Joel famous song goes – "We Didn' t Start the Fire," the world "was always burning, since [it has] been turning."[9]

6. "Ukraine invasion: Putin puts Russia's nuclear forces on 'special alert'," *BBC News*,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60547473.

7.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1st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8.This war only lasted for 5 days in comparison to the on-going Russo-Ukrainian War that had lasted longer than 2 months as of 19 April 2022 which this article was first drafted. See, Donovan Jr, George T. *Russian Operational Art in the Russo-Georgian War of 2008*. Army War Coll Carlisle Barracks Pa, 2009.

9."We Didn' t Start the Fire," Genius, October 17, 1989, https://genius.com/Billy-joel-we-didnt-start-the-fire-lyrics.

I . The World Was Always Burning : Former Lives of the On-going Russo-Ukrainian War

Russia has record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regarding neighbouring former Soviet Union states and this military trend has intensified around the 2010s under Putin. Yet, the Transnistria War that happened before Putin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seemed to have foreshadowed rising military tensions in the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21st century.

1.Before Putin : Russian' s Political Tradition of Honour, Assertiveness, and Expansion

Russia has a political tradition that perceives the conquering of land to be an honour of rulers, which can be traced to Ivan III, who named himself as the " Grand Duke of Russia," formulated the " gathering of Russian lands " policy, and warred against the Novgorod Republic in Russia, the Poles, and the Mongols for control over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subjects at his time.[10] Asserting the great power status of Russia has been an important agenda and conven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country.[11] Although Gorbachev' s policy of glasnost (Transparency) and perestroika (Reform) brought liberal changes to the Russian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nd formation of so-called informal associations also played a role in increasing ethnic tensions" in various former Soviet states today.[12] This included former Soviet states from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to Ukraine.[13] The weakened position of Gorbachev' s regime to assert the notion of unity for the Soviet Union ultimately "led to th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14] He was "ultimately forced to resign in 1991." [15]

10.Tsygankov, Andrei P.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6-7.

11.Ibid, 5.

12.David R. Marples, "Review Article : Revisiting the Collaspe of the USSR,"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53, no. 2-4 (June 2011): 461–73, https://doi.org/10.1080/00085006.2011.11092684, 464.

13.The Soviets annexed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in 1940, whilst these countries used to have better living standards than the rest of the USSR. This had become a point of discontent in these regions since then. As for Ukraine, there was a nationalistic revolution against being a part of Russia in 1917, and there was a "flowering of national cultures" during the 1920s. See, Ibid, 465.

Side Notes - Territories of the Imagined Russian Empire

For the purpose of contextualisation, this essay would like to note that the imagined territory of Russia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former territories of the Soviet Union (Fig. 1). [16] Yet the Soviet Union’s expansionism was also influenced by Russian tsars prior to the 20th century, as shown in the map of Russian Expansion in Asia (Fig. 2), which had significant overlaps and similar shape of borders with the map of the Soviet Union.



Fig. 1.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Soviet Union, 1917/22–1991. [17]

14.Ibid.

15.Ibid.

16.*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Soviet Union (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ccessed June 13, 2022,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oviet-Union#/media/1/614785/3893.

17.John C Dewdney and Martin McCauley, “Soviet Union | History, Leaders, Map, & Facts,” i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December 20, 2018,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Soviet-Union.



Fig. 2.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Russia Empire, 1533-1894. [18]

2.Also Before Putin : The Transnistria War (1992)

After Moldova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1990 and declared Moldovan to be their official language instead of Russian, Transnistria broke away from Moldova in 1992, and has become a de facto state with an absence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19]

In 1992, a war broke out between the Moldovan and Transnistrian separatist forces.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ransnistria was the militant support they received from Russia, including deploying the Russian Fourteenth Army which helped " secured the victory in [this war,] " as well as equipping and training Transnistria' s military forces[20] To this day, there are Russian troops stationed in the region, which is sandwiched by Moldova and South-west Ukraine that is currently not at the battle frontier of the Russo-Ukrainian War. [21]

18.*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Russian Empire (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accessed June 13, 2022,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Russian-Empire#/media/1/753050/3392.

19.As a note, the main language of Moldova has been Russian, and people watch Russian channels such as Russia 24. See, *The New York Times*, " How Russia' s Disinformation Spreads beyond Its Borders | Russia-Ukraine War, " www.youtube.com, April 12,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04aLpZ0SJ8.

3.The Russian-Georgian War (2008)

After his inauguration, as a former intelligence agent of the Soviet Union, Putin has not hesitated to adopt military mean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o achieve his agendas.

In 2008, NATO declared that Georgia and Ukraine would join them one day and a few months later, we witnessed the invasion of Georgia by an infuriated Putin.[22] This time, two Georgian states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both located between the borderlands of Russia and Georgia, declared independence with Russian support. Yet without the security guarantee of NATO, Georgia lost to Russia in merely 5 days.[23] Following the victories, Russia has maintained a military presence in both regions, and this was how Putin first tasted the fruits of victory, gaining back former Soviet Union territory.

In the same year, Ukraine and Georgia were both declar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NATO Membership Action Plan.[24]

4.2014 Crimean Crisis : Revolution of Dignity,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the War of Donbas that Followed

In the Russian expansionist perspective, Ukraine has been the rightful territory of Russia, and is a region that is “Russian.” It had become clear that following Georgia, Ukraine would be the obvious next target of Russian expansionism.

20.The Russian Fourteenth Army “secured Transnistria’s victory in the 1992 war with Moldova as well as helped to create, equip and train Transnistrian armed forces.” See, Marcin Kosienkowski,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ransnistria,” in *De Facto States in Eurasia* (Oxfordshire: Routledge, 2021), https://wwww.repozytorium.kul.pl/handle/20.500.12153/1465, 12 ; Russia also sent special agents to aid Transnistria’s war with Moldova. See, Cloé Drieu and Elisabeth Sieca-Kozlowski, “Interview with Olga Capatina, - Physiotherapist and GRU Operative (Soviet-Afghan War) & Double Agent (Transnistrian War) -, Conducted in Paris, France, 25 September 2015 (EN),” *The Journal of Power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Societies 20/21*, no. Issue 20/21 (January 24, 2019), https://doi.org/10.4000/pipss.4564.

21.W. Alejandro Sanchez, “The ‘Frozen’ Southeast: How the Moldova-Transnistria Question Has Become a European Geo-Security Issue,”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2, no. 2 (May 29, 2009): 153–76, https://doi.org/10.1080/13518040902917917.

22.Romanova, Tatiana, and Maxine Davi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U-Russia Relations*. Milt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2, 10.

23.Was It Inevitable?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s War On Ukraine | Keith Gessen", *The Guardian*,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11/was-it-inevitable-a-short-history-of-russias-war-on-ukraine.

24.Gallis, Paul. “The NATO summit at Bucharest, 2008.”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8 ; *Vox*, “Putin’s War on Ukraine, Explained,” www.youtube.com, March 3,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u8QbxafJE, 3:53.

Side Note – the Ukrainian Identity

To counter the Russian narrative and justify their legitimacy of independence, Ukrainians need to assert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Instead of having a political culture that is centred around the idea of statehood, Ukraine was ruled by many external powers including the Poles, Austrians, the Ottomans, prior to being ruled by the Russian Tsar and Communists.[25] In shor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nd the 1917-21 War for Independence that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krainian re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whilst Ukrainians defended their territorial independenc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until the 1950s.[26] In 1991, Ukraine became independen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some regions, such as Transnistria, with a heavy concentration of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tend to consume Russian media and identify with Russia more.[27]

Pretext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2014 Crimean Crisis

The 2014 Crimean Crisis followed the footsteps of Georgia,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lthough this process involved a mixture of military and referendum means.

The former pro-Russia president Yanukovych did not sign the 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 and was ousted from Ukraine as a result. Protesting against his action, the 2013 Euromaidan Movement in Ukraine, which emphasised Ukraine' s identity as a European rather than Russian nation, escalated to the Maidan Revolution (also known as the Revolution of Dignity) in 2014.

In reaction to the revolution, on 27 February 2014, pro-Russian activists with face coverings occupied the Crimean Supreme Council, and a referendum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Crimea was held in mid-March in the same year.[28] Crimea declared a result of favouring

25.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New Haven (Con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p, 2014), 40.

26.Ibid.

27.Sebastian Muth, "Linguistic Landscap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Signs,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ransnist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4, no. 227 (January 1, 2014), https://doi.org/10.1515/ijsl-2013-0086.

28.Some stated that the so-called Russian activists were Russian soldiers.

being returned to Russia.[29] However, later leakage of document showed that the actual turnout was 30 percent instead of 83 percent, while only half voted for uniting with Russia. Just a year later, Putin showed his true colours and admitted having orchestrated "the work to bring Crimea back into Russia," despite his original denial.[30]

Yet, the Crimean Crisis was just a start. After Crimea was absorbed into Russia, pro-Russian separatists in Donbas seized and declared Luhansk and Donetsk to be independent, leading to a series of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despite peace-keeping efforts in recent years.

5.War of Donbas (2014-21) and Repeated Violations of Peace Agreements, and the Escalation to a Full-Scale War (2022)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War of Donbas has been on-going since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in 2014 despite ceasefire agreements.

The Minsk Agreement was sig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4.[31] Yet this peace was temporary, and was broken in January 2015, when the separatists (backed by Russia) in both Luhansk and Donetsk embarked on military attempts to seize territories lost to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n 2014.[32] This time, efforts were exerted to bring back peace again by the signing of the Minsk II Agreement, with the French president and German Chancellor liaising with both Ukraine and Russian presidents. Again, this second peace agreement was broken, with the number of violations up to "one million" during 2015-18; While Russia has simplified the procedures of granting citizenship to residents of both self-declared independent regions.[33]

29.Kuzio, Taras and Paul D' Anieri,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ussia' s Actions towards Ukraine,"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8, https://www.e-ir.info/2018/06/16/the-causes-and-consequences-of-russias-actions-towards-ukraine/.

30.BBC, "Putin Reveals Secrets of Russia' s Crimea Takeover Plot," *BBC News*, March 9, 2015, sec. Europe,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31796226 ; NowThis World, "How Putin Annexed Crimea from Ukraine," www.youtube.com, March 27,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DxOnDGpHc.

31.Kristian Åtland, "Destined for Deadlock? Russia, Ukraine, and the Unfulfilled Minsk Agreements," *Post-Soviet Affairs* 36, no. 2 (January 27, 2020): 122–39, https://doi.org/10.1080/1060586x.2020.1720443.

32. Kristian Åtland, "Destined for Deadlock?" 122.

33.Ibid, 123.

In November 2021, satellite images showed Russian military forces increasing presence at Ukrainian borders, and yet again Putin denied any military plans.[34] However, within five months, he has declared a full-scale war to Ukraine on February 24 this year, bombing civilians and displacing more than 11 million Ukrainian refugees.[35] Since April 17,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begun with another escalation of war in Donbas, after the siege of Mariupol.

Side Notes – Donbas as a Region

Donbas is a distinct region from the Crimea Peninsula. Situated inland, Donbas has been the centre of coal-mining industry, steel production, with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left by the mafia families there, and hence some argued that Ukraine might be better off without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Donbas.[36] In terms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re was little "overseeing state authority [in Donbas] until the very late tsarist era," with a tendency to "acquiesce to power exercised from outside if sufficiently strong" forged by a "winner takes all" mentality.[37]

Yet militarily, given the relatively small scale of the Ukrainian navy which was mainly located in Sevastopol in the Crimea Peninsula, Ukraine did not have an effective navy after the year of 2014 when Crimea was annexed.[38] Hence in 2022, it is not realistic to try to take back Crimea after the 2014 Annexation, in comparison to defending Ukraine in the region of Donbas against the puppet republics installed by Russia. [39]

34.*Vox*, "Putin's War on Ukraine, Explained."

35.*The Spectator*, "Full Text: Putin's Declaration of War on Ukraine | the Spectator," www.spectator.co.uk, April 23, 2022, https://www.spectator.co.uk/article/full-text-putin-s-declaration-of-war-on-ukraine ; *BBC News*, "Ukraine's Refugees: How Many Are There and Where Might They Go?," *BBC News*, February 28, 2022, sec. World,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60555472.

36.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 What It Means for the West*, 123.

37.Silviya Nitsova, "Why the Difference? Donbas, Kharkiv and Dnipropetrovsk after Ukraine's Euromaidan Revolution," *Europe-Asia Studies* 73, no. 10 (April 23, 2021): 1–25, https://doi.org/10.1080/09668136.2021.1912297.

38.Regarding the fact that Ukraine did not have its own navy as of mid-March 2022. See, "Structure of Ukrainian Armed Forces," www.mil.gov.ua (Ministry of Defence of Ukraine, August 5, 2012), https://archive.ph/20120805142907/http://www.mil.gov.ua/index.php?lang=en&part=structure&sub=navy ; J. Overton, "FOR UKRAINE, the 1,000-SHIP NAVY FINALLY SETS SAIL," CIMSEC (Center for Marine Security, April 13, 2022), https://cimsec.org/for-ukraine-the-1000-ship-navy-finally-sets-sail/.

39.Tymur Korotkyi and Nataliia Hendel,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Donetsk and Luhansk 'Peoples' Republics,' " *in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Ukraine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18), 145–70, https://doi.org/10.1007/978-94-6265-222-4_7.

II. Next Lives and Rippling Effects of the On-going Russo-Ukrainian War : Where is this Chicken Game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going ?

1.Concept of the Game of Chicken

As described by Bertrand Russell in his classic work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First Published in 1959), the Game of Chicken is:

“This sport is called ‘Chicken!’ It is played by choosing a long straight road with a white line down the middle and starting two very fast cars towards each other from opposite ends. Each car is expected to keep the wheels of one side on the white line. As they approach each other, mutual destruc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minent. If one of them swerves from the white line before the other, the other, as he passes, shouts ‘Chicken!’, and the one who has swerved becomes an object of contempt.” [40]

This game, as described by Russell, was played by irresponsible boys but when statesmen do so, they are considered to be performing strategic acts of courage, which is “absurd.” [41] His prediction was the following:

“The game may be played without misfortune a few times, but sooner or later it will come to be felt that loss of face is more dreadful than nuclear annihilation. The moment will come when neither side can face the derisive cry of ‘Chicken!’ from the other side. When that moment is come, the statesmen of both sides will plunge the world into destruction.”

If Russell still lives in our era, he may warn us that we are in an increasingly dangerous game of chicken, which could be triggered by strategic advances essential to both NATO and Russia, since we

40.Bertrand Russell.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Routledge Classics. Taylor and Francis, 2009. Foreword.

41.Bertrand Russell.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15.

are back to a game between two major nuclear powers – the US and Russia.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other countries are not capable of starting a nuclear war : Every nuclear country that has an inclination or pattern of aggressive behaviour should be closely monitored because they are capable of posing existential threats to the entire humanity. However, we have a lot more existing nuclear weapons today as compared to 60 years ago whe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happened in 1962.[42]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and predictions of what Russell had put forward at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nuclear technology, as long as both sides have rationales that compelled them not to back down, the end game will be mutual destruction.

2.Through the lens of the Game of Chicken: Between Brinkmanship and Surrender [43]

Rationally speaking, there should be no country that desires the worst outcome of the chicken game – mutual destruction. However, for both countries to swerve in the chicken game is also not an option given that both can improve their outcome obtained from the chicken game. In other words, for the two players in the game to obtain a balance, one side must swerve. This is because for the party who swerved, there is no better outcome as well because if they do not – the outcome is destruction. And for the party that did not swerve, of course they have achieved their agenda.[44] The winning strategy would be to convince the other party that one is irrational – one won' t swerve.[45]

3.Russia' s Response to NATO' s Expansion (1999-Pres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of Realism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garding Russia' s invasion of Ukraine confirms the realist claim that a country perceives the move of neigh-

42.Rob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 "Global Nuclear Weapons Inventories, 1945–2010,"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6, no. 4 (July 2010): 77–83, https://doi.org/10.2968/066004008.

43.Bertrand Russell.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16.

44.The York Management School, "Game Theory the Chicken Game," www.youtube.com, accessed April 23,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ciSdRW-V0c.

45.Ibid.

bouring nations,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military alliances, as threat.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strongest, the country perceiving threat may react with enhancement of its own power and military capacity.

The latter is Russia, as presented in the speech of Putin in his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Ukraine arguing that NATO has taken too many steps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region that now it is time to retaliate, if we tak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his speech.[46] Of course there are reasons for Putin or any Russian leadership to react, after the inclusion of more post-Soviet states into NATO since 1999, partly due to a lack of Russian alliance countries in Europe that will balance American influence. Until now, the remaining post-Soviet countries in Europe sandwiched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includes Ukraine, Georgia, Belarus, and Moldova, which are in or close to the conflict zone that critics fear the war will extend there. After all, the old Soviet Union or Russian Empire wasn't confined to Ukraine and Georgia beyond the current Russian borders. Whether Russian military moves in the recent year is solely propelled by NATO's expansion is questionable, and the imperialist motives behind also must be examined.

Hence, under realist influence and mode of thought that Russia should become great again, another game of chicken has been initiated proactively by Putin with his repeated warnings of hi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spring of 2022, starting another war that has resulted in the largest scale of displacement and casualties in Europe after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Labelled a war criminal and having his sanity questioned, Putin adheres to the nuclear game of chicken's strategy that one should be able to convince others that they would not swerve.

In an ideal world depicted by Russell, if leaders are rational and they recognise a common interest in survival of the human race, they should escape from the arm race.[47] However, the world is absurd. After Putin proudly announced that the Russian Satan II nuclear missile could strike the US, Washington is now in a heated debate and some are eager to raise military budget to advance nu-

46.The Spectator, "Full Text: Putin's Declaration of War."

47.Bertrand Russell.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17.

clear technology such as the nuclear sea-launched cruise missile (SLCM-N).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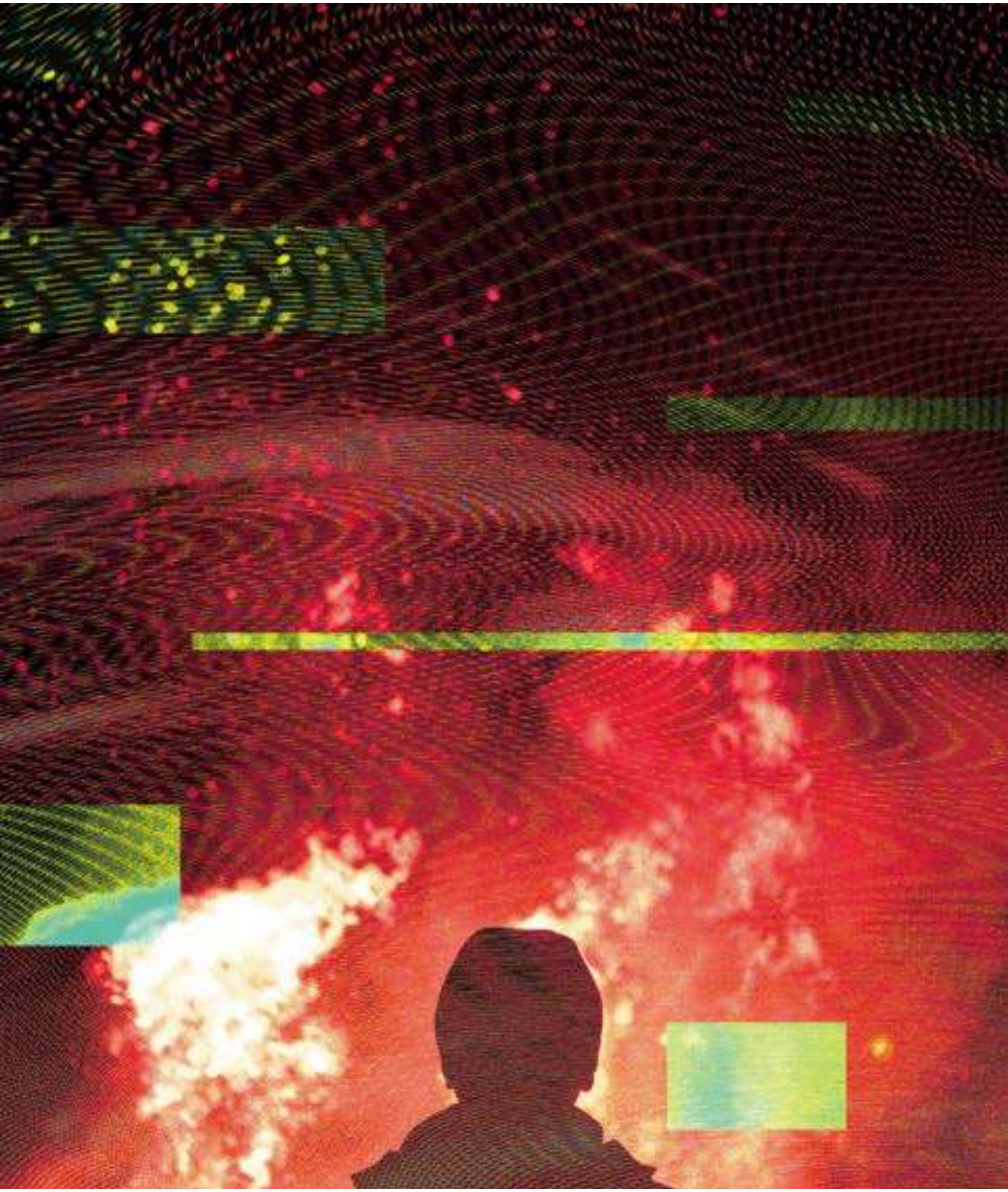
The world may have come a full circle to an arm race again if this continues, however, it is also not a viable option to be terrorised by nuclear bombs under dictatorship. With this, we will witness another full regression of humankind from democracy to the rule by the strongest. Yet, power' s nature is coercion and violence, and some episodes of history, unfortunately, cannot escape that.

4.What the Future May Hold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ritics have put forward several possibilities how this war may end: Short War, Long War, European War,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the Ousting of Putin.[49] However, though grim and pessimistic,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for nuclear disaster when a dictator with the nuclear button was to be cornered. In contrast to 1962, this game was not initiated by a third country but Russia itself, and is more dangerous than half a decade ago.

48.Vic Mercado, " A Nuclear Sea-Launched Cruise Missile Will Help Deter Nuclear Aggression," *Defense News*, August 5, 2020,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20/08/05/a-nuclear-sea-launched-cruise-missile-will-help-deter-nuclear-aggression/.

49.James Landale, "Ukraine: How Might the War End? Five Scenarios," *BBC News*, March 3, 2022, sec. Europe,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60602936.



Source : Adam Wilson on Unsplash



從烏克蘭看世界

俄烏戰爭的離散與分裂

作者｜六月



俄烏戰爭的離散與分裂

作者 / 六月

在春暖花開的星期天，那本應是許多家庭休假聚會的好日子，網絡和媒體卻不間斷地傳來一節又一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消息。「不少烏克蘭的家庭因為戰亂而被拆散。我有不少親戚和朋友，都是父親帶著妻子和兒女，走到波蘭邊境。妻子和兒女就在那裡告別，他們的父親卻要轉身返回自己的家參軍作戰。」一名居住在美國洛杉磯的烏克蘭人 Misha 向我提到。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中也可以看見，這場戰爭令不少家庭被拆散，從邊境傳來的哭泣聲，令不少流散在外的烏克蘭人紛紛感到痛心和無助。「這是納粹普京的錯，我們今天看見的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就是普京是新的納粹、是希特拉、是最邪惡的魔鬼。我們烏克蘭人會用太陽花籽來回應普京的邪惡，就像那位在烏克蘭的老婆婆對俄羅斯軍人說的那句話“Take these seeds and put them in your pockets, so at least sunflowers will grow when you all lie down here”。這段激昂的演講是來自一名烏克蘭人在加州旅遊勝地聖莫尼加（Santa Monica）拿著麥克風高喊。現場聚集了數千名聲援的人士，也包括了不少來自波羅的海、東南亞和香港的移民。這段演說引起了現場不少群眾的共鳴，不少人臉上都帶著悲傷的神情。

這是 2022 年 2 月 26 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三天。那時候，俄羅斯軍隊已經越過了切爾諾貝爾並進入基輔以北地區。另一支俄羅斯軍隊也正在攻入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Kharkiv）。烏克蘭軍隊以寡敵眾，不少分析和評論都認為烏克蘭很快會被攻陷。同一時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當天才宣布撥出 3.5 億美元支援烏克蘭。可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當時的歐盟還沒有作出明確的反應。烏克蘭能撐下去嗎？會滅亡嗎？國際社會會真的幫助他們嗎？這些問題都沒有解答。當日的烏克蘭流散者群體，便充滿著這一種對「失去未來（Futurelessness）」的情緒中。在俄烏戰爭發生短短的三個月期間，至少有約 1,400 萬人離開烏克蘭，大部分人都是老弱婦孺。當中有 341 萬人逃到鄰近國家波蘭、300 萬人分散到附近的羅馬尼亞、俄羅斯、摩爾多瓦、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白羅斯。另外有 380 萬人輾轉走到歐洲、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戰火拆散了不少家庭，也令不少人在一夜之間變成了難民。

Mandy 是一名香港移民，他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一家銀行工作。在五月的一個早上，他招待了兩位白人女子在分行開戶口。一如既往，Mandy 都會拿取客戶的一些個人資料，並順道詢問一下他們的近況。那兩位女士帶點咽哽地說，他們是烏克蘭難民，剛剛才來到加拿大。而其中一位女士的丈夫沒有跟隨他們離開家鄉，獨自留在烏克蘭參戰。然而，在不久之後，這位丈夫便在一次砲擊中喪生。而那妻子的 5 歲兒子則在逃難到波蘭的時候，寄居在一位朋友的家中代為照顧。這兩位女子便一同上路，尋找一個歐美國家安頓。而

因為當時她們都不知道最終會到哪裡落腳，所以先把兒子留在波蘭，等待她們安頓好再安排兒子過來。這些故事其實自俄烏戰爭發生後，經常在新聞中提到。然而，Mandy 從來沒有想到她會在工作中遇到烏克蘭的難民，並很接近地聽到這些讓人痛心的經歷。而 Mandy 作為一個香港人，在當刻除了忍住眼淚安慰這兩名客戶，並繼續為她們開設戶口以外，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幫助這兩名女子。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經歷，筆者在一些烏克蘭人舉辦的聲援活動中亦有所聽聞。例如前文提到那位身處洛杉磯的烏克蘭流散者 Misha。他的姊姊便在戰爭的時候和子女一同逃離烏克蘭東部地區盧甘斯克（Luhansk）。如同許多家庭一樣，他的姊姊和兒子逃到波蘭尋求庇護，而他的姐夫則在留在家園。Misha 形容，戰爭發生以來的這幾個月，對他來說真的很難捱。尤其自己流散在外，當俄羅斯舉軍從多方入侵烏克蘭的時候，他感到難以置信，也感到非常無力。感覺上，自己的家園正在逐漸消亡，而自己身在美國則只能不斷透過電話和網絡來尋找方法，幫助仍然身處烏克蘭的親友逃離戰火。

對 Misha 來說，除了那些親友在戰亂中的經歷讓他非常煎熬以外，父母親的政見也讓他感到非常苦惱。Misha 自少出生在烏克蘭東部的盧甘斯克，當地是俄語與烏克蘭語雙語通行的城市。Misha 的父母來自莫斯科，在烏克蘭定居後生下了孩子。雖然 Misha 的母語是俄羅斯語，但他自小便認為烏克蘭是獨立國家，並非俄羅斯的一部份。相較之下，他的父母卻經常希望蘇聯時代回歸，仍認為烏克蘭應該是俄羅斯的一部分。而生長在烏克蘭東部地區，當地的俄語媒體經常會為普京政府保駕護航，也會灌輸許多經過修編的蘇聯歷史。這些理解都和 Misha 在烏克蘭的學校學到的歷史和烏克蘭語的媒體所提及的歷史事件截然不同。世代分裂，在他年少的時候便已經是每一個家庭經常出現的問題。「在烏克蘭，上一代在蘇聯時期來到的俄羅斯移民經常會認為烏克蘭並非一個獨立國家。他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觀和時空裡面。就像我的父母，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就認為俄羅斯的做法是正義和正確的。他們所相信的事實已盡被俄國的大外宣洗腦。而一些俄羅斯愛國份子，真的認為許多烏克蘭人會張開雙手迎接俄軍接管烏克蘭。但我們這一代人許多都是非常堅強。我有一些朋友在戰爭發生以後選擇留守家園作戰。而戰事來到今天，烏克蘭國內外上下都很團結地抵抗俄軍的入侵。我就在這個問題上與父母發生爭吵。」Misha 的父母在好些年前便已經回到莫斯科居住，並一直在當地生活。在不久之前，Misha 才在莫斯科待過一年的時間，當時許多的新聞封鎖和國家對資訊的監控都讓他感到很不習慣。他形容，在俄羅斯生活的日子，根本上是沒有任何自由可言，這讓他感到難以接受。更可怕的是不少他認識的俄羅斯人，會認為國家提供的大內宣資訊是正確無誤。

雖然如此，戰爭發生以後，俄羅斯的經濟大幅下滑、盧布嚴重貶值，Misha 認為這些現象都有可能讓俄羅斯人再一次反思普京治下的政策和戰爭是否真的正確。「其實普京已經當了 22 年的總統，而普京在近幾年越來越變得自我中心。因為他是一名非常富有的人，他並不關心人民的生命，也不理會士兵的死活。在這場戰爭發生以後，其實俄羅斯國內的經濟真的面臨很大的危機。我的父母在銀行的積蓄可能會變得一文不值。我認為俄羅斯人會思考到底這場戰爭是否真的值得。當這麼多軍人死亡、這麼多的金錢使用在軍事上，換來的卻是一個殘破不堪的國內經濟。他們的生活也從此大受打擊。我的父母縱然是非常支持俄羅斯政府，他們如同一般的俄羅斯人一樣，必須面對這些生活上的困難。我認為這會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讓不少人再次反思普京政府的所作所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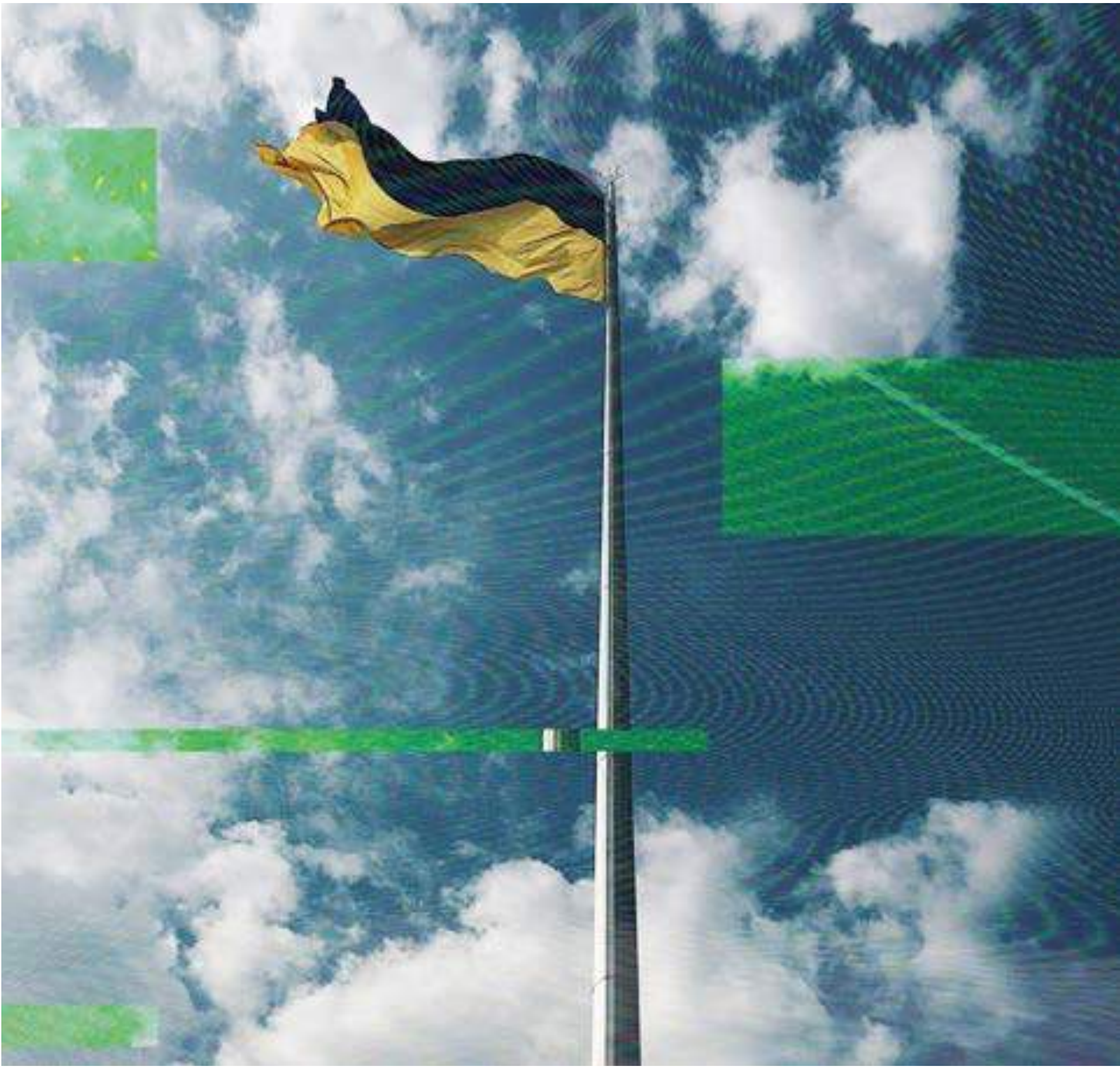
Misha 提到，在俄羅斯主要有兩種人。第一種是終日希望可以移民到美國拿到綠卡，並在那裡做生意發達的人。另一種是那些發現自己無法離開，然後日日夜夜也在咒罵美國的人。雖然冷戰時期已經結束，屬後者的俄羅斯人對美國的仇恨並沒有絲毫的減退。而這種政見的分裂，也成為了許多新一代烏克蘭人與老一代親俄的父母輩產生分裂的原因。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家庭是人自少學會權力的重要場所。而家庭本身的代際關係，尤其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本身就是一種權力關係。而在過往的香港社會運動中，筆者也訪問過不少年輕上街的朋友，發現黃藍的撕裂正正在他們與父母之間的關係中發生。當一些親政府的父母在家庭中嘗試控制子女參與政治，許多時候子女只能選擇服從或抵抗。一些抵抗父母試圖偷偷參與社運的年輕人便因此與父母關係決裂。這種決裂也正在這一代的烏克蘭的年輕人中發生。他們對於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的想像，與他們父母輩以蘇聯作為大一統的國家想像產生嚴重矛盾。而這種矛盾，在每日都有不少人被屠殺的戰爭期間，更容易產生家庭內紛爭和衝突。對於 Misha 而言，在家中要對政治避而不談是毫不容易的事。因此，他也必須思考如何維繫與父母的關係，在訪問的時候，這仍然是一個非常難解的結。

提到戰爭和極權下的壓迫，許多人會想到國家機器的操作。這種想法很容易讓我們對於這些政治產生的問題產生一種以政權為重心的思考方式（State-centric perspective）。然而，從 Misha 這一代的烏克蘭人可以看見，俄羅斯語媒體的大一統政治宣傳與烏克蘭語的獨立國家論述，不單單存在於政權與國土邊界的問題上，也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每一日的生活之中。其實，烏克蘭人每一天的生活，包括他們在家庭與上一輩父母親的互動，也很直接地產生親俄與親烏的撕裂。而 Misha 的經歷相信只是冰山一角，也是許多在這個年頭的烏克蘭人所面對的問題。另一方面，這次俄烏戰爭，造成了至少 5,000 名烏克蘭軍人和平民被殺。這些死亡人數不只是冰冷的數字，也是代表著數千個烏克蘭家庭在 2022 年失去了至親。這些創傷，如同

Mandy 在加拿大碰見的兩名烏克蘭難民那樣，隨著他們的記憶一直流散到各地，成為終身也不能忘掉的苦楚。

對於這一批烏克蘭人來說，離散本身就是一種很痛苦和充滿創傷的經歷。烏克蘭就算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因為歷史和地緣政治的關係，令他們的民族添上許多傷痕與亡魂。也讓許多家庭從此產生矛盾和撕裂。這一部分的生活，是戰爭過後仍然持續的傷痛和裂痕。



Source : Polina Rytova on Unsplash

從烏克蘭看世界

還記得那些支持香港的烏克蘭人嗎？

作者｜六月



還記得那些支持香港的烏克蘭人嗎？

作者 / 六月

在寒冷的街頭上，一名烏克蘭人以抖震的雙手，在一部電子琴上彈奏起《願榮光歸香港》的前奏。這是 2019 年 11 月 22 日，正是理大圍城後的幾天。烏克蘭基輔市內有一群當地居民聚集在中國領事館前面，要求 Free Hong Kong。群眾雖然不懂得唱《願榮光歸香港》，也不懂得說廣東話，但他們卻很支持香港人的抗爭。在帝國霸權的面前，他們把烏克蘭的廣場革命（*Winter On Fire* 電影所拍攝的社會運動）與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劃上平行線。因此，這些烏克蘭人選擇在他們廣場革命的紀念日，發起聲援香港行動。

而當時，烏克蘭年輕領袖哈里托諾夫（Arthur Kharytonov）便在集會中呼籲參與者一同聲援香港的社運。"It's our message to you, please, stop violence in Hong Kong. Stop abusing human rights, and start to listen to people. Free Hong Kong! Free Hong Kong!（這是我們給你的訊息，請你停止香港的暴力。停止侵犯人權，並開始傾聽人們的意見。解放香港！解放香港！）"。根據基輔郵報（*Kyiv Post*）在當日拍攝的現場片段顯示，參與者拿著中英雙語的標語，包括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字句聲援香港人。

在 2022 年的時候，回看烏克蘭人曾經對香港作出的聲援和支持，似乎已經是很遙遠、很難想像的事。今天的基輔街頭，堆滿了沙包和抵擋坦克的障礙物。這些曾經支持香港的烏克蘭人，也正在努力守衛他們的家園。在過去幾個月，不少香港人都紛紛關注烏克蘭的戰局。雖然吃花生的人很多，真的落力尋找方法支援烏克蘭的人很少。也許，香港人在這個時刻也應該反思，這些國際關係對香港人來說有甚麼意義？香港人又可以如何回報這些曾經支持香港的烏克蘭人？但在思考這個很複雜的問題前，筆者認為，我們應該先了解為什麼烏克蘭人會關注香港和支持反送中運動。

當然，烏克蘭與香港在政治上有不少共同點。正如不少人都看完電影 *Winter On Fire* 都會把烏克蘭與香港作直接比較。然而這種強行把兩個國家的政治運動作出比較，經常都會缺乏對處境的理解。例如在反送中初期，某些知名網台 KOLs 就把韓國的「光州運動」、新疆的「反恐模式」和台灣的戒嚴時代與香港的現實政治狀況作對比。這些對比說到底也只是一種為求解釋和預測香港的政治狀況而作出的投射，難免會選擇性解讀不同的歷史處境。

然而，香港與烏克蘭的狀況是否類同其實並不重要，為何人們會把烏克蘭和香港放在同一起作出對比才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觀看烏克蘭人在基輔當年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支持，我們可以思考，到底他們是如何看中國和香港。這個問題會讓我們更了解為何烏克蘭人可以是香港人在國際舞台的盟友，繼

而明白為何彼此都帶著相當類似的世界觀。

以下訪問是筆者在洛杉磯的聲援烏克蘭集會中認識的 Misha，也是上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及的烏克蘭流散者。Misha 曾經旅居中國大陸 9 年，擔任外籍老師。而在這 9 年期間，Misha 也曾經多次來訪香港，並且相當關注香港的政治狀況。

烏克蘭人眼中的中國與香港

「我認為香港更接近於民主。香港人有他們自己的貨幣。香港人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人們說廣東話。香港人使用繁體字，中國大陸使用簡體字。這看起來是不同的。香港人學習不同的歷史。就像我知道的那樣，香港人對過去的歷史事件有不同的理解。所以香港人可以理解甚麼是真的，甚麼是假的。但在中國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只是學習中國版本的歷史。這個我很理解。因為在烏克蘭，我們有一個類似的情況。

我們也會分開講俄語的人和講烏克蘭語的人。但也有像我那樣，我的母語是俄羅斯語，第二語言才是烏克蘭語。雖然我出生在俄語的家庭，但因為我也精通了烏克蘭語。在烏克蘭念大學的時候我更了解烏克蘭這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雖然我會覺得我和那些說烏克蘭語的人有些許不同，但我們仍然是同一個民族。其實在烏克蘭，人與人最大的分別，不是在於語言，而是在於親俄與親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這種分別某程度上是源自於人們收看的媒體資訊，令人們產生不同政見。例如如果你只看俄語的媒體，你涉獵到的大部分都是俄羅斯的國家宣傳資訊。相反，烏克蘭語的媒體會比較接近事實和真相。因此，不同的媒體會影響人們如何理解什麼是真相。這與香港和中國的狀況很相似。在中國大陸境內的媒體和資訊基本上是單一和封鎖的。而在香港，也會分開親中國與在香港相對較熱愛自由的人。」

筆者聽到這裡，不禁想起在香港黃藍撕裂下不同媒體的定位和立場。然而，在過去這一兩年，其實大部分非建制的媒體，例如《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都已經一一被消失。這種情況其實與烏克蘭是相對不一樣。因為香港並非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一個受中國管治和同化的城市。因此，香港的媒體生態，卻會越來越像 Misha 描述他在俄羅斯當地看見的媒體景象那樣，只有一把親政府的聲音存在。筆者接著便問 Masha，既然烏克蘭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是如何理解一直存在的分裂。

他提到：「這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我們的國家其實仍然是非常年輕，只有 31 年的歷史。雖然我們的民族有一個更長久的歷史，但我們的國家政體，尤其是民主政體，其實只是運作了 31 年的時間。在這之前，在後蘇聯時期，其實經濟一直都有很多問題，也有很多貪污腐敗的問題。然而，我覺得縱然

國家內會有不同的聲音，至少我們的命運是掌握在烏克蘭人自己的手裡。我們不需要俄羅斯政府來決定我們的領袖，也不需要美國政府的參與，而是真正的民族自決。我認為這是非常珍貴的。說起來，我認為香港人也應該要有相同的自決權，他們應該可以為自己希望的未來作決定。而對於國內的分裂，以往我們其實希望彼此可以互相尊重的。但是這場戰爭，讓我們站在非常不同的立場上。例如我的父母，他們現在居住在莫斯科。他們認為戰爭的發生，是因為美國在北約（NATO）的影響力，令北約組成軍隊（在歐洲）威脅俄羅斯。而俄羅斯是為了對抗美國而入侵烏克蘭。其實他們的這種理解完全是一種被洗腦的世界觀。他們把美國和歐洲的國家都當成敵人來看，而這是在俄羅斯非常普遍的國家宣傳策略。就像那些中國人一樣，對西方非常反感和討厭，但卻又會到香港買 LV 手袋。因為知道香港的外國品牌沒有假貨，所以經常到香港享受自由世界所設立的規則和好處。而當你跟這些人說真正的歷史事實時，他們的世界觀會崩潰。因此，其實是很難說服那些親俄份子去理解外面的世界。」

烏克蘭與香港的跨國連結

「其實自從烏克蘭的戰爭發生以後，我覺得很難跟這裡的美國人講香港人的狀況。就好像這套《時代革命》電影一樣，我覺得這是一部給香港人看的電影。但你叫我帶一些本地人去看，我反而會覺得，他們看完以後會不以為然。因為當每天在烏克蘭都有很多人流離失所和死亡的時候，其實香港的狀況相比之下真是不算甚麼。」這是一名香港移民朋友在烏克蘭戰爭發生後，跟我分享的一種內心感受。

每次當我們嘗試尋找不同地方的聯繫時，少不免會有一種「比較」的心態，就是把各自的慘況放在一個天秤上作為比較。回到最初提及那些把香港反送中運動對比韓國「光州事件」和「新疆反恐模式」的 KOLs，其實他們的跨國比較都難免走入這種刻意把兩地的狀況看成類似的對比中。這些比較都是從香港人的視角作為一個建基點，來看世界的不同事件。

在這篇文章的 Misha，剛巧是反過來從烏克蘭人的視角來看今天的中國與香港。對於Misha 來說，他在蘇聯解體後時期經歷的親烏克蘭與親俄羅斯的分裂，還有媒體的分野，剛巧適用在理解當年他所看見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狀況。而香港的親建制與非建制陣營，與他在烏克蘭的親俄與親烏陣營有類似的對立狀況。

而筆者發現，從烏克蘭人的視角看香港，不但不會質疑香港本身的獨立性，反而會更理所當然地把香港當成是一個獨立國家來思考。因為對於 Misha 而言，香港就像是他所土生土長的烏克蘭，在面對鄰近大國霸權的威脅下，本地也出現了「親俄」與「親西方」的陣營。在這種分裂的情況下，烏克蘭人

還要抗拒俄語媒體的洗腦，必須保留烏克蘭的歷史和國族身分認同。

對 Misha 來說，俄羅斯與中國是兩個相當類似的霸權國家，有著類似的反西方傾向和對言論自由與媒體的審查制度。因此，縱然 Misha 對於廣東話文化的理解甚淺，甚至只會把 Mirror 看成是 12 個香港人的男子組合（至少不是粉團），但他對於香港的政治狀況所產生的共鳴，是建基於社會撕裂與受帝國霸權的壓迫和侵擾。

透過訪問 Misha，筆者認為除了了解為何支持香港人這一個問題外，更重要的，是看見那從其他國家的角度觀看香港的思考方式。當香港人流散在不同國家的時候，不同地方的人民會對香港帶有不同的想像。雖然香港人一直把「西方社會」看成是一個單一的（monolithic）的國度，但其實在所謂「西方社會」中，不同國家的人是帶著不同的建基點來理解香港問題。透徹知道這些視角的出發點，會更容易讓香港人流散者與其他族裔的人士建立互相支持的關係。也會幫助香港人在國際舞台上找到延續身分認同方式。



從烏克蘭看世界

烏俄戰爭與自由國際秩序

作者｜畢迪



烏俄戰爭與自由國際秩序

作者 / 畢迪
前國是學會成員。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初期，不少評論人形容是次戰爭代表著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崩壞：普京公然違反國際法，犯下侵略罪和戰爭罪，而且專制獨裁的普京對民主國度開戰，直接挑戰整個自由世界秩序。但到後期隨著西方國家團結起來向俄羅斯實施制裁，多個西方國家一改過往的被動政策向烏克蘭提供軍備、而東歐相對反移民的國家又開放邊境接納烏國難民，卻令部分觀察者相信烏俄戰爭是一課有效的「震撼教育」，激發起以往處於安逸的西方國家維護自由國際秩序的決心。

同一場戰爭，卻引來兩個看似相反的詮釋。究竟烏克蘭戰爭之後，自由國際秩序究竟孰生孰死？對香港又有甚麼啟示呢？本文嘗試定義自由國際秩序和化解相關的迷思，分析烏俄戰爭如何反映自由國際秩序的利弊、如何改變我們對觀望國際局勢的眼光，並淺談「帝國夾縫」下的香港人可以如何適應國際政治的新時代。

定義自由國際秩序

正如「法治已死」的命題一樣，一個人犯法不一定代表法治的淪喪；一個國家違反自由國際秩序的規範，也不一定等於秩序已死。當分析戰爭對整個國際秩序的衝擊時，我們必須釐清何謂自由國際秩序，和理解它的邏輯，是否能可持續地形塑國家的行為。在西方評論中很少見到自由國際秩序的準確定義，令大眾對當今的國際政治產生了不少迷思。例如國際秩序何以見得是「自由」呢？自由真的是國家存在的最終目的嗎？爾虞我詐的國際博弈，真的會講秩序、講原則價值嗎？

先說「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的含義。一般學者認同國際秩序是由一系列的國際價值觀、規範和制度組成，用以管理和規範國與國之間以非暴力形式的相處。二戰後由美國帶領創建的一系列國際制度和規則，構成了自由國際秩序的雛形。經濟上，它主張相對開放、自由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包括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多個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世界銀行等的發展機構。政治上，它設有讓國家合作、磋商的平台，如聯合國、或歐盟等其他地區性政治組織。軍事上，它有美國帶領的眾多軍事組織，例如多邊的北約（NATO）、雙邊的軍事聯盟（如美日聯盟）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等。國際秩序還包含眾多議題性的組織、以及跨國的公民社會組織等等。透過這些機制，自由國際秩序嘗試將國際關係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用以常規化國家行為。

自由國際秩序意圖透過這些機制，實踐兩種意義上的「自由」。第一種意義，是主權國家免於被統治的自由：自由國際秩序繼承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確立了「主權不容侵犯」的規範，賦予每個國家平等的政治權利。當國家之間有利益衝突，國際機制提供調解糾紛的渠道，削弱軍事強國以暴力謀取利益的理由，讓小國免受強國霸凌壓榨。正因如此，亦有其他學者稱此秩序為「以規則為基準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order）」。

以主權國家為單位、以國家主義的角度去詮釋自由國際秩序，假如套用在專制國家身上，過分強調主權，反而有機會違悖自由主義中以人為本的要素。例如中共外交部就經常以「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等論點為由，反駁西方國家批評中國境內泯滅人權的行為。

自由國際秩序的第二種意義 —— 宣揚和促進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 —— 就是國家主義的反面。二戰後，西方國家對內發展和維護民主政制，成為民主的楷模，對外亦積極支援其他民主國家，並間接促成數波民主化浪潮。它們亦嘗試在各種國際機構加強對人權的重視，例如 1945 年起草的《聯合國憲章》序言，清楚說明了人權是該組織的核心價值之一。自由國際秩序對人權的重視，在冷戰結束後更為顯著。例如 2002 年訂立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管轄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戰爭罪和侵略罪，有多達 123 個締約國。2005 年聯合國確立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指出國際社會有責任對犯罪國家作出人道干預，保護平民免受上列罪行侵犯。

現實主義的批評

自由國際秩序聽起來十分理想，但實踐上卻是甚麼一回事？不少現實主義學者批評自由國際主義過分「離地」，以價值觀主導外交政策，輕視計算現實政治，令西方國家作出了許多失敗的政策。在烏克蘭議題上，最著名批評聲音來自現實主義泰斗 John Mearsheimer。在 2014 年俄軍佔領克里米亞後，他在《外交》雜誌撰文表示西方才是烏克蘭危機的罪魁禍首。他指摘美國被冷戰的勝利衝昏頭腦，多次漠視俄羅斯反對，容許北約向東擴張，在 1999 年引入波蘭、捷克和匈牙利，2004 年再納入 7 個東歐國家，最後在 2008 年的布加勒斯特峰會表態支持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盟。

北約的立場建基於上述的兩種自由：因為所有主權國家都是平等的，他們有權自由選擇與誰結盟，選擇加入北約；北約的「門常開」政策亦一向歡迎任何能貢獻聯盟的國家加盟。格魯吉亞與烏克蘭亦有動機去成為西方體系的一員：它們親歷了蘇聯共產經濟的失敗，深信靠攏西方自由市場有利它們的經濟發展。它們意識到假如俄羅斯他日復興帝國主義，它們獨立的民主政權便

岌岌可危，於是有了動機尋求強大的軍事盟友去防禦外侮。

北約的擴張並不是西方單方面強加於東歐國家身上，而是由下而上、弱小國家拉攏富裕國家的訴求。前蘇聯幾經波折才得到民主獨立，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和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中，人民對民主的熱情打動西方國家，令北約想對兩國伸出援手。

但在 Mearsheimer 眼中，主權和民主雖然可敬，但不一定符合政治現實。他認為早於 90 年代中開始，俄羅斯已經非常清楚地反對北約東擴。俄羅斯在 2008 年入侵決心加盟北約的格魯吉亞，便證明了俄國視兩個前蘇國家為核心利益。帶領自由國際秩序的西方國家，沒有顧及俄羅斯的「正當的安全利益」，便以普世價值為名向格魯吉亞與烏克蘭伸出歡迎之手，卻沒有考慮到與俄羅斯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亦沒有實質的計劃去落實兩國的加盟。北約國家在下定決心阻嚇俄羅斯之前，便輕率地挑釁它，最終釀成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大禍。

現實主義批評以價值為主的外交政策，自有其可取之處。民主自由並不是國際政治的唯一目的，國家決策者必須衡量守護民主的代價會否抵觸現代主權國家的其他政治目的，包括國家存活、乃至人類文明的集體安全。例如烏俄戰爭中，俄羅斯擁有全球最大的核武武器庫，並且多次恫嚇如果外國勢力直接介入戰爭，它便會動用核武。烏克蘭雖然不是北約成員，但假如北約成員（如鄰近的波蘭）在支援烏國期間，稍有不慎與俄軍交火，那北約第五條列明的集體自衛權，便要求北約全體採取必要的行動（包括武力）去阻止俄國攻擊。這有機會令局勢失控地升溫，甚至會引發核戰。西方國家的決策者必須衡量這些風險，不能說一句「自由無價」便不惜代價地支援烏克蘭。

但 Mearsheimer 矯枉過正反過來指摘西方，在道德上、邏輯上、甚至實證上都是說不通的。難道作出入侵決定的普京就不必負任何責任嗎？現實主義過份依賴結構主義的框架，將一切決策視為結構性的必然。國際政治的結構最多只能限制決策者的選項，並不能支配普京的整個決策過程。大規模入侵烏克蘭不可能是普京的唯一選擇，而現實主義亦解釋不了為何普京選擇在此時此刻下這個決定。

這說明了除了國際局勢的結構外，個別決策者的能動，甚至是政權類別在國際政治中有著舉足輕重影響。從結果論來看，普京入侵的決策的確稱不上是理性地回應結構的呼喚：他嚴重低估了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決心，烏軍在西方的軍事支援下負隅頑抗，有力地抵禦俄軍推進，阻止了俄軍攻取基輔、安插傀儡政府的目的，同時西方全方面、強硬的制裁嚴重地削弱了俄羅斯經濟。

這是一次性的誤判、還是獨裁體制根本的問題？倫敦大學學院教授 Brian

Klaas 提出，普京之所以誤判，是因為他陷入了「獨裁者陷阱」：獨裁者為了獨攬大權，不停打壓異見、製造恐慌，令臣民只敢唯唯諾諾，不敢直言進諫。獨裁者只能接收不完全、甚至錯誤的資訊，容易錯判形勢。例如普京一手推動的「烏俄一家親」的荒謬論調，經官媒幾番傳播，在俄羅斯彷彿成了現實，到頭來可能欺人自欺，令他誤以為烏克蘭人民會歡迎俄軍光臨。又例如 3 月份有情報顯示，俄國軍人懼怕上報進軍失敗，「誤導」了普京去相信俄軍勝算在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 Daniel Treisman 亦提出，普京鞏固了獨裁政體，自覺成功鎮壓異己，令他「獨攬大權膽自大」，更放任追求他擴張俄羅斯、復興帝國的「鴻圖大略」。[1] 從這角度看，俄國攻打烏克蘭，錯不在西方想保護弱小的民主國家，而是在獨裁者普京因不受制約而任意妄為。因此，自由國際主義強調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其實是為了約束國家領導人的野心，以此維護世界和平。

論述經不起考驗

這個駁論雖然原則上辯護了價值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但烏俄戰爭依然凸顯了自由國際主義的很多不足之處。其中最明顯的，自由國際主義並不能提供一個可行、一致的政策框架，它過往的外交政策「成績表」並不亮麗。例如即使我們接受民主能促進世界和平，那又如何？難道代表民主國家應不計代價地散播民主？美國在 2001 年入侵阿富汗和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均是奉自由之名，以武力去建立民主政權。最後兩國飽歷戰禍，民主卻只曇花一現、無疾而終。

自由國際主義的和平手段同樣失敗。自由國際秩序的其中一個支柱是經濟自由：一方面，當國與國之間有緊密的經濟交流（例如貿易、金融、生產），它們便會互相倚賴、「有錢齊齊搵」。由於戰爭會擾亂這些經濟關係，令侵略的成本上升，所以國家決策者有了反戰的誘因。另一方面，當一個國家開始富裕，其中產階級便會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管治，出現支持自由化、民主化的聲音。

但烏俄戰爭顯示，經濟上的互相倚賴並沒有降低普京的侵略性。戰前的俄羅斯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之一[2]，供給歐盟 40% 的天然氣和 25% 的煤。即使普京明白歐盟的經貿制裁及美國的金融制裁會重創俄羅斯經濟，他亦不為經濟誘因所動，執意征戰烏克蘭。經濟發展亦無力阻止普京鞏固獨裁體制，民間反戰的聲音瞬間被政權的打壓和官媒政治宣傳淹蓋。

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4-06/putin-russia-ukraine-war-unbound

2.https://www.nytimes.com/2022/03/04/business/economy/ukraine-russia-global-economy.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烏俄戰爭進一步揭露了民主國家與威權「交往」的危險。香港人不會對此覺得陌生：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實行「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主張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並支持它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結果中國打入西方市場成功致富，卻沒有民主化，反而透過其經濟網絡在世界各地培植「銳實力」。經此一役，歐洲終於警覺與俄國經濟互相倚賴（Interdependence），並不是謀求和平的秘方，反而只是姑息養奸。戰爭加快了國際經濟的「去全球化」，互相倚賴的風險促使西方民主國家與中俄威權軸心「脫鉤」。

歐美國家為懲罰俄羅斯的侵略，施展全方位的經濟、金融制裁，切斷俄羅斯接觸西方金融體系、縮減對俄的經貿來往、尋求第三方的能源進口。失去西方市場的俄羅斯轉靠中國的經濟支援。而中國目睹西方經濟制裁的效率後，勢必強化其經濟自主，投資重要產業（如科技）的國內生產鏈，減少西方制裁的風險。

自由國際秩序的另一個支柱是國際組織，嘗試以制度來規範國家行為。但現實卻是，國際法和制度沒有制止俄軍殘暴的侵略行為。聯合國首當其衝，俄羅斯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戰爭爆發初期否決了一項停止戰爭的議案。及後聯合國大會雖然大比數通過議案要求俄羅斯終止侵略，但流於象徵，缺乏約束力。這說明國際組織非但沒有約束大國的野心，聯合國失衡反而是大國弱肉強食、為所欲為的佐證。

民主國家團結？

但有危自有機。雖然聯合國受俄羅斯、中國癱瘓，但圍繞西方的組織如北約、歐盟，卻被俄羅斯的侵略激發了危機感，更加團結起來。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任內經常批評北約過於依賴美國的軍事力量庇護，但歐洲各國見證了俄國的暴行，終於重新投資在軍備上、並積極鞏固它們的聯盟。二戰後的德國一向主張和平主義，但經烏克蘭戰爭的震盪，竟承諾花 3% GDP 在軍隊預算；瑞士長期主張中立，今次竟主動配合西方制裁；芬蘭、瑞典就算素來避忌挑釁俄國，也不得不因俄羅斯的威脅而考慮加盟北約。正因如此，有評論認為普京侵佔烏克蘭，本來是蔑視民主和國際規範的行為，最後卻招來反效果，令積弱的西方國家重振旗鼓，自由國際秩序得以重生。

但自由世界真的終於覺醒了嗎？它們會加緊圍堵威權國家？全球民主會因此得益？ 烏俄戰爭的象徵價值，對其他國家的民主發展功效甚微。根據 Freedom House 最近發表的報告，在 2021 年全球民主狀況連續第 16 年倒退；Varieties of Democracy 更言 2021 年的全球民主進程回到了 1989 年的水平，許多民主國家（如巴西、匈牙利、印度、土耳其等）出現「威權化（Autocratization）」的跡象。
傳統西方的自由堡壘亦不能倖免：它們的民主基礎漸漸被各種結構性因素腐

蝕。例如極端的政治兩極化，造就民粹政治家的興起；假新聞、假資訊的散播手段層出不窮，資訊環境轉趨混亂；社會間的互信、民眾對公共機構的信任下降；部分民主國家的新自由經濟模式，加劇了財富不均、氣候變化等的問題。相對於威權國家的外在威脅，以上列舉的問題均是民主國家內部面對的挑戰，令民主的認受性大不如前。除非民主國家能解決這種種難題，否則在威權國家發難作祟之前，它們的自身民主政制會先從內部崩壞。

就外交政策來說，若「自由世界」是指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那其實自由世界的外交政策是四分五裂的。拜登上任以來，嘗試民主和獨裁的兩分法去劃分國際政治陣營，西方國家亦喻烏克蘭為民主的最前線。但事實是民主陣營中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迥異的外交目標：前者盼制衡中、俄，後者則著重經濟發展和局勢穩定。

就民主國家對烏俄戰爭的反應而言，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印度，因依賴入口俄國軍備和能源，一直拒絕拒絕參與制裁、甚至連象徵式譴責也推搪掉；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的民主國家，也因各種考量而拒絕參與制裁。

屬於戰略要地的印太地區，就只有美國最忠實的盟友——澳洲、日本、紐西蘭、星加坡、南韓和台灣，附和西方制裁。如果將對手由俄羅斯換成經濟網絡更廣闊更發達的中國的話，民主陣營恐怕只會更加渙散。試想想，中國「一帶一路」、「數位絲綢之路」等大型跨國投資項目迎合了新興市場的需要，令許多發展中國家不願歸邊西方陣營。

正如冷戰期間由印度帶領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主張外交自主，拒絕與美國或蘇聯結盟，在新冷戰格局下，西方國家與中俄軸心的角力之間，非結盟國家將會以地緣政治利益主導它們的外交政策。會以「支持民主、反對威權」的框架制定外交政策的國家，未來可能只限西方國家。

結語

啓蒙運動哲學家伏爾泰曾批評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近幾年也有國際關係學者批評，自由國際秩序歷史上從來「既不自由，也非國際，更非秩序」。烏俄戰爭無疑是暴露了自由國際秩序概念和實踐上的空虛。自由？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威權軸心興起，維護威權政體的利益，挑戰自由主義的霸權；部分民主國家受威權化問題困擾，自身難保。國際？雖然西方的發達國家在危難裡團結起來對抗威權軸心，但全球各國對俄國侵略的回應談不上一致，就連民主陣營內部亦有諸多分歧。秩序？俄羅斯的侵略揭露了歐洲安全秩序的脆弱，戰爭揭露了自由國際主義維護穩定和平的論述，根本打不響如意算盤。

二戰後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一直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石，但伴隨著美國霸權岌岌可危，國際政治格局趨向雙極（Bipolarity）甚至多極（Multipolarity），新一輪的地緣政治競賽將會令國際關係更為紛亂、難以再持久地依照自由國際主義的原則運行，自由國際秩序或將萎縮成自由西方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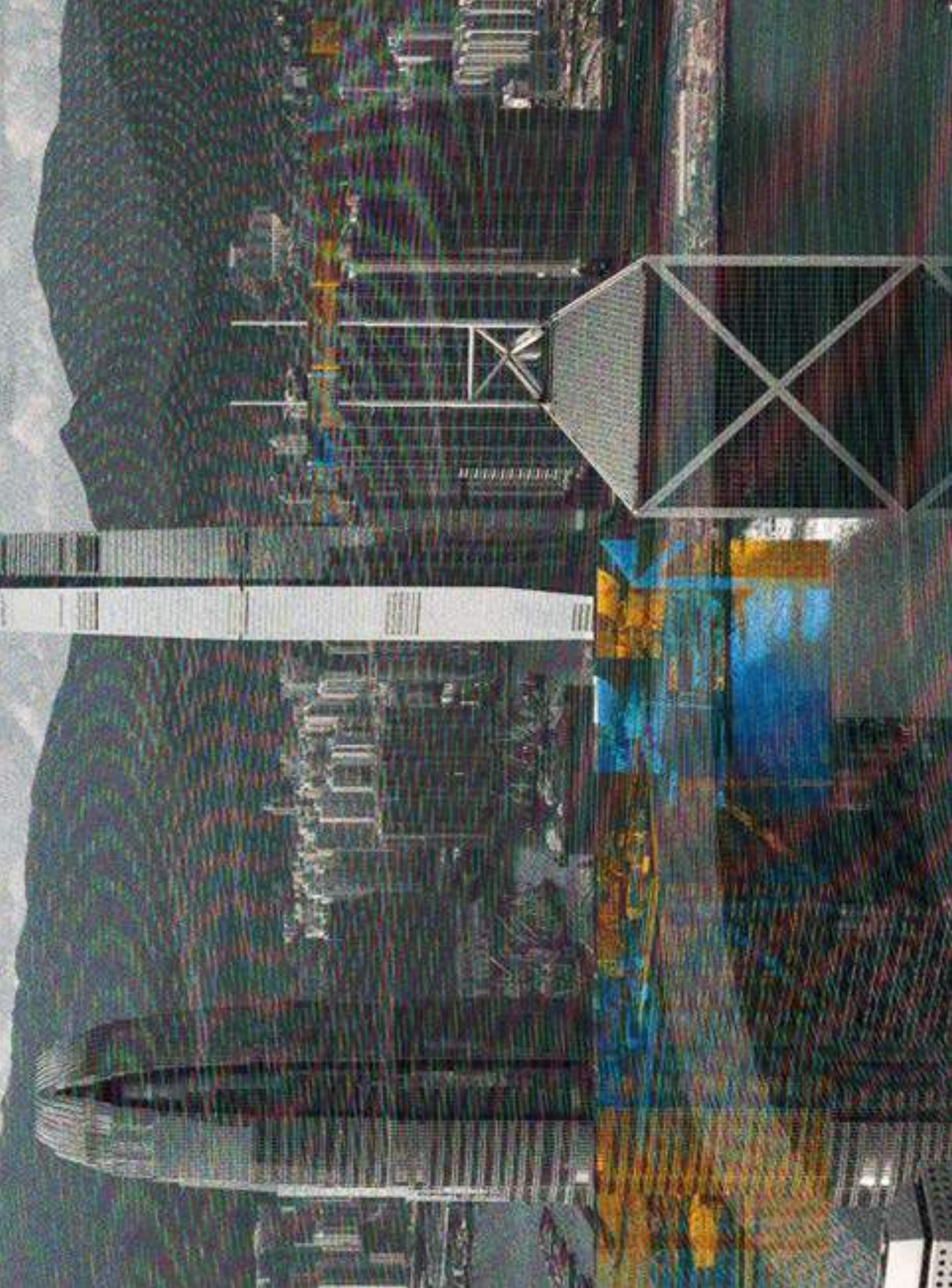
從宏觀角度看，以上的結構性因素不利於全球的民主發展。西方國家內憂外患，無暇介入他國的民主化進程。主權國家尚且可以動用國家資源，去抵禦威權國家的侵略或修補民主體制內部的漏洞；對於香港人等「無國家民族」來說，民間動員屢受國家機器打壓，民主路途更是難上加難。

但正如筆者以上對結構主義的批評，我們會受結構所限，但它並不能定義我們的命運。主流國際關係觀點——包括自由國際秩序，均是以主權國家的角度出發，很多時忽略了非國家群體的能動。香港人要在主權國家為首的國際政治秩序裡開闢新的蹊徑，必須以嶄新的目光去觀望國際政治，在看清大國之間競賽的空隙之餘，亦不忘聚焦在自身族群的能動性。



Source : Anastasiia Krutota on Unsplash





2022 JUL
如水 flowHK
6 世界與香港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世界與香港

以人民為視野

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
蒙兆達

Vol.6
2022 JUL

如水 flowHK

ISBN 978-626-96400-0-3



封面人物

以人民為視野：訪問蒙兆達

作者｜式、六月



以人民為視野：訪問蒙兆達

作者 / 式、六月

封面人物介紹 ：蒙兆達，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

引言

過去兩三年，不少流亡海外的香港人紛紛設立新組織，為把香港的抗爭運動延續到海外。然而時日久了，很多組織者都會發現要把「延續抗爭」的說辭從一種精神上的信念轉化成行動實在不容易。要在當地社會著實提高大眾或「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實在不是一個遊行、集會就可以輕易做到。要如何把香港的問題聯繫到不同國家才是關鍵所在。

「其實我們正面對一個全球的公民社會，需要的是不同類型的戰線。」面對政治打壓下被逼流散海外，這次封面人物之一的蒙兆達帶著他在香港的工人運動經驗來到了英國。蒙兆達是前職工盟總幹事，在今年 5 月 1 日勞動節期間在英國建立一個新組織「香港勞權監察（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在早前一些媒體訪問中，蒙兆達曾經提到他初到英國的時候，也曾經有過一段愧疚的時間。但立足在英國，他漸漸理解自己身處自由世界，其實仍然有許多行動可以實際地支援香港。而「香港勞權監察」就是那個把香港工人與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聯合起來的橋樑。

蒙兆達說道，「香港現在急速地衰敗，面向外間的聯繫有種種限制。對於香港仍然在發生的勞資糾紛，他們的在地抗爭如果要向外尋求支援的時候，要把訊息傳遞出去的時候，已經變得很不容易。特別是國安法的陰霾之下，許多與外國的聯繫和援助都會被抹黑為勾結外國勢力。因此 . . . 我們希望在英國可以成為香港工人運動的窗口，支援香港工人。」

提到工人運動，相信不少讀者都會想起香港多年來透過工人運動爭取的最低工資法、2013 年碼頭工人罷工運動、或 2020 年初醫護罷工行動。其實工人運動在世界不同國家也經常發生，例如 1926 年英國 Trade Union Congress 發起的大罷工、1918 年拉丁美洲的大型工人運動、2020 年印度的工人與農民大罷工等。

因此，在蒙兆達眼中，所謂「國際工人運動」不只是由幾個重要的西方霸權國家組成，也包括一些在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發展中國家。這也許與許多正在以「無黨派取向（Non-partisanship）」方式搞「政治遊說」的「國

際戰線」不一樣。提到勞工權益，不少國家的工人運動都是帶有強烈左派思維。然而，這種左派政治論述在「反霸權」前提下，可以「把香港勞工聲音帶到國際」。因此，在蒙兆達眼中，「國際戰線」是建立在「全球公民社會」的普世價值上。

全球公民社會視野

何謂「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為何這種視野可以在國際社會上延續香港抗爭？根據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定義，全球公民社會是由不同「跨域國界和政府的組織」所形成，這包括國際性非牟利機構、社運機構、文化、商業和藝術組織等。研究國際社運的學者均認為，當本土運動可以挑戰政權的機會逐漸變得渺茫時，這些跨國組織可以發揮作用，透過在國際社會上產生聯繫，令其他國家的政要和官員從國際關係層面幫忙為本土社運發聲。

在 2019 年期間網民透過 Stand With Hong Kong 發起的 G20 峰會全球登報行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香港網民透過串連國際媒體，在報章上刊登訴求，然後透過 G20 這一個跨國組織的會議，來向中國和香港政府施壓。

然而，羅馬並不是一天建成的。外國政府對於香港的關注，除了有報章行動的加持以外，也是基於中國與各國牽涉到經濟、國防和安全等利益關係，還有當地社會政客和人民對於中國侵害人權的關注而產生的。而蒙兆達所思考的國際戰線，則是傾向從後者入手，透過民間社會的工人團體向當地政要表達對香港的關注，從基層來帶動國際關係。因此，除了在國會遊說的行動以外，蒙兆達認為香港人也應該繼續從各國的公民社會空間出發，尋找更多不同支持香港的聲音。

蒙兆達提到，「如果我們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不同國家的政府、議會和官員身上，其實我們沒有處理到許多這些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實不只有一條戰線。其中一條是政治遊說，有許多朋友很有心地去做。這方面的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這個面向。我們也要看看國內民間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的定位是面向更多國際的工會組織，他們也是全球公民社會的一些 key players。所以當我們和他們闡述一些香港的工人抗爭故事，當我們想得到他們對於香港的關注的時候，他們也會在他們的國家產生一些政治作用。因為他們的政府需要 accountable to 他們的人民。在歐洲、美國甚至亞洲國家，他們的工會組織在當地社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持份者。因此，當我們比較立體地看見一些國家的政要和議員，他們之所以會對香港有某些取態，也是他們在當地社會與公民社會的不同持份者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如果我們不思考如何在公民社會層面工作，我們就會慢慢流失當地公民社會對於香港的支持。

對於我來說，我希望大家看見，其實我們面對一個全球公民社會，需要不同的戰線。而我們的定位是希望凝聚不同國際工會的團體，與不同工會社群對於香港議題的關注，特別是未來香港工人運動的支持。我覺得其實需要不同的戰線之間的合作，例如新聞、人權、環保、婦女團體，我們需要就不同的戰線互相補位，來產生一種互動作用。」

然而，這種合作關係真的有用嗎？不少香港人在過去的美國大選期間都紛紛認為國際社會需要的，其實是一個強人。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正是一個被推崇的右翼強人，用以抵抗中國的勢力。而因為特朗普在總統任期的後半階段，在公開言論上處處與中共針鋒相對，所以不少香港人會認為特朗普才是香港人真正的世界盟友。

而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邊，那位特朗普的競選敵人拜登（Joe Biden），不少香港人會描述他為擁抱中國大陸的「親共政客」。同一時間，一些香港人也會批判左翼的政治理念，認為「左膠」對國際普世價值的執著極其量也只會是軟弱的國際壓力。那麼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上，以「左翼」為基礎的工人運動還有抗爭的力量嗎？

在蒙兆達眼中，香港人對特朗普的崇拜其實是有一個根本的前設，就是國際關係只有霸權國家之間的角力和政客之間的利害關係。對蒙兆達來說，國際關係不只是建立在國與國和政要與政要之間的關係。這些國家和政要對中國的態度，是基於當地社會的公民社會支持而產生。因此，國際關係的體現不應只建基於是否支持一個「人」的問題上，而應該是要對一些「事」的普世價值取態上。這樣才可以令香港問題在各國的公民社會中產生共鳴和支持。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令他更容易在世界各地找到不同的連結。因為不同地方的人所面對打壓經歷是可以比擬的。

因此，在烏克蘭問題上，不單是因為俄羅斯本身作為一個中國盟友入侵烏克蘭，所以烏克蘭人是香港人的朋友。更是因為香港人和烏克蘭人（也包括台灣人）均面對霸權的入侵和無止境的軍事威脅，所以應該互相支持。這種邏輯套用在工人運動上，就可以讓更多不同國家的工人組織透過看見香港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跨國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而找到支持香港的根據點。

連結全球工人：優勢與挑戰

對不少人來說，從一個較為現實角度出發，其實不同國家的人民面對不一樣的政治現實，他們的文化與利益也不一致，我們該如何以全球公民社會的視野來建立集體行動？若我們依蒙兆達所言，走出國家視野的框架，轉以工運為軸心的人民視野，我們或許能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更或許能看到一個已經實然存在的全球公民社會。

多年以來，職工盟均為 ITUC（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一員。ITUC 多年來一直以推廣及捍衛工人權益為宗旨，促進各地工會合作並進行國際倡議工作。現在 ITUC 的成員遍佈 163 個國家，一共代表 2 億工人，儼然是一個全球公民社會的網絡。

蒙兆達指正因職工盟一直是 ITUC 一員，各地工會會在不同場合交流，其成員亦有多年交往關係，亦會互相聲援對方的抗爭，例如 2013 年香港碼頭工潮便得到來自各地碼頭及運輸工會的大力支持。所以當他們說起香港的抗爭故事時，其他成員亦會較易理解並信任他們。

但縱使如此，他亦聽聞有一類左翼人士覺得職工盟甚至整場香港反修例運動，都是由美國背後所操縱。蒙兆達不知道有多少人這樣想，但左翼中的確有一個流派，會覺得香港組織收了許多美國的錢來做這些抗爭，甚至退一步，即使香港抗爭者沒有收美國政府的錢，但因為反修例運動在詆毀中國，所以從結果而言，香港人也在助長美國帝國主義。

這種意識形態並不是一朝一夕所建立起來。據蒙兆達所言，他們有不少人在蘇聯時代就受史太林影響，甚至在布拉格之春時，即使蘇聯的坦克車駛入布拉格廣場，他們也拒絕譴責蘇聯。時至今日，他們中間甚至有人不願意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惟恐這樣也會助長美國帝國主義。

蒙兆達指面對這些人，最好的辦法是向他們描述香港人所面對的具體狀況。事實上，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根本不理解香港的政治現實。他會向他們解釋香港人所失去的是基本人權與自由，不論他們所抱持的是甚麼意識形態，捍衛這些東西也是有如呼吸空氣一樣，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他亦會向他們解釋職工盟與其他組織的合作是建基於國際的工人團結運動，完全不涉及傾向任何一方的政權利益。在很多時候，認清對方所身處的現實是擺脫對立的意識形態的第一步。

但歸根究柢，我們要擺脫以國家政權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只要我們依然覺得只要跟中國對立就是支持美國，又或只要不支持美國就是在為中國撐腰，

我們就無法走出這個二元對立。這種從冷戰時代到今天以國家主義為視野的取態，逼使我們向某一國家靠邊而敵視其他國家的政府以及人民，而正正是這種取態，定義了某些左翼流派的意識形態。蒙兆達指，若我們能反過來以上述的全球公民社會作為定位，我們就能擺脫國家的視野並以人民的視野取而代之。不論是在歐美抑或在香港及中國，都有被資本以及霸權所剝削的團體和人民，當我們定位以他們為團結對象的時候，我們就不用選向哪個霸權靠邊或要被逼為某個霸權站台。

以上的建議不只適用於歐美的左翼分子，亦適用於不少香港的群體。不少香港人太輕易墜入不支持民主黨就是支持共和黨（又或不支持保守黨就是支持工黨）的二元對立之中。我們尤其容易墮入一種非友即敵的態度，只要外國政府或政要與北京持敵對態度，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反之則是我們的敵人。對蒙兆達而言，這種想法其實有其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當我們向世界說 Stand with Hong Kong 之時，這個訴求是指向普世價值。我們的意思是，香港人正在捍衛民主與自由等不能被替換的普世價值，並以此說詞來說服外國政府，希望其他國家不要為經濟或貿易利益而放棄對普世價值的支持。若然我們認同這些普世價值不能被替換，當我們看到其他政府正在打壓工會、侵犯婦女、對人權極不友善的時候，我們理應持有同樣批評的態度與覺醒的態度，不能因其與北京敵對就妥協，不然我們就會與我們聲稱所捍衛的價值相違背。

不少海外港人組織或許會對以上的結論持懷疑態度。我們在第四期的《如水》訪問了多個組織，他們不少人都認為若然香港人要繼續進行遊說及倡議工作，他們就要保持 bipartisan 或 non-partisan 的態度，不能得罪任何一個當地政黨。蒙兆達對這種態度有所保留。

他說，當你在英國成立組織，就職當地企業，參與本地工會時，你不止是香港公民社會的一員，更是英國公民社會的一份子。這樣的話，你無可避免要就英國的本地事務表態。海外港人的著眼點不應是如何避免表態，而是如何選擇他們的路線與意識形態。對香港勞權監察而言，他們支持香港工人運動，亦認為工人運動是香港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反映了他們對民主的視野與願景，而這視野是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中不可迴避的。

為何不可迴避？當我們放眼世上的民主政府時，有些政府較偏向支持資本自由，其他政府則較著重市民的社會福利，民主政體之間的構成與路線可以大不相同。蒙兆達認為我們不可以說讓我們先爭取民主再來處理這些問題。若說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是一張白紙，那只是自欺欺人。畢竟，在民主運動之中，這些不同的路線之間一直在互相競爭並交流，我們要做的不是對這些路線視而不見，而是弄清我們自己支持的是哪條路線。

從香港勞權監察的定位而言，當工人權益、弱勢社群的保障、又或人民基本人權被侵犯時，不論這些人身處何方，勞權監察都會留意被壓迫人民的狀況並發聲支援他們。反之，當香港工人的權益被侵犯又或香港公民組織受到打壓時，勞權監察也希望海外的工人組織能支援香港人。蒙兆達明言我們要建立的是人民的力量（people's power）。人民並不囿於一個地方或領域，當我們面對的是跨國的強權或資本剝削時，我們也需要以跨國的合作去應對之，而這就是人民的力量。

本地香港抗爭在高壓環境下如何延續

這種發自民間的力量，除了在國際社會上可以讓香港議題得到關注以外，蒙兆達認為，在香港本地社會中，也可以產生一種團結性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在黑暗的政治打壓時期中，讓反抗意識延續下去。

他在訪問中提到著名捷克前總統、作家及思想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 1985 年所寫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提出的「平行社會（Parallel Polis）」概念。蒙兆達認為，在極權打壓之下，當政治空間日漸收窄的時候，香港人更應在生活上尋找更多非政治空間來產生政治性行動，以達到哈維爾所提到的「另類地下文化（Alternative Underground Culture）」。

蒙兆達提出「在上世紀 70 年代東歐共產政權統治下的一些異議者運動中，他們提出否定政治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他們當時在波蘭、捷克等地也是面對很嚴峻的政治打壓。也許，我們無法即時改變政權的體制，但我們可以把集中力從改變政權，轉移到「自主生活空間」或「日常公民權利」中。從這些範疇去累積抵抗力量。

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如果直接挑戰政府地位和權力，就會可能迅速招致打壓，很難聚集民間力量。所以從策略上來說，把專注轉移至社會領域，或許可以得到更大空間。二，爭取民主並非單純從改變政權可以達致。非政治性、生活上的抗爭其實也是實踐社會民主化的進程。在面對今天嚴峻打壓，似乎我們展現出來一些新的抵抗形式，也是與當時東歐的政治策略相似，也讓我們看見許多新抵抗模式和型態。」

因此，雖然香港本地的大規模遊行、集會和其他抗爭運動已經在國安法通過後消亡，但人民仍然可以在非政治層面的空間建立一些共同生活方式，讓反抗意志繼續延續下去。

在生活經濟方面，蒙兆達認為黃色經濟圈雖然從表面上看今非昔比，但人們的消費習慣仍然沒有改變，仍然在堅持抵制主流親建制的主流經濟。而面對洗腦教育的問題上，不少民間學習平台和獨立書舍的成立，也讓不少香港

人可以繼續在這些生活空間找到自己認同的信念和價值。

當傳媒被收編甚至取締，新聞自由遭到肆意審查，社會上亦湧現了更多公民記者及小型自主媒體。而在職場及社區層面，雖然大型工運組織被迫解散，許多非建制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均已經被捕、被逼流亡或被取消資格。但民間仍然有許多互助組織和行動，讓社區內、職場上的香港人可以互相幫助。就算在政治選舉上，基於「完善了」的選舉制度已經不會出現異見聲音，民間的極低參與率和各種形式的政治嘲諷，也可成為一種不合作運動的抵抗。蒙兆達認為，「這些不同形式的自主抵抗，就如同哈維爾提出的平行社會結構的出現。平行社會就是會出現一些獨立於政權的民間領域，在權力滲透和壓迫之下，仍然努力維持一種合理生活。」

海外港人在香港威權社會下如何自處

在地港人固然有其抗爭的空間，但身處海外的港人又該如何作出支援？蒙兆達在回應這個問題時，回想起職工盟以往的工作。過往職工盟除了是立足香港，也同時扮演一個窗口的角色去支援中國大陸的工人抗爭。因為中國的打壓非常嚴重，工人無法組織自主工會，甚至無法和外界取得資訊流通。

職工盟正正是一個在香港的窗口，傳遞這些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到國際社會。職工盟亦會在香港聲援中國抗爭者，當工運份子被打壓的時候，他們會組織示威行動到中聯辦抗議。而若果中國國內勞資問題牽涉到香港或外國企業，職工盟亦會向他們施壓以支持中國工運。

時移勢易，現今香港形勢正急速地衰敗，香港面對的情況，或許與中國的情況的確愈來愈相似。香港依然會有人不願放棄抗爭，但他們要對外散播資訊或取得海外的支持，將會日益變得困難。畢竟，在國安法的陰霾下，任何與外國的聯繫或從外國取得的援助都會被抹黑為勾結外國勢力。因此，香港的工運正如當年的中國工運一樣，需要一個窗口。蒙兆達在英國成立香港勞權監察，正正是希望在英國設立一個這樣的對外窗口，支援香港工人。

結語

從本地到國際、從政治到非政治，其實以人民為視野的眼光能夠在政權的體制外產生一種無形的公民力量。根據哈維爾的理論，這種力量可以是一種「預設性的民主社會（Prefigurative Democracy）」。在民主自決尚未來到以前，人民就已經可以在本地和國際公民社會的空間建構一種集體力量。這種力量不是基於「政權擁有者」和國際關係上的敵我矛盾而產生，而是基於人民對不同事件的取態和價值而產生的力量。

這種視野的好處，也許是減低對於「個人」的依賴。因為「個人」的取態永遠都較「集體」的價值取態更容易被影響和收買。而群體的力量，雖然看似微弱，卻是各國不同社會中最重要的組成。一個政權倘若沒有了人民的服從（極權社會）或支持（民主社會），政權本身就不會穩定。

正如蒙兆達所言，當香港社會面臨更嚴峻的壓迫時，在外流散的香港人，不但可以從政治遊說上嘗試在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中為香港尋求利益，也可以嘗試把香港與其他國家的人民所面對的打壓，以普世價值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會讓香港人面對的挑戰獲得一個更廣闊的支持和理解，也可以讓香港的集體意識以「另一種（Alternative）」方式在平行社會中延續下去。



從世界看回香港

從象牙塔的民主化理論看香港實況

作者｜鍾燊豪


for Hong Ko

從象牙塔的民主化理論看香港實況

作者 / 鍾燊豪

零、引言

自七八十年代前途問題以來，香港社會對香港民主化的討論一直滔滔不絕。但如今國安法臨城，在民主勢力及公民社會盡數殲滅之下，莫講是要求中共落實《基本法》中的民主化承諾，就連香港特區本身的自治權亦已岌岌可危。中共對香港事務干預漸多，分隔兩制的政治界線日趨模糊，掌權的高官賢達自我矮化，凡事只懂盲目「多謝中央政府」，放棄以香港自身作本位思考政策部署應付挑戰，特區政府已變得徒有自治之表。在治權都早已拱手相讓之時，民主化在現階段只能說是痴人說夢。

不過縱然身處絕境之中，不少香港人仍抱有一絲「光復香港」的希望。關於相關路線圖的討論，由雨傘運動後經常討論的支爆論、勇武論、本地財團反水論，以至是反送中以來才開始全面解鎖的海外游說論、離散族群論等等，幾乎所有的可能性都被香港人探索了一遍。但綜觀而言，對於「怎樣香港才能民主化」這個問題，市面上仍然未有一個能夠全面整合多方說法的答案。

「難道學術界對此就沒有一個好的解答嗎？」這問題過往亦一直纏繞在修讀政治學的筆者心中，直到在博班時方有機會仔細窺探相關學術討論的脈絡，內心的部份謎團才得以解開。筆者雖才疏學淺，但仍希望藉自己所學之皮毛抛磚引玉，透過回顧和應用本人所知的現存相關學術論說，嘗試為這個簡單而又相當複雜的問題整合出一個稍為全面的答案，同時亦非常歡迎各位對相關討論有更深入認識的有識之士加以補充。

此文章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將簡單介紹主流的民主化理論，第二部分會比較香港實況與理論之間的落差，從「學術理論本質」以及「香港作為案例本身」兩方面解釋相關理論局限的成因，第三部分將梳理相關理論當中的啟示。

一、理論

理論範圍

在深入理論之前，我們要先為討論劃界。與香港民主化進程相關的學術問題，

主要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關乎威權政體（Autocracy）的穩定（Stability）及崩解（breakdown）。第二類則關乎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類則是有關去殖化（decolonization）以及民主建構（nation-building）的討論。威權穩定的文獻可解釋香港現況形成，而威權崩解亦不一定產生民主政制，例如津巴布韋的獨裁者穆加貝（Mugabe）在 2017 年政變中倒台後，迎來的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而只不過是另一位獨裁者姆南加古瓦（Mnangagwa）。因此本文雖與第一類著作相關，但主力仍會放在民主化的討論，而第三類則會在探討理論局限之時提及。

另外，雖然並非今日的討論重點，但我們仍需要區分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及民主穩定（democratic stability）理論：能夠促使民主政制誕生的成因，不一定會同時促使民主政制紮根，反之亦然。例如在西方社科的民主研究中，不同學者對「現代化（modernization）能提高威權國家民主化機會」持不同觀點，但是在「經濟發展能夠促進民主國家政治穩定」這說法卻有很強的共識。

如何定義「民主」／「民主化」？

此外，我們亦需要定義何謂民主化。到底要達到什麼條件我們才能判定一個國家已經進入「民主化」呢？我們可將其分為極簡（minimalist）及極繁（maximalist）兩派。

極簡派主要單純以政治制度運作方式來定義民主。Joseph Schumpeter（1976）[1] 認為民主就是擁有選民可自由選出政治代表的選舉，而 Adam Przeworski et al.（2000）[2] 則認為即使在行政及立法機關皆有自由選舉，一個國家亦要出現政黨輪替才算證明該國已成功民主化。

極繁派則認為在制度以外，社會要同時具備其他伴隨著民主制度的特徵，才能被稱作民主國家。例子包括 Robert Dahl（1998）[3] 所提倡的五點民主國家民眾特質：人民的有效政治參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選民票值均等（voting equality）、人民對決策有明確認識（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人民擁有政令議程控制權（control of the agenda）、以及所有成人皆被涵蓋為選民（inclusion of adults）。

由於極繁派的定義苛刻，加上部份條件難以客觀地量度，所以絕大部份關於民主化的討論皆採取極簡派的方式定義民主國家（i.e. 有公平公開選舉 + 以民主方式交替政權），而此文亦會跟隨這個定義傳統展開討論。

1.Schumpeter, J. 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2.Przeworski, A.,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民主化成因

根據不同解釋角度，我們可以將現存民主化理論發展大致整合為四個大方向：持份者（Actors）、結構性因素（Structural factors）、政治體制（Institutions）、偶然事件（Contingency）。

持份者

第一種角度由社會上的持份者出發，說明哪群人對民主化有重大影響。較早期的社會理論有「精英不可避免（the inevitability of elite rules）」一說，認為人類是沒有辦法擺脫精英控制社會的局面，社會總會存在有一小撮人掌握比其他人更多權力。這些少數精英可壟斷資源，更能獨自左右發展走向，因此一般百姓亦只能跟隨及支持不同精英以改變社會[4]，民主化亦只能由精英所主導[5]。但隨著時代變遷，一些學者轉而討論群眾力量，認為群眾作為社會的一員也對政治有一定的影響力，因而孕育出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以至後來被重新命名為「衝突政治／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研究領域。現存主流民主化理論中，精英及群眾皆已被視為政治事件中不可忽視的變數。

結構性因素

第二種角度則從國家內部及外部的結構性因素出發解釋為何一個國家會發生民主變革。內部而言，除了早前的例子提及的現代化之外還有經濟不平等，皆可歸類為此類別之解釋。

現代化理論泰斗 Ronald Inglehart 認為經濟發展所帶動的現代化發展可創造國家民主化的土壤。首先，工業化可借助機器解放生產力，人類不再需要擔心物質不足的問題，教育亦會更普及，一般百姓可專注於思想發展，宏觀而言民主思想就變得更廣為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科技發展亦使人類更加緊密地聯繫，除了都市發展令群眾更容易聚集外，推陳出新的資訊科技以及交通工具也令平民百姓有更多資訊及實體交流。

就經濟不平等的角度而言，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Boix（2003）認為經濟要平等，那樣平民才有足夠資源戰勝精英。Acemonglu & Robinson（2006）則認為平民要既有動力及有足夠資源戰勝精英，因此經濟不平等水平大約需為中間左右。不過 Ansell & Samuels（2014）則提出在極端的經濟不平等下，對政治清算感到恐懼但又手持資源的無地中產階級才有足夠動力及資源戰勝管治精英。

4. 其中一名提出相關說法的學者有 Pareto, V. , 1935. *The Mind and Society: A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 Dover.

5. 例如 Rustow (1970)、O'Donnell ＆Schmitter (1986) 以及 Huntington (1991) 皆提及平穩的民主過渡需要在野及執政兩邊的溫和勢力 (soft liner/moderate) 願意共同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競爭規則。

外部而言，我們可以理解為其國家與世界的關係，例如是與別國的貿易、與大國（super power）的政治連繫、經濟援助來源、以至是鄰國或所屬地區的政治氣氛[6]等等。

政治體制

第三個角度是體制。這種理論由威權國家的體制本質出發，以說明不同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機會結構並不一樣。例如當中 Barbara Geddes 是此領域其中一位泰斗，她將威權體制分類為個人制（personalist）、一黨制（single party）、軍事制（military）、君權制（monarchy），根據分析並歸納出君權及一黨制威權國家比較其他威權國家穩定。個人制雖然比君權及一黨制更易倒台，但一般強人倒台後只會迎來另一位獨裁者或另一種模式的專制政體。軍事制是最易倒台的體制，但一旦倒台時卻是最大機會能夠和平過渡至民主[7]。

偶然事件

最後一種理論是解釋一些突發事件如何影響民主化機會，例如經濟危機、戰爭、外國武力介入等等，但一般被認為有利民主化的偶然事件只有經濟危機。關於經濟危機，現時學術界的大約共識是「急劇及連續的經濟下滑並不利於貧窮威權國家的穩定」[8]，但不穩定並不代表民主轉型，也可以是威權類別內的轉型。也有另一位東南亞專家 Thomas Pepinsky（ 2009 ）[9] 比較馬來西亞及印尼面對九七金融風暴的表現後指出，一個國家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如果管治聯盟內部的精英未能就危機應變政策取態達成一致，執政者就會面臨管治聯盟瓦解的局面。這解釋了為何印尼蘇哈托（Suharto）政權在金融風暴後被逼下台，而馬來西亞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則不只在經濟危機下保住江山，更能順手收拾政敵安華（Anwar Ibraham），大大鞏固其政治地位。

戰爭方面，二戰作為歷史性事件的確成就很多現代民主國家誕生，包括不少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是為 Samuel Huntington（ 1991 ）[10] 理論中所謂的「民主化第二波」。但單論戰爭爆發與國家民主化而言，兩者在歷史宏觀上並沒有成正相關[11]。

6. 相關著作有 Gleditsch & Ward (2006)、Burnside & Dollar (2000)、Knack (2004) 等。

7. 相關著作有 Geddes (1999)、Geddes (2014) 以及 Geddes, Wright & Frantz (2014) 等等。

8. 此說法在 Przeworski et al.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第二章有提及。

9.Pepinsky, T. B. , 2009.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Huntington, S. P. ,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1. 可參考 Kier, E., & Krebs, R. R. , 2010. *In War's Wak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Fate of Liberal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另外，因外國武力介入而成功民主化的國家亦實在少之又少，二戰後比較成功的就只有 1983 年美國介入加勒比國家格林納達（Grenada）推翻左派政府的政變，以及 1989 年美國推翻巴拿馬（Panama）軍政府的軍事行動。其他較為人所知的美國對外軍事行動，包括 2001 年阿富汗（Afghanistan）、2003 年伊拉克（Iraq）以及是 2011 年的利比亞（Libya）等，這些國家都未能建立能夠深入紮根當地的民主政府，成效相當有限。

二、香港實況與理論差距

解釋了什麼？

以上提及的不同理論和香港有什麼關係？我們首先必須明白，絕大部份的民主化研究都只能得出理論（theory）而不是定論（theorem）。定論是指 A 和 B 的因果關係是必然的，A 發生，B 就必然會發生。而理論則是指 A 和 B 的因果關係雖有關聯，但當 A 發生時，B 並不一定發生，我們只能說 A 發生的的時候，B 發生的概率會提高。因此我們不需要糾結為何香港在經濟發展以至是人民教育水平已和世界先進國家並列，但現代化理論（i.e. 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並沒有在香港應驗。但是，我們仍然需要知道這些理論如何解釋香港政治現況。以下筆者做一個非常簡短的回顧。

從持份者角度，我們可以理解到，香港商賈即使懼怕中共政權清算，但他們皆靠發展土地起家，地產發展企業命脈仍由執政者把持，因此縱然各城中富豪對中共行徑是百般齒冷，與管治精英的聯盟仍然是牢不可破。亦正因如此，即使香港經歷雨傘革命及反送中運動，平民似乎仍不能動搖執政精英聯盟。但這並不代表只要精英聯盟友誼永固，平民在歷史上就只淪落任人魚肉之下場。Haggard & Kaufman (2016)[12] 告訴我們，自 1980 年以來，由平民起義以及由精英主導所產生的民主化在總案例數目上其實是平分秋色，各佔一半。Dahlum, Knutsen & Wig (2019)[13] 亦發現由技術工人以及中產團體所主導的民主運動比起由其他社群主導的更大機會達致民主化。所以，我們不要因此而妄自菲薄，因為看見當權者當刻的專橫而少看群眾的力量。

另一方面，香港在內部結構性因素基本上除了土地不平等令商賈不願叛離執政聯盟之外，在孕育反對勢力而言是非常有利民主發展的。香港發展及普及教育水平偏高，而且社會內部亦沒有宗教及嚴重的種族衝突，因此近年民主運動興起時不少香港人全情投入動員，從現代化理論來看是意料中事。在外部結構性因素而言，香港因前英殖民地身分，不論在經濟以及文化上和西方國家關係皆千絲萬縷，加上有其國際知名度加持，所以香港爆發大型民主運

12.Haggard, S., & Kaufman, R. R. 2016. *Dictators and Democrats: Masses, Elites, and Regime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Dahlum, S., Knutsen, C. H., & Wig, T. 2019. Who Revolts? Empirically Revisiting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4), 1494–1499.

動時西方國家也有聲援，雖然行動成效有限但有勝於無。
從政治體制來看，香港雖然有多個建制派政黨，但運作起來時他們與高官加起來卻更像一部龐大的執政機器，因此筆者認為香港應被歸類為一黨制的威權體制。亦正如 Geddes 所言，一黨制以既定程序集體決定政策，這些制度可減低不確定性之餘亦能盡量避免一人妄斷的局面，令一黨制威權比起其他威權種類更長遠地穩定及更有合法性。雖然現時的特區政府已漸趨一人堂，似乎慢慢演變成個人制的威權體制，不過英治留下的公務員體制以及政治制度仍有相當大的慣性。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黨制」為香港所帶來的政治穩定及有限度的制衡將會隨著中共干預特區政府運作漸深而消失，再在結合一些無法預知的偶然突發事件，民眾就有乘虛而入的機會。當香港爆發經濟及政治危機時，不同商賈之間，又或者是政治精英及商賈之間能否就危機應變政策上達成一致？中共在香港的取捨抉擇之取態又會如何呢？這些都是值得人民提早思考的事。

香港作為案例的尷尬

雖然部份民主化理論似乎能夠解釋香港某些現象，但香港這個案例仍有很多細節是現存理論無法回應的。除了理論本質上的限制以外，筆者認為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作為政治實體的尷尬地位。首先，現存民主化理論的研究對象是「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主要是探討已成獨立國家的政體如何從專制走向民主。香港雖然在英治時期享有實然的自主，二戰後甚至連倫敦也不能對香港本地經濟政策作出有效的干預（這亦令香港和英國在二十世紀中葉的國際紡織市場上成為直接競爭對手[14]），亦有獨立的外匯儲備及貨幣，但香港主權一直只在宗主國之手：九七前是英國、九七後是中國。這種特殊政治環境設定下所孕育的政治互動與其他主權國內的政治互動有設定上的差異。其中一樣最明顯的分別是，反對派要面對的不只是來自本地建制派的阻撓，還有背後那個可以動員舉國之力的宗主國。另外，因為地區沒有獨立主權，宗主國對地區的干預也會被合理化為「內政」。因此，香港反對派所面對的處境亦是相對複雜：我們到底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中向中共追求民主，還是直接追求一個獨立於中共的民主主權國？香港的問題，本身已經超越民主問題，這更是赤裸裸的主權問題。

此外，土地大小也是問題之一。香港特區的領土面積排名若與全世界 197 個正式承認的主權國相比，只能排第 170 位，地方窄小使很多發展步伐、方式都很不一樣。無獨有偶，經常被拿來和香港比較的新加坡是另一個被學者認為是民主化理論的例外國家，主要原因也是因為該國的獨特歷史和面積大小，令不少在大國皆不能有效達成的政策，包括是將全國土地國有化、以小國危機合理化執政黨壟斷、全方位精英吸納等等，都可以在新加坡模式下變得行之有效。在這些特定的情況下，宏觀地由不同國家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未能深入解釋在其他國家所發生的特別現象，這實在是平常不過。

14. 可參考顧汝德的《官商同謀 ── 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2005 或 2011）天窗出版社。

筆者本想再從地緣政治角度探討，但由於篇幅有限，加上《如水》第一期中，周永康《美國無內政》一文已就美國對東亞各國政經關係的歷史背景及利益作出非常詳細的討論，因此筆者亦不在此班門弄斧。

三、啟示

上面回顧了如此多的理論，我們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香港要怎樣才能民主化呢？遺憾的是，這些理論不會給予我們一條「包生仔（肯定成功）」的路線圖，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些理論去了解我們所身處的政治局勢，作出更有根據的判斷。最後，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討論帶出以下三點。

第一，沒有任何一種民主化成因能夠解釋所有的案例，這意味著國家是可以有多個「劇本」去達至民主化。不平等理論告訴我們極端土地不平等使商賈政權聯盟密不可分？但現實之中，民主變天在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之下都有發生過。結構性因素理論只是提出一個限制或者是有利民主化發展的變數，但怎樣克服或者利用這些環境設定，看的還是身在其中的不同持份者。事實上，持份者的行動是有可能觸發其他「劇情」，改寫看似是壞結局的劇本。

第二，香港案例的最大獨特性在於，它要處理的不只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問題，還有「自治權（autonomy）」的問題。「民主化」是人民能夠有效地影響政府施政，令政府反映人民的意願，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去制訂及落實政策，而「自治權」是以香港人作為一個族群實體的前提下，香港的政權可以不受外力太大干預下獨立運作。對於自治權及民主如何同時落實的期許，正正就是香港未來必須面對的路線抉擇：我們願景中的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擁有自治權的民主政府，還是擁有獨立主權的民主城邦國家？

第三，無論開局以及劇本走向如何，民主「劇目」絕對需要作為主角的人民由頭到尾的充分投入。除了人民的積極參與有機會觸發有利於好結局的「劇情」以外，綜觀不同民主化案例，即使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不在人民主導，而是在沒有大型社會事件爆發之下不同精英的協商中發生，但日後的民主政制仍依賴人民積極參與來維繫。因此最終無論香港是以哪種方式達至民主化，香港人在過程亦絕不能缺席。

當一個人吃了十塊麵包覺得飽了，他會知道讓他飽的就是十塊麵包，缺了任何一塊都會少了果腹感。但當台灣經歷近百年奮鬥後在九十年代終於迎來民主轉型時，很多人都將焦點放在最後一塊「麵包」李登輝總統身上，而忽略了前人已經吃下的九塊「麵包」：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以至是早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很多當時看似絕望、徒勞無功的時刻，回過頭看其實都和未來「劇情」環環相扣，都是台灣民主化必經的步伐。而一個個

「劇情」及「麵包」背後，是由無數願意為自己家園付出的鬥士努力所致。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世界上不同國家的民主運動都是曠日彌久，經歷無盡春秋才修成正果。香港民主運動從七十年代火紅年代計算也區區五十年。若二戰後馬文輝論政促改算起，亦不過七十數年。我們也可以視雨傘革命、魚蛋革命、反送中運動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劇情」，是揚揚歷史長河的一小段，是十塊麵包中的第三、四、五塊。作為當中的角色，就讓我們不同香港人繼續尋找觸發有利於好結局的「劇情」，在第十塊「麵包」下肚之前，一齊將前面的第六七八九塊都填上吧！

從世界看回香港

四個香港節 活在真實中

作者｜任荷仁




LIBERTÉ POUR HONG KONG
時代革命
LA RÉVOLUTION MAINTENANT
我支持香港警察
LIBERATE HONG KONG
SOME PEOPLE MOVED ON

四個香港節——活在真實中

作者 / 任荷仁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如今，已經是第三週年。遊行、抗爭、被捕、流亡……比電影更離奇，卻比生活更真實。

這一切，是真的嗎？

2019 是真的嗎？《時代革命》上映後，有人對周導演說：「我覺得 2019 年好似夢一場，好似假咁樣。係你（周導演）令到我知道，呢件事係真嘅。」2019，是憤怒、傷痛、苦難的一年。但憤怒得不到回應，傷痛得不到醫治，苦難得不到拯救。當傷口已經結痂，苦難無人談論，一切彷彿沒有發生。但傷口仍是隱隱作痛，直叫人瘋狂。

2019 的香港，需要承認，需要記念。我們自己要記念，也要看見其他人記念。看見了，就知道，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在此，我希望提出四個節日。各地港人一同過節，就一同記念香港。

為甚麼要過節

海外的撐港集會，現時不少是中國國慶示威、北京奧運示威。這些示威，若能喚醒世人警惕中共，固然有益。但若單單舉辦這些集會，其實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為這些議題，全是中共主場，香港只是客體。外人看在眼裡，除了認識中共暴行，亦會加深了香港是中國附屬品的印象。因為在中共議題之外，他們從來看不見香港。更甚者，我們是在催眠自己，香港確實是中共附屬品。因為我們為香港做的事，全都是針對中共的。不是說這些示威錯了，而是我們在這些示威以外，也要有自己的主場。

流亡藏人，除了會舉辦反暴政示威，也會慶祝藏曆新年，舉辦法會，又會在所在城市的橋樑懸掛禱文旗（Prayer flag），祝福當地眾生。外人看見，就承認他們的確是跟中國不一樣的。他們做這些事，也堅定了自己的藏人身份。因此，我認為香港人也應該有香港人的節日。

過節，是要在無力感當中得到力量。暴政不會瞬間倒下，即使在外地倡議，也有時不知道該倡議甚麼。但人需要行動，在行動過程堅定自己的信念，又在行動過程中找到同路人。而恆常的節日，正好能在無可作為的日子，提供行動的機會。過節不須要有大台，也不須要有聚集。重陽節，各家可以各自登高；猶太人過逾越節，是吃無酵餅、烤羊肉。簡簡單單的動作，人人能做，亦無人可以打壓。

過甚麼節？

問題是，香港很少本地節日。不是沒有，以下我亦選了兩個。但即使以前沒有，也不是問題，現在有，就可以了。2019 的香港，是劃時代的。二百萬人遊行，是歷史性的。全球登報運動、理大戰役、海外游說，香港人一次又一次創造歷史。在這一連串歷史事件之後，我們稍稍更新日曆，記念嫦娥奔月、屈原投江之餘，也記念一下香港，也未尚不可。

以下新訂節日，請勿見笑。所有節日，說到底也是趣怪的：嫦娥怎麼可能奔上月球？她在月球又與我何干？聖誕老人怎能一晚走遍全球？鹿車也自然不能飛天。只是過節的人多了，大家就見慣不怪，反倒樂此不疲。香港人既然創造了不少歷史，也不妨創造新的節日。

我在此提出四個節日，並解釋建議的原委，希望能拋磚引玉。四個節日分別為：

車公誕（農曆正月二日、三日）：蒙元亡宋，宋帝來港。相傳車公為護駕將領，後病逝陣中。鄉民特意立廟記念。

遊行日（6 月第二個周日）：2019 年 6 月 9 日（該月第二個周日），百萬市民遊行反對政府修例，掀起其後激烈抗爭的序幕。

重光日（8 月最後周一前的周六）：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英國皇家海軍少將夏愨抵港代表盟軍受降，並於 9 月 1 日成立軍政府。重光紀念日日期屢有變遷，香港主權移交前，日期為 8 月最後最後週一，及之前的星期六。

圍城日（11 月 18 日）：2019 年 11 月，反修例衝突達至高峰。示威者佔領理工大學，被警方包圍 13 日。11 月 18 日，為理大衝突第二日。當日 1,071 人被捕，為整個反修例運動中，最多人被捕的日子。

我選了四個日子，四季各一。我相信如此安排，能恆常提醒我們香港抗爭的信念，又不至過份密集，令人勞累。基督宗教不少宗派會把一年分為若干節期，記念耶穌基督生平中的不同時刻。教徒守節，即與耶穌同行。我希望我們四時守節，也能有與抗爭者同行。

四個節日，涵蓋古往今來。車公誕、重光日是香港原有本地節日。記念車公，上接中古抗元精神，展望重光，下啟光復盼望。遊行日、圍城日，是新訂節日。遊行日、重光日，記念現在的苦難和抗爭。上溯歷史，能夠幫助我們抽離眼前的困境，退後一步，反思、觀照香港的命運。另一方面，歷史事件亦能勉勵我們逆境自強，效法前人不朽精神。因此，古今節日，皆有脾益。

此外，兩個原有節日，一屬東方，一屬西方，反映香港文化多元。兩個新訂政治性節日，涵蓋政治光譜兩端：遊行日記念和理非行動，圍城日記念勇武派。它們亦可當作反修例運動高潮的起迄點。

除了以上節日，其他日子亦有可取之處。唯節日始終不能太多，我最終只選了上述四個。

如何過節？

節日儀式，豐儉由人，簡單卻非隨便。簡單，則人人可以參與，亦不易禁制。在港人士無懼禁令，海外港人亦可因地制宜。群聚港人，若無限制，固然可以大事慶祝。但若人丁單薄，或有諸多制肘，自己單獨記念，呼應遠方親友，亦無不可。與香港人沒有血緣關係者，亦可一同參與。只要有心參與，就是真香港人。

然而，儀式不宜隨便，因為外在行為應與內在情感相稱。行動雖然簡單，但必須付出時間、體力，以顯真誠。太過隨便、廉價，就有欠敬意。此外，行動過程亦能調整個人思緒。

此外，儀式雖可因地制宜，但核心內容卻宜盡量一致。儀式，除了是為自己做，也是為別人做。互相看見，就能辨認同路人。若完全無法辨認，就失去這作用。

按此原則，我有若干建議，亦係拋磚引玉。實際行動，可因時制宜，自行添減。

車公誕（農曆正月二日、三日）
活動：自製風車，寫上願望，或繪出願景，拿至戶外當風處，讓風車隨風轉動。其後可自己收藏，亦可贈送他人。
寓意：當風車轉動，其上祝福隨風送出，傳達予受祝福的人。
宜忌：舉頭三尺有神明，無須蜂擁至車公廟。神明無所忌諱，願望可隨心書寫，但若有犯禁，轉動風車後自行收藏即可，無須公告天下。

遊行日（6 月第二個周日）
活動：穿黑衣，步行一段長距離。
寓意：記念一百萬人大遊行。
宜忌：地點不限：可以是上環至金鐘一帶，也可以是麥理浩徑、城門河畔、屋苑球場、大廈樓梯（注意安全！），亦可以是紐約中央公園、倫敦泰晤士河畔。
規模不限：若只有三五知己，可以結伴同行；若人多勢眾，可以舉行大型步行馬拉松（Walkathon）。
參考：基督教苦路；天主教、伊斯蘭教朝聖；道教遊神。

重光日（8 月最後周一前的周六）
活動：早上家門掛上花圈，晚上以電筒照上夜空、牆壁或天花，亦可放煙花（如合法）。
寓意：記念二戰陣亡士兵，慶祝二戰勝利。1946 年 9 月 16 日，日軍在港代表簽署投降文件。當晚維港舉行了煙花和探射燈匯演。
宜忌：注意時間。早上掛花圈宜莊重，晚上方可歡樂慶祝。

圍城日（11 月 18 日）
方法：三餐只吃在囚膳食，工餘留在家中，不外出消遣，不使用電子產品。
寓意：記念在囚手足。
宜忌：是日宜清心寡欲。
參考：寒食節、齋戒。

遍地開花的節日

上述日子，相信有不少人已經用不同方式自行記念。類近概念，亦有多人提出。然而，上述建議的重點，是遍地開花。節慶，低門檻，可以「遍地」記念而不至曲高和寡；意義深，可以「開花」而不至花果飄零。由此角度延續香港精神，似乎未有太多公開討論。因此，我冒昧在此拋磚引玉。

香港的節慶儀式，其實一直都有多人努力承傳。民間團體、學術界、文化界一直努力保存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並加以推廣。其中以長洲太平清醮最為人所熟悉，它不但為國家級文化遺產，更入選《時代雜誌》全球十大古怪節日。近年不少團體亦推動傳承、復興不同儀式。除了最為人熟悉的六四晚會，亦有團體嘗試重新記念香港重光日，甚至恢復祭天。當然，2019 年後，各地有不少集會，記念 6·12 等抗爭重要日子。

這些活動，文化、政治象徵性極強，尤其容易引起港人共鳴，亦較易吸引媒體注視。然而，這些活動，往往由若干核心組織、人物推動。活動具一定規模，須要特定組織，參與門檻較高。若非主辦單位，一般人往往只能做台下觀眾。若活動具政治意味，更可能令不少人卻步。

另一方面，自從香港人離散各方，各地都有不同的港人組織，舉辦不同規模的活動。小至三五個留學生相約飯敘，大至巨型社交媒體群組的求職講座。這些活動往往具特定功能（例如聯誼、求職），能協助參加者解決具體問題，政治風險低，而且解決問題往往需要實質互動，故一般人參與程度亦較高。然而，這些活動象徵性不強，若平日疲於奔命，或因政事心力交瘁，而議題又未算逼切，參與意欲就可能較低。

我提出上述節日，正正希望填補兩者的空隙。一方面，節日象徵性強，有助

紓發情緒。行動統一，容易找到同路人。舉辦大規模活動者，亦能吸引注視。另一方面，上述節日記念方式，亦可以相當簡單，即使沒有大型活動，或是不能擠身主辦單位的人，也能直接自行記念。文化節日不具政治意味，而政治節日的記念方式，也相當去政治化（到球場散步也是港獨？），因此政治風險亦降至最低。

因此，我認為，簡單而隆重地過節，最能普及地抒發大家的鬱結。不用殉國，也不致失語。

生命中的輕重

記念節日，不單是一場活動，而是一個故事，且是用最珍貴的媒介說故事。司馬遷寫《史記》，是用紙筆說故事。米高安哲羅造聖殤像 ，是用大理石說故事。沙賈汗悼念愛妻，是用整個泰姬陵說故事。說節日的故事，不是用紙筆，不是用大理石，也不是任何偉大工程。節日的媒介，是人。這世界上，沒有東西比人更加貴重。當我們過節的時候，我們就是這節日的媒介。我們就是紙張，我們就是大理石，我們就是碧玉。這個故事，我們若相信香港價值是普世的，就不能單靠個別領袖說這個故事。一年四日，只要你肯做上述四個動作，你就是在說這個故事。猶太人的故事是怎樣說的呢？是每天禱告，每餐不吃豬肉，每週守安息日，每個男丁受割禮。基督徒的故事，是每餐謝飯，每週守聖餐，每人受浸禮。他們用自己的飲食、作息，說他們的故事。不用靠拉比，不用靠牧師，拉比、牧師不在身邊，這些事其實每個信徒都能做。我們不用戒口，也不用每週敬拜。我只是建議，一年，拿四日出來，做一些簡單的動作，是輕省的，人人都可以做。做了，你就是這故事的一部分，你就是成就了這故事的重量。

榮光就在我們心裡

2019 年，如今，已經是第三週年。是時候要走出陰霾了。不要再自怨自艾，不要再自憐自傷。若你的 2019 是真實的，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了。實現你心中的 2019，不需要高言大志，不需要萬里長征，也不需要改變世界。改變，由自己開始。若有同伴對和，固然是好。但即使孤身一人，亦可誠心記念，重振初心。記念節日，不須要有甚麼技能，政權也不能打壓。我們心中的香港，無人能滅。

上述節慶建議，只為拋磚引玉。選甚麼節日，如何記念、慶祝，大可斟酌。要緊的是，要把這個故事記在心裡，要說這個故事。不是用言詞，不是用筆墨。是用我們的腳步、我們的飲食、我們的作息，用整個人來說這個故事。只有一日有人說這個故事，榮光就會繼續輝煌。

附錄：常見問題

嘉年華抗爭？

搞節慶活動，會否成為嘉年華抗爭？這是個偽命題。過節，並非抗爭。過節是表達感受、團結社群的方式，而非達至特定政治目標的方式。因此，兩者不能互相取代。相反，過節為抗爭者提供情緒支援和交流機會，令抗爭效果更佳。如果抗爭是一架蒸氣火車，過節就是煤炭。煤炭本身不能前進，但火車須要以煤炭才能移動。兩者本質相輔相承。

大中華情結？

在農曆新年期間，慶祝車公誕，會否被中國騎劫？不會。先搞清一個概念：中華文化，不是「屬於中國的文化」，正如英文，不是「屬於英國的語文」。畢竟美國、澳洲、印度、新加坡都是說英文的。中華文化、儒家文化是人類文明共同遺產。而這遺產自唐朝以降，分別由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狹義中國、海外華人共同繼承。香港人有權自行使用這些文化資源，不由他人「說三道四」。日本茶道，雖源於中古中國，亦不見得能被現代狹義中國騎劫。

迷信？異教？

慶祝車公誕，是否迷信？會否牴觸其他宗教？其他宗教人士能否參與？迷信與否，信則有，不信則無。慶祝農曆新年其實也有迷信成份，因為背後有年獸食人的故事。不過，相信多數人寫揮春也不是因為要剋制年獸，拜年也不會慰問對方有否被年獸侵擾。不少基督教人士更有「主恩常滿」等基督教色彩濃厚的揮春。若難以接受鬼神之說，可以視慶祝活動為表達新年願景的方式。若然仍然無法釋懷，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達願望。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2 JUL　　Vol. 6「世界與香港」

編輯委員會　張崑陽、黃台仰、鄺頌晴、江旻諺、鍾燊豪、馮敬恩、式、言、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孔誥烽、譚競嫦

總編輯　張崑陽

支持台灣獨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美術設計　Mido筑、馮詔天Sky　來自在台港人組織－香港邊城青年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100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8號9樓之一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　初版一刷

總編輯　如水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信箱：flow.hk.cs@gmail.com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售價　新台幣 450 元整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如水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flowhkmagazine/